



我  
身  
本  
無  
鄉

境 外 生 權 益 小 組 抗 爭 誌



# 目錄

前言 .....	1
序言：非公民的批判視野 .....	2
2020年境外生返台時間軸 .....	5
<b>(一) 境外生的日常生活</b>	
策畫語 .....	6
境外生快問快答 .....	7
境外生的日常 .....	13
<b>(二) 疫情來了！國族分界下的非公民</b>	
策畫語 .....	16
流動與劃界：疫情期間的「非公民」群像速寫 .....	17
未竟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說起 .....	19
六本真人圖書 .....	23
境外生有話想說 .....	30
<b>(三) 同樣是學生，待遇大不同：境外生面臨的制度差異</b>	
策畫語 .....	33
打工，時數限制與被資遣的境外生 .....	34
陸生作為不合時宜的景觀：從「三限六不」說起 .....	36
境外生學雜費脫鉤的困境與抵抗之道 .....	38
疫情來時，我們流離失所 .....	41
抵抗的經驗：健保納保「本外平權」運動 .....	45
<b>(四) 情慾與身體</b>	
策畫語 .....	48
那又甜又酸的味道：《T婆工廠》、《彩虹芭樂》觀影札記 .....	49
兩代境外生：丁乃非訪談 .....	51
<b>(五) 運動創傷</b>	
策畫語 .....	54
兩種「被黑者」的對話：創傷、謾罵與社會分析 .....	55
<b>小小誌</b>	
<b>當塵土組織起來時：境外生權益小組組織經驗談</b>	
策畫語 .....	1
組織理念和策略上的反思 .....	2
自己訪問自己：組織內部檢討 .....	24

# 前言

境外生權益小組(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 TISM)是一個以組織境外生共同捍衛自身權益,並且不分本外,廣納共同關注境外生在台受教、勞動、醫療等權益問題與相關社會變革議題的異議性質組織。自2016年成立至今,我們曾深度進入境外生健保、反高教商品化及境外生返台運動。而2020年上半年的境外生返台運動,可說是參與人數最多、持續時間最久的在台境外生運動。

這本小誌是我們在經歷了這次運動後的紀錄與反思。小誌以COVID-19下的台灣為脈絡,檢視境外生在台的日常生活、國族分界下的遭遇、面臨的各式制度問題、情慾與身體、運動與創傷。值得強調的是,我們並非孤立地看待境外生群體及相關議題,而是以「非公民」為框架看待境外生在台境遇,期待構築「共同生活在台灣的社會成員」的基進視野,為台灣社會運動補足非公民的視野。

小誌第一輯「境外生的日常生活」中,為了讓不熟悉境外生的讀者有進入境外生生活的入口,我們邀請境外生以快問快答的方式,回答他們認為有助於了解境外生群體的問題;我們也收集了這些學生因為自己的身分和文化經驗,常常遇到的或尷尬或好笑或無奈或難過的生活細節。

第二輯「疫情來了!國族分界下的分公民」,首先勾勒疫情裡全球不同地方,基於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議程,對不同非公民群體會採取的不同形式的排除。關於《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放映的討論,則進一步提出非公民政治參與所遭逢的困境與可能性。最後,境外生「真人圖書館」的故事與感言,則以單頁形式穿插在小誌中。

第三輯「同樣是學生,待遇大不同:境外生面臨的制度差異」,從境外生權益小組曾參與的議題與運動入手,透過僑生被資遣、陸生處境、境外生學費脫鉤政策、疫情下的流離失所以及健保本外平權運動,具體地說明境外生面臨的制度差異是境外生身兼跨境移動者、台灣社會的生活者,同時又是高等教育的參與者等重疊身分之下多重擠壓的結果。

第四輯「情慾與身體」,首先透過影片《T婆工廠》與《彩虹芭樂》,從非公民與情慾的連線,展開非公民的生活如何可能的討論。接下來,透過另個時空下的「境外生」丁乃非的知識越界與亞際知識實作,探討境外生在經驗、情感、知識與運動上擾動常態界線的可能性。

第五輯「運動創傷」,是在境外生返台推動期間被網路攻擊的兩位境外生的對談,呈現面對「被黑」時,在抗拒只是作為受害者的姿態之外,我們可以怎麼藉著與創傷的相遇,開啟對台灣、香港和大陸社會及個人經驗的剖析。

五輯之外的小小誌「當塵土組織起來時:境外生權益小組組織經驗談」,其實是第五輯的延伸。我們以「自己訪談自己」的形式,一方面,從組織內部的歷史,去解答境外生權益小組自2017年至今不同時期的理念和具體策略是如何被建立起來。另一方面,對小組組織方式、架構、分工、定位、串聯等面向,進行了整理和檢討。希望透過我們對自己的返身與敞開,為不同身分、不同領域的境外生與行動者帶來經驗、情感、思考與實作上的參照。

# 序言： 非公民的批判視野

作者 Kuo Jia

## 一、為什麼有境外生？

縱使自跨越國家或區域疆界的遷移存在，便有跨越這些疆界去學習的學生，我們今天看到的在台灣學校體制內的、具有不小數目的境外生，是在很晚近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脈絡下始出現的。1995年，全台共有8,000餘名境外生；2009年，境外生已增至39,533，其中學位生20,676人；2018年，境外生總數更增至126,997人，其中學位生61,970人。境外生人數在近二十年的快速增長，有著頗為清晰的動因。

隨著新自由主義下政府從市場「撤出」及財政緊縮等，高等教育的市場化在世界範圍內發生。在同樣的浪潮下，加上台灣本土的政治和文化變革趨勢，九〇年代初政府開始放寬教育管制，逐漸將教育推向市場化和私有化——政府教育經費縮減、大學偏向於市場與經營邏輯、著重於具經濟效益的實用學科和產學結合。然而與此同時，台灣自八〇年代末浮現少子化的社會徵狀，各級校院將面臨教育市場內需不足。國民中小學學生從2004學年度開始大幅減少，2010學年度學生僅為151萬餘人，預計2026年將減少到94萬人。在國中小之後，高職與大專院校——尤其是在市場化進程中暴增至2006年的一百六十餘所公私立大學——也將面臨大範圍的減班、關校與教職員工失業。因此，台灣高教招生勢必向外發展。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化階段的重大影響是，為方便資本為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最佳投資環境，各國需要開放邊界以提供資本、勞動力和資源。WTO(世界貿易組織)於1995年成立，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掉隊並爭取競爭優勢，台灣經過幾年的努力於2002年加入WTO。一方面，為因應WTO的服務業貿易總協定內參與國須開放教育服務類商業貿易的條款；另一方面，為在全球高教產業內獲取利益和競爭力佈局，台灣才開始積極推動高教的全球化與國際化——提升國際教師與國際學生的數目、課程國際化、研究的國際競爭力、大學國際排名，並著眼高教產業的全球佈局。從2002年修訂的《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2008年推動「萬馬奔騰計畫」，到2011年推動「高等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學生行動計畫」，都致力於廣招境外生。尤其是因應九〇年代的「南向政策」，2002年教育部提出「教育南向政策」、2008年行政院提出強化「陽光南方政策」，特別著重於東南亞學生；並循著戰後的「僑教政策」，亦特別著重於港澳僑生——於1997年擬定《積極拓展僑教領域開創僑教新境界擴大招收海

外華裔子弟來台升學方案》。

也就是說，在高教市場化、少子化帶來的內需不足與加入新自由主義協定及競爭的共造下，台灣高教體制內的境外生達到一定規模，只是近二十年內的事情。2008年，政府針對「陸生來台就讀學」籌組跨部會專案小組，開始推展招收陸生的政策討論和立法，便是上述進程的進一步延展。2016年「新南向政策」提出後，台灣因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佈局考量，再度開始廣招東南亞學生並積極在東協十國、南亞六國開設境外專班，在為產學結合服務和台資企業海外人力資源佈局之餘，亦賺取超高額學費。

## 二、國家治理下的非公民： 全球化與國家疆界的張力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期，國家所力求的開放與資本、商品、人口的跨境流動，勢必跟民族國家同樣竭力維繫的主權與疆界產生張力，因為國家主權與疆界是民族國家產生與存有的合法性之所在。於是，平衡全球化下的開放與國家疆界間的張力，是現今國家治理的重要關切。

邊界並非只是地理上的，而是存在於所有進行著區分與排除之處。民族國家的社會內部本就存在著各式邊界，這些邊界正是認同／差異的生產者。社會中不同階序的權力之間透過塑造體制的、話語的或空間的邊界，區分「我們」與「他們」，從而維繫各自的權力。在叢生的邊界之下，一部分人佔據了高階的、集中的權力位置，另一部分人則不可能跟前者一樣自由及平等地實踐權力、分配資源。當然，所謂高位階的、集中的權力不僅是個人，更是跨國資本主義、代議制等橫行於社會間的權力單位。也就是說，邊界即對社會空間進行控制與隔離的威權機制。

新自由主義世界裡的跨境人口流動，並非均質的，而是有著跨國資本主義掌控下的流動方向與階序。譬如，資本流向更高的受益的環境，資源流向更高一級的生產位置，商品流向更廣闊的市場，人口流向更高勞動報酬(及更符合其他現代性欲望)的地方……全球自由市場之下，不同階層的人在跨境流動時，有著不同的軌跡，在不同的軌跡上移動時要面對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壁壘。而那些跨境而來的底層勞動力，往往會成為本地社會中底層之下的底層，甚至隱形的人口(比如無國籍居民、難民、失聯移工)。他們之所以不被看見，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的文化相異、收入較低，更是因為本地社會內部本來就存在的邊界機制的運作——必須持續區分各式高位階的「我們」與低位階的「他們」，才能維繫高位階的權力。譬如，外來的底層人口是被持續地穩固在不具公民身分的位置，才能使他們更加不受法律保護的，也更加隱形的、更適合被本地資本剝削的勞動力。

在國際和區域政治經濟格局中較高位的國家，是人口移入的方向。越來越頻繁的人口的移入，也改變著國家對公民身分、公民權利、人權、國境管理等

的判斷和實作。縱使國家在新自由主義下有體制性的後撤，但仍然是社會內高權力位階的行動者。一方面，國家為提升競爭力、為解決本地勞動力和商品市場困境，要開放人口移入；另一方面，民族國家想像共同體的合法性關鍵地來自國家疆界和種族劃分的穩固。而邊界機制的存在使得這些國家得以以此作為篩選的工具，再生產著國際的階級差異。於是，國家給移入人口設置的遷移壁壘首要地便是國家疆界的邊境管理政策：有些人要經歷重重審查才能跨過疆界，有些人甚至被拒之門外。在本地的移民政策中，國家只給少數移民以公民身分，大多數移民成為非公民。民族國家透過移民條款、家庭團聚條款、庇護法與國籍資格條款等政策，為移民設下種種壁壘，限制其公民身分。而公民身分直接關乎人權、社會權與政治權等權利獲取。沒有公民身分的移民，不僅無法平等地獲取社會福利等人權保障，也因無法進入主導著本地政治的代議制度而無法平等地參與政策演進。

並且，在民族國家發展歷程中，公民意識已經成為共同體想像的、實作劃分與排除的意識形態。人權被收攏進「公民權」範疇，在具公民身分的人群與不具公民身分的人群之間的疆界，除了決定了公民權的擁有與否，更衍生出叢生的族群、階級與意識形態矛盾。透過國家安全的修辭、族群劃分的修辭、移民社區的規畫等政策的、話語的、空間的建制，國家執行著本地社會內部對移民的暴力。本地公民亦透過族群的、意識形態的、階級的邊界，執行著公民／非公民劃分與排除。

### 三、非公民之間：資本家、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與境外生

當危機出現時，國家的治理對人民而言是否「有效」，首要地便呈現在邊境管理的模式與效用，據此國家才得以維繫國家的安全和共同體的合法性。比如，在戰爭或恐怖主義出現時，國家能否有效地甄別危險的人並阻絕其入國；在社會經濟困頓和社會福利危機出現時，國家能否有效地阻絕更多移民搶奪社會資源。在COVID-19出現時，我們可以看到各國政府都在短時間內封閉國境。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國家對不同類型的流動做出非常不同的處理，資本和商品仍然暢通無阻，人的移入則有著非常嚴格限縮的規定。台灣政府在疫情出現後便規定，有居留身分者仍可入境（除本國人與陸籍配偶所生子女及港澳籍境外生），但本國公民與外籍人士在隔離等防疫要求上有不同規定。在邊境管理稍微放鬆時，首先被開放入境的是持商務簽證的旅客和外籍移工，其後很久才是無居留證的境外生。這些危機政策中，交纏的即是國家對不同類型遷移者的需求與設定的差異。不僅是國家對不同遷移者的設想，實則更是新自由主義世界對這些遷移和遷移者的塑造，這些不同遷移者在本地社會的設想／功能／角色也在跟本地社會的意識形態相互建構。但總體而言，這些在世界人／物移動中處於低位階的遷移者，往往是本地社會的非公民（外籍配偶在取得本地公民身分前也要經歷一

段非公民／準公民歷程），不僅無法獲取種種人權保障，亦被國家當作難以規訓者甚至危機管理的對象來治理。

新自由主義壟斷結構下的資本、原材料與商品向來可以自由通行，資本周邊的商務旅客向來也受到優待，這些是國家要在新自由主義世界存續和競爭的命脈，其他類型的遷移者則是在這些命脈的支配下遷移的。具體到台灣，對國家而言，外籍勞工沿著往區域格局下高位階方向的軌跡移動，他們是解決本地勞動力市場供應不足的主要生產者。然而，《勞基法》不適用於他們，他們亦處於台灣種族、階級的種種邊界下被排除的社會空間中。在台灣的外籍配偶絕大多數為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女性，也是沿著往區域格局下政治、經濟與文化現代性位階較高方向的軌跡移動，他們對國家而言首先是解決本地底層男性的生育、性、家務勞動與情感勞動困境的再生產勞動者，同時也是補充本地人力市場的生產勞動者。然而，他們在承擔家庭再生產勞動的同時，他們的社會福利位置被捆綁於異性戀親屬制依附的戶籍制度之下，亦因為母國文化與物質條件與台灣不同，而常常被視作文化上、道德上的異類。

其實，在台灣的境外生大多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跟外籍配偶處於相似的遷移構造，他們的首要考量不必然是在台灣或許會有怎樣的收入，而是基於在東亞—東南亞區域中，對台灣有著更多的現代性想像。這種在新自由主義形塑下的現代性想像，成為他們遷移的欲望與驅力。對國家而言，境外生則與外籍勞工、外籍配偶截然不同。台灣設想中的境外生在本地不是重要的生產者或再生產者，而是高教產業和商品市場的消費者，主要功能是提升高教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及作為潛在的未來勞動者在本地或台資企業所在地的人力資源，但也因此並非在當下那麼地不可或缺。

這些遷移者的處境同時關涉到後冷戰的兩岸關係、台灣與東南亞及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區域關係。除新自由主義構造外，台灣自二戰後在國際間的主權問題，使得台灣對陸籍、港澳籍、其他國籍遷移者的政策受不同法律管束。同時，加上台灣政府與民眾間的反共防諜的文化邏輯，才得以解釋為何涉及陸籍配偶的婚姻、居留議題，以及涉及陸生的健保、返台議題，往往在政府決策和公眾輿論中被當作攸關國家生計、台灣存續的爭議議題。兩岸間各種流動，實際上塑造著不同遷移者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差異。流動於兩岸的台商被視為「愛台灣」的、對台灣社會極具貢獻的人，並且可以在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領域具決策影響力。流動於兩岸的陸籍配偶和陸生，則因為這樣的流動，而被台灣社會視為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台灣意識形態的威脅。在台灣，個別國籍（如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的配偶在入境和獲得居留權時接受的審查比其他國籍配偶要繁複、困難得多，陸籍配偶獲得台灣身分證的年限比其他國籍配偶都要長。國民黨政府為開放陸生來台啟動修法時，來自政府內外的爭議多圍繞陸生會否是共諜，也只有開放陸生時民眾才關

切作為境外生的陸生是否會搶奪本地學生資源。原本就是納入其他國籍居民的《全民健保法》，要納入陸生時，卻引發誰有資格是「全民」的爭議。

#### 四、面對非公民

在新自由主義壟斷結構下，因為跨境流動的軌跡與壁壘，產生出越來越多的非公民。在各國內部，人權被收束和化約為公民權，公民與非公民的邊界對非公民執行著權利、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排除。在COVID-19爆發後，台灣政府先禁止了陸生、港澳籍及無居留證的其他國籍境外生返台就學，後規定可入境的境外生一律得在防疫旅館進行檢疫；在後續邊境管制逐漸放鬆時，先是開放無居留權卻「有用」的商務旅客、外籍勞工等入境，後開放被認定為「中低風險」國家境外生返台，最後才是陸生。在整個境外生返台進程中，台灣社會的不同行動者——國家、政客、資本家和本國公民——對境外生的排拒，以不同方式顯現了新自由主義構造下對生產與再生產的調動，及對非公民的治理方式。

國家第一時間禁止陸籍、港澳籍境外生入境，自然有當時疫情爆發地域的因素，但依國籍而非旅遊史或接觸史甄別入境者風險並非科學，亦包含了台灣邊境管理的種族主義和冷戰邏輯。國家率先開放作為命脈的在資本周邊的商務旅客，後續開放本地必須的勞動力——外籍勞工，並優先安排他們入住防疫旅館和集中檢疫所。對於國家而言並非必須的境外生，被拖延到資本與勞動力之後，且境外生入住防疫旅館時的訂房困難與經濟負擔，不被國家理睬。實際上，境外生不只是台灣高教產業的消費者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助力，也是實際的、較隱身的勞動者——不論是在大學內的研究工作、助理工作、在大學外的打工，還是在高教產業的產學合作名義下被迫進行的「假唸書，真打工」；並且，他們也是未來的本地勞動者，及台商企業在大陸及東南亞的人力資源，是台灣提升全球人力資料佈局競爭力的資源。但是，在疫情這一危機時刻，國家要穩固共同體的合法性，其首要任務便是及時且有效的邊境管理，運用「國家安全」、「國民健康」的修辭操弄社群的邊界，以維繫國家安全存續。

我們看到兩黨政客也在境外生(尤其是陸生)返台事件中紛紛表態。因為作為非公民的境外生在掌控本地政治的代議制中沒有位置，依靠選票存續的政客要麼為高教資本、台商資本代言——支持境外生返台，以維持本地高教產業，並為台資提供潛在勞動力；要麼為民族主義代言——反對境外「危機」入境，以保護本國人安全為優先；要麼為現代性意識形態代言——支持港生返台並反對陸生返台，以維繫台灣在東亞區域內的反共及民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正如他們在過去十年間的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和陸生納入健保的爭議間的表態一樣。

本地高教產業的資本家或資本周邊人，自始便支持儘早讓各國境外生返台就學。這首先是有從表面便看得到的要賺境外生學費的原因，境外生的學費是本

地學生的1.5至2倍。更因為台灣高教產業在市場化方向上、在少子化困境中，必需境外生才能生存下去，以及進而提升在新自由主義結構下的國際競爭力。

疫情期間的台灣民眾(本國公民)幾乎一面倒地反對境外生返台，與境外生相關的網路空間充斥著「不要來台灣傳播病毒」、「不爽不要來」、「滾回去」、「有種去中國維權」等等仇恨言論，以及「本國人優先」的話語。在危機時刻，本地社會內部的階級、族群等邊界似乎被暫時地超越了。壟單人們的是本國人／外國人、公民／非公民、民主的／威權的劃分，據此塑造出穩定的「社會安全」與共同體想像。同時，戰後台灣社會的「恐懼政治」至今仍起著操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總有著不可預期的暴力——不論是戰爭還是「亡國」，中國大陸／大陸人的「入侵」可以隨時激發個體的恐懼。尤其是當面臨近幾年的兩岸緊張、同時面臨一場由大陸爆發的疫情，「亡國」的恐懼與個人的「死亡」連結起來，恐懼政治成功地調動起對大陸人／陸生／陸配的絕對排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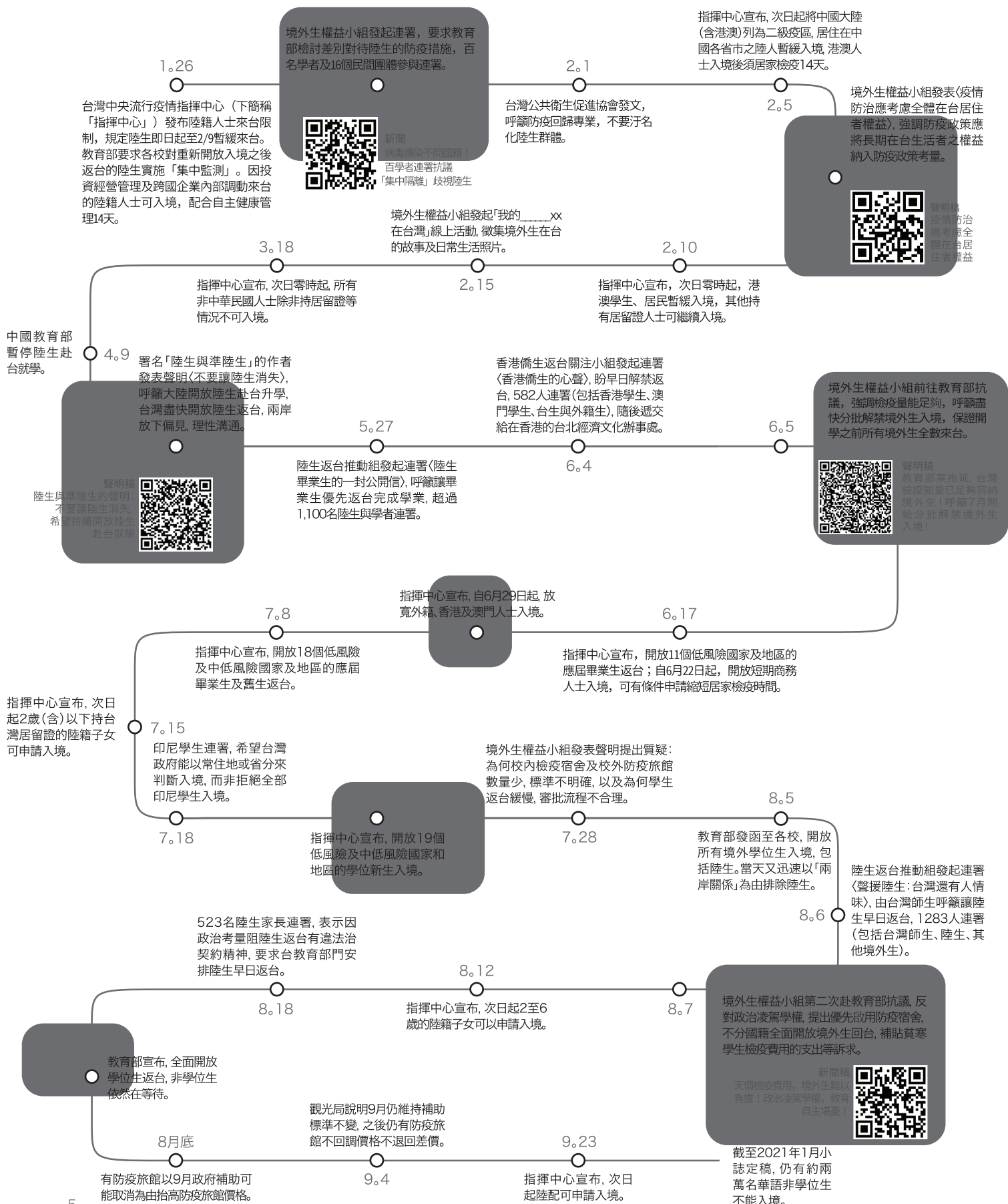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不論是政客、高教資本還是本國公民的反應，不外乎都是基於國家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對生產、再生產的調動，以及危機下的治理。在此進程中，不論哪一方對境外生作為非公民的指認，都凸顯著台灣的公民與非公民在入境、居留、社會福利等權利上，以及種族、階級上的區分。然而，本國公民以為憑藉排拒非公民，就能因為「公民身分」而應被優先賦予「公民權」，實則是一個虛幻的泡沫。「公民」身分並不像本地公民想像得那樣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與健康；相反，國家之下的「公民」身分不過是國家調動生產與治理的修辭術，讓本地公民加固共同體想像，依此維繫危機下的穩定。

其實，越是在危機時刻，公民身分就越是不穩定，邊界的效應越是凸顯出來。在本地社會叢生的邊界之下，危機之下各式人權、社會權與政治權愈發無法超越本地的階級、族群、性別的劃分，並不存在本地公民間真正平等的公民權——譬如他們在面對疫情下的行業與個體經濟補助、高價防疫旅館、對異議聲音的壓制、衛生資訊流通等面向時都處在不同的位置上。也就是說，公民身分本就是流動的，即便在日常，某些法律上的台灣公民會隨時成為性別上的非公民、族群上的非公民或經濟上的非公民……

因此，境外生權益小組以「非公民」來看待境外生(以及外籍勞工、外籍配偶、無國籍人士)在台灣社會中，因為公民／非公民的劃分而在政治上、權利上、意識形態與文化上被排除的處境。縱使我們的行動大多直接訴求境外生的相關權利，我們並非限縮於為非公民爭取到「公民權利」的權利論述與運動。我們的論述立足於對於非公民處境的呈現、對於公民／非公民差別待遇與社會疆界的批判，我們期待構築「共同生活在台灣的社會成員」的基進視野，為台灣社會運動補足非公民的視野，亦是期待自身可以成為邊界叢生的社會中讓邊界兩側的人們得以相互遭遇、相互對話的仲介者、翻譯者。

# 2020年境外生返台時間軸

整理 奕涵





# (一)

專輯策畫 Sea

## 策畫語 境外生

# 的

根據台灣教育部統計，2019年大專院校境外生（含學位生、非學位生）來台人數達到十三萬人，再創歷年新高。多年來，境外生不斷散落在台灣各地，融入台灣的學習、生活，在很多社會場合其實都有他們的身影：小吃攤上來來往往的顧客、講座沙龍研討會的參與者、各種主題的遊行和社會運動場合……當中可能就有我們的境外生朋友。然而在大部分境外生的經驗裡，台灣社會對於這群人數不少、與之共同生活多年的人，還是感覺相當陌生，甚至對境外生在台生活的想像僅僅停留在「學校-宿舍」兩點一線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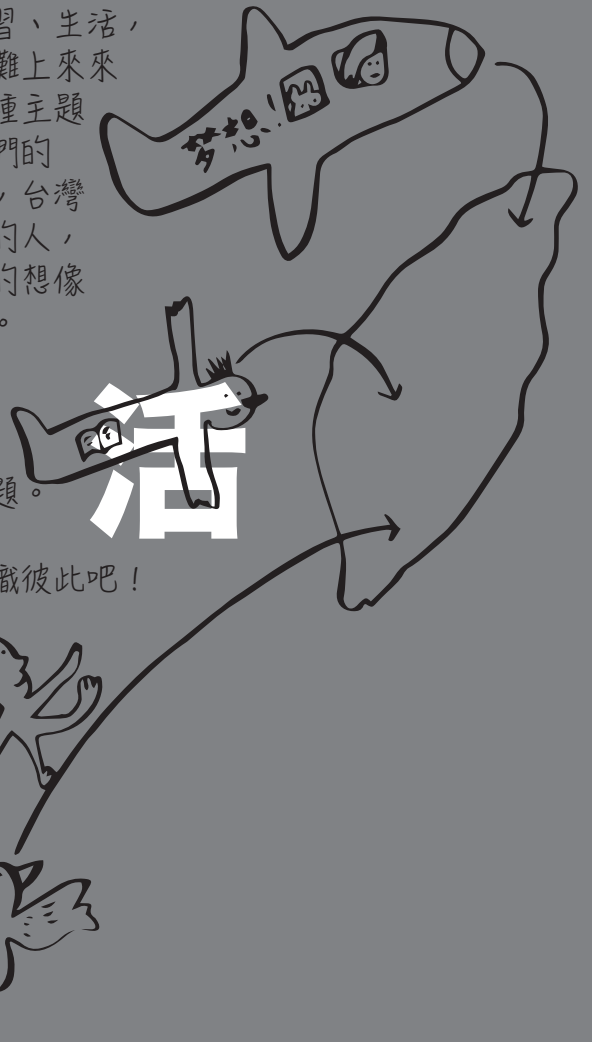
# 日

所以我們想到可以邀請一些境外學生，以快問快答的方式，回答一些他們認為有利於不熟悉境外生的人認識、了解自身群體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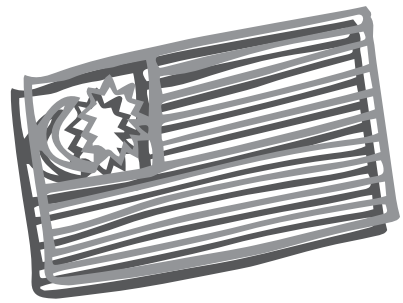
打開這本小誌的第一輯，就讓我們先更加認識彼此吧！

我們邀請了三名境外生朋友，分別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小獺、來自香港的安安，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小豚，來分享他們覺得大家可能會對他們感到好奇的事情XDD 這部分的最後，我們同樣收集了來自這三個地方的學生，因為自己的身分和文化經驗，常常會在台灣遇到的或尷尬或好笑或無奈或難過的生活細節，讓大家可以更加立體地感受境外生在台灣的日常。

Just enjoy~~



# 馬來西亞 (海獺)



## 你中文怎麼說這麼好呀！

在台灣生活的馬來西亞學生，  
大概每次和台灣人互動都會被說  
「你中文怎麼說這麼好呀」！  
馬來西亞華人其實就是不同時期  
從中國去到南洋生活的人的後代，  
很多華人至今還抱著傳統的觀念，  
認為華人一定要會母語——**華語**  
[按：中文、國語比較是中國大陸和港台的用法]。

在馬來西亞我們有學習母語的權利，  
加上在華人生活圈子中的互動，  
基本上馬來西亞華人的主要媒介語就是華語！

另外我們在學校裡都會學習馬來文和英文，  
因此一般馬來西亞華人會**掌握三種語言**，  
再加上生活在不同地區也會使用不同的地方語言，  
譬如中部的吉隆坡的人日常主要以廣東話對話，  
北部的檳城用福建話（台灣的閩南話），  
南部的柔佛則比較常用華語。



## 馬來西亞到底是一個什麼地方？

雖然馬來西亞是中港台以外**華語最流通**的地方，  
但馬來西亞是**伊斯蘭國家**，  
馬來西亞主要由土著（含馬來人）、華人、  
印度人和少數民族組成，  
華人人口佔總人口3,300萬中的23%左右。

即使馬來西亞華人在國土上世代相傳，  
卻無法得到和土著同等的待遇，  
因此許多華人自嘲是馬來西亞的二等公民。



## 華人學生在馬來西亞 接受何種教育？



為了能以母語學習，  
馬來西亞有一種特殊的學校，  
稱為「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  
國內至今仍存有六十間規模不一的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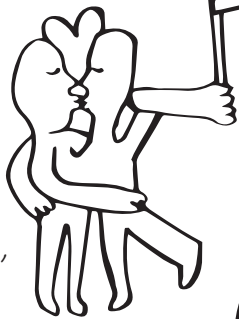
獨中不受政府資助，  
通常由高昂的學費和支持華教的機構  
自行管理和支撐開支。

由於馬來西亞政府  
也不承認獨中的統一考試文憑，  
因此獨中畢業生  
無法直接進入馬來西亞的國立大學，  
許多獨中生畢業後會到海外深造。

## 為什麼 馬來西亞學生會選擇 來台灣唸書？

許多華人學子選擇來台灣深造，  
因為相近的語言、食物、  
文化和生活習慣，  
讓學生能更容易適應生活，  
專注學習。

而台灣的生活水準和學雜費，  
比許多歐美和亞洲國家相對負擔得起，  
也成為馬來西亞學生  
來台深造的理由之一。



LOVE  
WINS!

## 馬來西亞學生在台 面對何種身分上的差別待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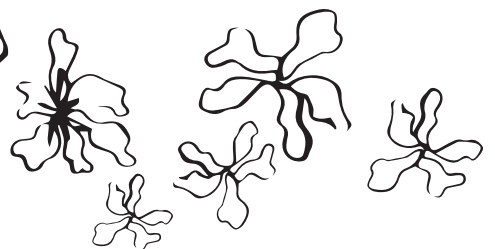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境外生在台灣  
大致上被分為「僑生」和「外籍生」，  
其他入學途徑還包括  
「海青班」、「華語生」和非學位生，  
不同的學生類別  
需要通過不同的申請途徑入學，  
除了呈交相關文件，  
有的要通過僑委會統一申請，  
有的要學校擔保，有的要面試……

而僑生和外籍生之間亦充滿了差別對待，  
如各大院校的僑生和外籍生配額不同，  
外籍生的學費是僑生的雙倍，  
僑生和外籍生能申請的獎學金類別  
和金額都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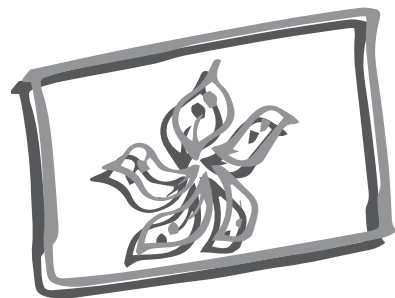
## 畢業後的馬來西亞學生何去何從？

大部分學生來自獨中，  
加上在台灣生活期間主要媒介語為中文，  
因此普遍對於馬來西亞工作環境中  
較常使用的英文和馬來文掌握能力不足，  
他們認為在台灣生活的便利  
和開放的社會環境是他們更嚮往的生活，  
因此畢業後會選擇找工作留下來。

另一部分學生在台灣學習之後，  
更想把台灣經驗帶回馬來西亞，  
譬如有的有媒體實習經驗、  
在台灣曾籌辦文化活動、  
受台灣社會運動尤其性別平權運動所啟發的學生，  
近年來在馬來西亞也逐漸展露頭角，  
希望能改善馬來西亞的公民社會情況。



# 香港 (安安)



##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經歷 了什麼樣的變化？

香港自1841年開始被英國殖民，  
但因為是以「租借」的名義被割讓，  
加上中港邊界在五〇年代之前幾乎是完全流通的，  
因此很長一段時間，

香港都是一個「難民城市」，  
來到這片土地上的人多認同自己是「華人」、「中國人」，  
而當時「香港人」還沒成為一個認同選項。

第一波香港身分認同大概從七〇年代開始。  
那時候香港經濟高速發展，邁入亞洲四小龍行列。  
大部分香港人從小被灌輸的是經濟如何騰飛的香港史：  
從一條貧窮小漁村到艱苦奮鬥發展港口貿易，  
再到後來取消關稅擁抱自由市場，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經濟發展的神話給香港人帶來安居樂業的想像，  
因此有人認為，主宰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核心其實是經濟認同。

1984年，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決定1997年香港將會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為了安撫港人對回歸後會損失經濟優勢的恐懼  
和繼續利用香港的經濟價值，  
承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一國兩制。  
當時的政治陣營，無論是泛民、港英、親中建制派和中共，  
都聯手讓香港人認為回歸後不會有太大改變，會漸進地取得民主



不過，隨著2008年開始的社會運動風潮，捲動到2014年的雨傘佔領，  
香港人的政治認同以至於身分認同的內容開始出現了改變。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中，香港人多次見識到政府的橫蠻，  
於是開始懷疑「五十年不變」是否是一個騙局。

一部分人會認為「五十年不變」是使得香港的政經體制越發資本主義  
以至於生活越發艱難的主因，認為需要突破這個僵局；  
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必須要堅持「五十年不變」才能維穩香港的優勢，  
但會認為是中共插手香港事務打破了這個「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也有另一部分人認為執著於「五十年不變」是香港人不求政治突破  
被溫水煮蛙的主因，所以必須要直接拋開這一執著，  
建立香港自己的政治主體性。

以上，大概是左翼、泛民和本土的差別。  
但無論是哪一種香港人，2019年都選擇擺脫過往去政治化和犬儒的形象，  
參與到政治的討論甚至行動當中。



## 香港人講話怎麼那麼凶又那麼奇怪？



因為太習慣在中文裡面夾雜英文，常常被人覺得很難辦，被諷刺是韓粉的「晶晶體」。

「晶晶體」是台灣流行語，是對中英夾雜的戲稱，後來在2019年再度爆紅，是因為韓國瑜在往台北市美國商會演講中，有兩分鐘的中英穿插。

真相其實是香港人被英國佬殖民過，至今依然有一點點重英輕中。譬如大學為了追求「國際化」的目標，很多時候會放棄用母語教學，改用英文教學。

久而久之日常生活也會變得中英夾雜。其實我也不想夾雜英文在中文裡面，但我是中文不好……

並且，香港人太習慣說話直接，到了台灣經常被認為太凶狠。

也因為香港人說話太直接，每一次聽到台灣服務生說「請允許我現在幫你做一個清理桌面的動作」時（香港服務生應該會直接把盤子收走），我都會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懷疑自己平日的直言直語會不會傷害到誰。



## 香港的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香港的教育制度，目前是「三三四」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學。

但是在2007年之前，香港是採取英國的學制，即三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預科和三年大學。

此外，香港的中學也有分CMI學校（使用中文授課）和EMI學校（使用英文授課），回歸以後，兩種學校繼續並存。

另外，香港只有九所高等院校，錄取率僅三成，升讀大學是一場非常血腥的戰爭

（這或許也是為什麼香港人總是那麼凶狠的祕密吧X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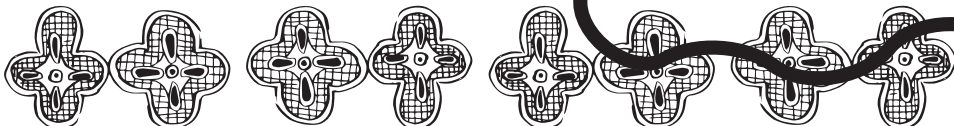
香港境外生大多都是以「僑生」身分入台，與馬來西亞和澳門僑生待遇相同。

我到底是馬鈴薯還是薯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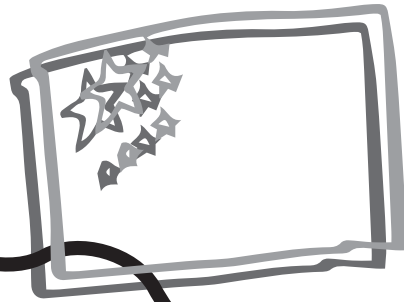


## 為什麼來台灣讀書？

來台灣讀書是因為我唸的科系在台灣發展得比較好，但親戚還是會一直認為留學該去歐美，而朋友則是認為我去台灣是為了旅遊和夜市（笑）。



# 中國大陸 (小豚)



## 為何想來台灣唸書？

一個人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唸書，背後往往有很複雜、綜合的考量，沒有一個簡易的答案。

當然對不少陸生而言，一個很實際的原因是，相比歐美和諸如香港、日本等亞洲其他區域而言，來台留學可以用一個相對能夠承受的花費獲取一段留學經驗，體會不同的學習文化環境。

並且，很多陸生還是會從學習的角度認真考慮，例如ta們看到台灣的性別研究和運動經驗非常豐富、**跨學科探索**走在亞洲前沿等等，這些都是ta們決定來台留學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些人因為來這邊旅遊/交換之後覺得這裡很好又或者因為來往兩岸認識了**喜歡的人**在這邊，進而想要在台灣長期生活一段時間，都是有可能的哦！



## 來台之後遇到過什麼差別待遇嗎？



當然真正來到台灣之後，會發現短期在台(旅遊、交換)獲得的印象跟要長期在這裡學習生活還是非常不同的。

在一個地方長期生活，生活裡就會充斥各種瑣碎細節以及要和整個社會體系打交道的時刻。

但倘若你在這個體系中被定義為僅擁有「次等權利」的人，而你又需要長時間生活在這個體系當中時，慢慢地這些東西就會成為你的**長期困擾**。

陸生在台灣生活面臨的差別待遇以及由此遭遇的困難基本上是圍繞居留身分展開的。

當初開放陸生赴台就學時，台灣政府便決議陸生身分僅為「**停留**」，這個歷史問題一直遺留到現在。

這導致這麼多年來唯獨陸生跟其他境外生不一樣，身分永遠只會是「**停留**」而非「**居留**」。然而這樣的政策規定跟台灣社會的運作之間顯然存在一個斷層。

首先，各種服務業(電信、網路、銀行、郵局等等)都會要求辦理人出示身分證/居留證，然而辦事人員往往不知道陸生沒有居留證，很多時候我們需要花力氣去解釋甚至說服他們，我們手上那張看著就不像是證件的A4紙(入台許可證)就是我們在台灣的身分證明。

有些要求嚴格的業務特別是銀行，甚至不承認這張A4紙，會要求我們另外用護照做擔保，或者只要不是卡式證件(居留證、身分證)就**不能辦理**某些業務。

作為「停留」身分的居住者，陸生也無法加入健保，除卻每次需要自己有足夠的錢先行墊付就醫費用，以及需要常常跑學校遞交各種單據、文件核銷醫療保險的不便。

最使人感到折磨的其實還是，每一次向習慣性朝你要健保卡的醫護人員承認自己沒有健保卡時，都像是在主動強調一遍自己不是這個社會中的一員，而你也透過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細節感覺到自己被這個體系排除在外。

如果說整個社會體系是一台運轉中的機器，政策規定下跟別人不一樣的陸生就像裡頭無法準確咬合的一顆齒輪，讓我們跟這邊的生活總是無法對接得那麼順暢。



除此之外，因為當初開放陸生時就有附加「三限六不」的規定，陸生也無法跟其他境外生那樣，在台工讀或領取政府獎學金，這導致我們有很多研究助理和獎學金機會也無法申請，而另一方面，陸生的學費又是所有境外生中最高的。

## 陸生的在台生活是怎樣的？

儘管政策上有很多差別待遇和不如人意的地方，大部分陸生還是盡力在這個地方耕耘出自己的生活，然後與這個地方建立起深深淺淺的連結，不管是情感上的、人際間的，還是公共事務上的。

我有不少陸生朋友其實已經算是在台深度生活，比如一些做音樂的朋友，就會跟台灣人組樂團，一起創作、演出；讀人類學的朋友，會跑去和原住民一起生活；有些從大學部就在台灣唸書的陸生朋友，朋友圈基本上都是台灣人，認識的大陸朋友反而很少，生活重心其實也在台灣而非大陸。

我還知道有相當一部分陸生其實深度參與了台灣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改造，比如有陸生參與記錄台灣推動流浪動物「零撲殺」政策的運動，寫了一本關於台灣動物保護的書，有陸生深入在台東南亞移工的遷移和生命經歷，最後也在台灣出了一本講東南亞移工的書……只是這些與台灣社會建立連結的嘗試和努力可能不為一般台灣大眾所知。



# 境外生的日常

## (馬來西亞僑生)



常被說「你中文怎麼說這麼好！」，  
其實我們也是從小說中文長大的……  
因為很怕曝露了自己不是台灣人  
而要解釋再解釋，  
唯有在外食點餐的時候、  
搭計程車的時候，  
全程開啟台灣腔mode。



我們到底能操多少種語言？  
華語、英文、馬來文是基本盤，廣東話、  
福建話、客家話、福州話、潮州話  
基本都能聽懂，  
日韓德法西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我試過解釋之後，有人即場跟我說一句福建話，  
問我聽懂沒有 =。=)



被問怎麼看黃明志的作品……

《XY》

「你們那麼喜歡吃咖哩，台灣也有咖哩啊！」  
可是台灣的咖哩是黃色不辣的日本甜咖哩，  
馬來西亞的咖哩更接近印度那種充滿香料的紅咖哩。

跟馬來西亞人說話的時候，  
鄉音會跑出來，  
然後會被問是不是從台東來的？



街上好難找垃圾桶，垃圾要分類。

「垃圾」在台灣讀「樂色」，  
「芭樂」唸成「芭辣」……



鳳梨酥裡面沒有鳳梨！  
那為什麼要叫「鳳梨酥」？

我以為馬來西亞的麵體已經夠複雜，  
我們有米粉、粿條、黃麵、  
伊麵、白麵、板麵、生麵、麵線、白粿……  
來到台灣還有更多要學的：板條、米苔目、麵疙瘩！



想盡辦法用台灣食材做異國料理：  
用台灣白菜和小梨醃韓國泡菜，  
用韓式泡菜炒飯，  
用日式咖喱磚加印度咖哩香料去煮馬來咖哩。







TVB

# 境外生的日常

## (香港僑生)



會被要求唱/教各種Beyond or《上海灘》or《古惑仔》的歌。但其實我的童年聽的是陳奕迅和容祖兒，Beyond我也只是偶然聽聽，《上海灘》則是上個年代的劇。不過《古惑仔》的歌我是有聽的。



好想要學會講台式國語，這樣就不會在譬如買菜、買飯、喝酒、社交、看醫生、買衣服、買鹹水雞等等時候，因為被聽出是香港人就被問到「怎麼看兩岸政治」但其實一夾雜英文就會立刻露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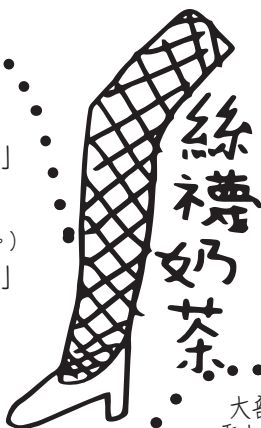
經常收到莫名其妙的「好意」，譬如「你是香港人嗎？我是高雄人！」  
(翻譯：我們一起獨立吧！)

「你是香港人嗎？放心，台灣人是民主的！」  
(翻譯：我不喜歡中國人，他們都是極權的走狗！)

「你是香港人嗎？我們這裡有言論自由！」  
(翻譯：香港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以後就沒有言論自由了。)

「你是香港人嗎？太好了！我也討厭大陸人！」  
(這句應該不需要翻譯吧)

但其實，當香港人  
不一定要符合上述種種意識形態標準吧。



會被一直要求表演講廣東話髒話……

看到燒賣攤檔把七種顏色的燒賣及糯米丸子都稱為「燒賣」時，覺得頭痛。

還經常在台灣的燒臘店看到不屬於燒臘的「燒臘」(譬如紅燒肉)在招搖撞騙。



大部分的湯，譬如貢丸湯，對香港人來說只是「水」而已！！  
(真正的湯是老火湯吧)

點了五次炒麵都發現是濕濕的麵時候，才發現原來台灣的炒麵就是長這樣的。

香港人對什麼東西可以沖進馬桶的容忍度很大。來到台灣發現有些地方會不允許人把衛生紙沖到馬桶去後，我都不敢告訴別人我們會把泡麵湯沖馬桶……

看到自己比起陸生多了很多獎學金機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馬來西亞同學表示認同)

反修例運動的時候，每天晚上看香港的新聞和追Telegram的訊息，擔心在香港的親友要聞催淚彈，然後徹夜失眠。

在香港的時候人會比較反叛，對政府或社會有批評會比較直接。到了台灣以後因為害怕說錯什麼都會被香港人講成是「丟香港人的臉」或被台灣人講成是「香港人和大陸人一樣都是沒文化的人」，所以說話做事都收斂了很多。

蕃薯原來叫地瓜，薯仔原來叫馬鈴薯，南瓜原來叫金瓜，最頭痛的是要把西蘭花說成是花椰菜，椰菜說成是高麗菜，還有椰菜花說成是白花菜，椰菜、花椰菜和白花菜的三角關係讓人頭痛。而且一開始還不會叫，去買菜只會用手指指。  
(大陸同學點頭如搗蒜)



台灣境外生的組成其實非常多元，來自不同陸生、港生、澳生至可憐個個體於其數多更開印的向必。

後語

# 境外生的日常 (陸生)



入境體檢時，要檢查好多項目。  
後來陪港生同學去做入境體檢，  
才發現：原來只有陸生要檢查糞便，  
港生不用檢查糞便……



被問到「有沒有看過海」  
或「你有沒有吃過薩其瑪」。  
而當你告訴台灣人薩其瑪是滿洲人的食物時，  
他們都會很驚訝。



我很想要講台灣國語，  
這樣就可以cover自己的他者身分，  
但有些字的台灣國語真的很難，  
比如「包括」的「括」是ㄍㄨㄛˊ / guā，  
而不是普通話的ㄎㄨㄛˋ / kuò，  
而且很怪，真的講不出來；  
如果哪一次真的講出來了，  
會覺得有點羞恥——  
為什麼我要強迫自己講一個這麼難接受的字，  
只是為了cover自己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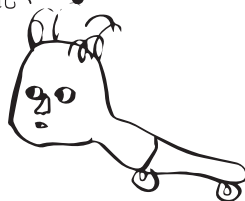
看到「北京火鍋」是酸菜白肉鍋時，  
覺得很尷尬。  
因為「北京火鍋」是涮羊肉。  
看到「蒙古烤肉」時忍不住告訴朋友，  
中國的蒙古沒有這樣的烤肉，  
「蒙古烤肉」是台灣人在美國發明的。



跟朋友說，  
我小時候都是看《海豚灣戀人》、  
《MVP情人》時，對方常常很驚訝。  
(原來大陸可以看台灣電視劇的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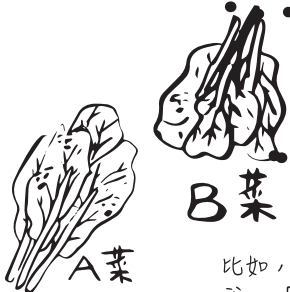


常被問到，  
「在台灣吃得習慣嗎？」，  
我都覺得很奇怪，  
大陸的菜系異質性超高，從西北、東北、  
中原，到西南、江浙、東南，  
對於一個上海人的味蕾來說，  
跟四川菜的距離可比  
跟台灣菜的距離遠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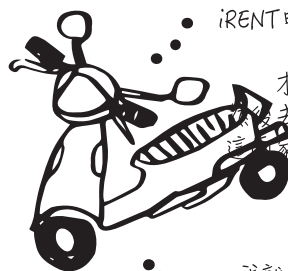
要教台灣的朋友，  
怎麼樣翻牆到中國大陸  
用大陸平台看劇，  
覺得很有趣。

最新的困擾是，  
現在由外國寄東西入台灣，  
都要通過EZWAY (一個APP) 進行報關。  
但是，打開APP才發現，  
「外國人」不能用EZWAY進行實名報關，  
只能用紙本報關。  
但問題是，如果在蝦皮之類的網拍買東西，  
店家不會做紙本報關的。  
所以，基本上的結果就是，不能買這些東西了……



辨識各種蔬菜在台灣的名字真的很難，  
所以在市場買菜的時候經常是亂喊的。

比如，  
我：「青江菜吧。」  
店家：「這個A菜喔。」  
我：「喔好，那我要A菜。」



要用共享機車和汽車真的很難。  
iRENT申請了二十次都沒有審核通過，  
後來去官網查了，  
才發現它只能本國人申請。  
後來去GoShare和WEMO的官網查了，  
這兩家都可以外國人用居留證申請，  
且只能是居留證。  
但陸生沒有居留證呀。  
所以，不論如何，  
我就是沒辦法用共享機車和汽車。

# (二)

專輯策畫 阿寶、Christine

# 疫情來了！ 國族分界下 的非公民

我們本來就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我們」並不指向國族共同體，而是在具體生活裡遭逢的每一個人。直至國家需要其合法性，直至疫情來了，一些群體需要被劃分為「我／我們」與「非我族類」。

第一篇〈流動與劃界：疫情期間的「非公民」的群像速寫〉，希望簡單呈現國家疆界的多義性，往往超出封閉／開放這樣的二元結構，基於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議程，對於不同跨國群體會採取不一樣的待遇。限於我們資料搜集的時間和心力，這個圖表提到的例子大概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初步勾勒了疫情裡全球不同地方的少數族裔、工商交流人員、留學生、親密關係對象、難民遭受的對待與採取的行動。一方面，在這個圖表中可以看到「非公民」被劃成不同的位階，特定商業利益被放在較為優先的位置，種族因素和兩岸政治讓某些群體首先被排除。另一方面，我們期待在台境外生不只在乎自己的權益，也開始關注其他被國族邊界排斥的群體，看見其他非公民的積極行動。

第二篇〈未竟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說起〉以2018年傅榆的紀錄片為引子，反思由吳介民提出的「第三種中國想像」的問題，提出了非公民政治參與所遭逢的困境與可能性。這篇文章提出的幾個問題是：看似創造了兩岸交流條件的境外生的政策，何以造成更大的劃界與敵對？這些疆界從何而來，透過跨地連結可以克服嗎？這篇文章雖然問題化既有兩

岸三地公民社會的前設，卻沒有否定跨地連帶的所有可能性，而是希望邀請大家思考，不同社會的行動者去想像或參與別的社會的論述與行動的時候，其中地緣政治、區域歷史、公民／非公民的劃界與制度的複雜性，並超越以一地為中心的連結。當然，或許我們不用太快跳到「地方」之間的單一連結，我們必須檢視微觀的、不同層次的交流互動。最後我們也觸及新近的「台港共同體」，說出當中一些隱憂和可能。

第三部分是境外生權益小組在九月至十月在「不再隱形——境外生的真人圖書館」邀來的幾本真人圖書的故事，設計上以單頁的形式穿插在小誌當中。這既是我們此輯有機的一部分，可以放在「非公民」的框架下理解其經驗，也是他們獨立的生命史，有自己的軌跡與重量。可惜的是，真人圖書館活動裡現場互動的氛圍無從還原，所以我們還是很期待大家可以在將來來到我們的類似活動。

第四部分是境外生感言。一方面，境外生權益小組實在無法代表眾多境外生的心聲，因此我們截取一些境外生給我們的留言，盡量把這本小誌做成境外生們的小誌。另一方面，這些感言補充我們的分析性文章和行動紀錄，可以視為是次疫情中境外生的情感檔案。

「非公民」不是新的身分認同，而是另一種視點，邀請我們看看國族邊界的形構與旁落在外的有血肉的個體。

## 少數族裔

### 台北車站黑白格

5月，台鐵一度以防疫為由，打算疫情過後永久禁止車站內席地而坐及群聚。台北車站一直是東南亞移工假日聚集地。除了移工以外，不少學生、旅遊人士和本地人也利用這個公共空間。事件一方面引起歧視東南亞移工的質疑，另一方面亦有反對「公共空間商品化」的聲音。在5月23日，即開齋節前一天，有人發起「坐爆台北車站，野餐唱歌靜坐躺臥皆可」活動。



端傳媒/Kevin Chao

### 光榮冰室事件

1月，中國大陸疫情大爆發的時候，香港很多人主張封關，醫護發起罷工。港府沒有全面關閉中港邊界，部分「黃色經濟圈」的餐廳在門外貼出告示，禁止講普通話人士入內。後來發生了「光榮冰室」事件，社會學講師黎明跟朋友希望與店主對話，強調「新移民也有手足」，不應以語言、出身地為界線排除他們，引來熱烈的辯論。

### 非裔在廣州

3-4月期間，由於COVID-19開始在全球爆發，中國擔心發生第二波疫情，在國內開始出現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請外國人滾出中國」之類的文章開始流行。其中在廣州的非洲社群尤其被地方政府部門、網民和一般民眾針對。

### 「China Virus」

COVID-19被廣泛視為「China Virus」，在西方不少亞裔人士遭到身體或言語攻擊，或在職場或網絡上遭到歧視。據CBS報導，截至7月，亞裔美國人有超過2,100宗相關個案。

# 流動與劃界： 疫情期間的

## 羅興亞難民

4月，馬國政府曾拒絕接受船上的羅興亞難民，稱疫情已使國家不堪重負。其中一批難民由孟加拉接收，當時已有數十人罹難。在孟加拉，面積僅二十平方公里的科克斯巴扎爾（Cox's Bazar）難民營，是八十六萬羅興亞難民暫時的「家」。5月，科克斯巴扎爾難民營爆發疫情。

## 歐洲難民潮

2-3月，土耳其開始協助難民突破土耳其-希臘邊境，要求歐盟向土耳其提供鉅額金援。大量難民滯留在邊境地區。9月9日，希臘「摩利亞難民營」（Moria Camp）發生原因不明的多起大火，難民流離失所，亟需後續的救援與安置。

## 難民

### 難民在美洲

巴西目前收容了三十四萬五千多名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目前難民中至少出現了十九起與疫情相關的死亡事件，其中九人是委內瑞拉土著難民，感染病毒的難民總數仍不得而知。3月，美國政府以防疫理由宣佈關閉邊界，至少2000名移民滯留在墨西哥邊界。



端傳媒/Nicola Zolin

### 香港CIC絕食抗議

香港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Castle Peak Bay Immigration Centre, CIC）羈留了295名違反《入境條例》的逾期居留者或非法入境者。羈留者因無法取得「行街紙」，等候時間由數日至數年不等，失去人身自由。

6月29日起，部分CIC羈留人士以絕食抗議，時間長達一百天，引發社會關注。CIC亦曾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過往曾經有羈留人士透露，中心衛生環境惡劣、鼠患自由橫行，並非人人戴口罩，擔心中心內感染風險高。

### 移工

「逃跑移工」主要是在台藍領移工，是目前的勞動法規裡較不受保障的一群。2月下旬，一名印尼失聯看護確診，勞動部表示對非法移工加強執法，移民署則鼓勵自行投案。3月17日起，印尼、越南、菲律賓及泰國等來源國的移工入境必須執行十四天檢疫，勞動部亦鼓勵優先續聘在台移工。11月底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因應印尼疫情嚴重和陰性報告「不可靠」，因此暫停輸入印尼移工，事件引來印尼官員質疑，認為可能是政治考量，台灣駐印尼代表處則表示出於防疫考量。另外，新加坡移工因為宿舍條件等問題，曾經爆發疫情，引起社會歧視移工的聲浪。



### Love Is Not Tourism

「Love Is Not Tourism」是一個全球民間運動，爭取COVID-19邊境管制裡跨國情侶和家庭的團聚。目前丹麥、挪威、荷蘭、冰島、瑞士、德國等地容許跨國情侶團聚，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則在限定條件裡容許未婚伴侶團聚。

## 親密關係對象

### 陸配與小明

截至2019年年底，台灣約有三十五萬名陸配。陸配與外配分屬不同法規管理，在台陸配分為「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定居」共四個階段。9月24日起，台灣才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首度開放「團聚證」持有者申請入境（多是新婚不久）。另一方面，原本陸委員於2月11日公佈專案讓陸配子女入境，後來因為民情洶湧，政策公佈翌日，指揮中心即表示撤回專案決定。直至7月16日，兩歲以下的陸配子女可以申請入境，8月13日可以在父母陪同返台，9月24日未成年子女可以申請入境。

### 脆危生命

因各種原因需要滯留於留學地者，疫情期間維持基本生計不易。此外，澳洲有至少三位留學生遭家暴殺害。

### 就學不安心

各國先後頒佈入境禁令，全球留學生受不同出入境政策所苦，無法返校就學。其中美國政府禁止修讀網課的國際生停留在美國國內，由哈佛、麻省理工等多家美國大學則反對相關規定，控告美國國家安全部。

## 留學生

### 留學生返國潮

歐美疫情迅速擴散後，不少留學生社群出現集體返國潮。在中國，由於海外留學生中有確診新冠肺炎者，引發社會對「千里投毒」的指責及討論。

### Rent Strike

延續過往的rent strike傳統，在更嚴峻的疫情期間，英國薩塞克斯、劍橋、牛津、愛丁堡和倫敦市內多家大學學生均有發起罷交宿舍租金行動，提出免除或調低租金、改善住宿環境、檢疫期間的膳食質素等不同訴求。其中曼徹斯特和布里斯托大學均表示調低30%宿舍租金。其中一部分國際生表示疫情期間被迫困在宿舍，而本來維生的工作機會丟失了，因而參與罷交租金行動。



## 工商交流人員

### 有限度醫療觀光

7月底，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為發揚「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的精神，照顧過往在台灣治療的國際病人，衛福部將依醫療必要性、療程延續性及風險性等原則進行審查，協助海外人士來台接受醫療服務，部分醫護人員代表稱該方案公佈前未有跟醫護人員溝通，要求暫緩。1月1日起則暫停國際醫療。

### 「旅行泡泡」

「旅行泡泡」指疫情相對受控、對彼此防疫措施互相信任的地方，可以簽定協議，放寬邊境限制，實現人員往來，尤其指向短期商務旅客，部分協議內容包括免檢疫、不限制旅遊範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國在5月開始實現「旅行泡泡」，對象包括商務人士、學生和旅客；10月起，從紐西蘭出發可以免檢疫進入澳洲大部分州；新加坡和香港早前亦計畫讓十四天內未出國、有陰性證明的旅客來往兩地，後來因疫情延後。指揮中心表示，6月22日起，商務人士如符合短期入境和來自低風險出發地等條件，並取得核酸檢驗陰性報告，可以申請縮短檢疫日數至五日（低風險地區）或七日（中低風險地區），取得陰性檢驗報告後選擇「自主健康管理」至第二十一日。10月底，指揮中心比照國外做法，考慮「經濟泡泡」——重要商務人士或公司免除居家檢疫。本土案例重現後，於2021年1月1日起暫停縮短檢疫。



# 未竟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 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說起

## 前言

境外生權益小組一直強調不分國籍的在台境外生的社會權，不過小組成員來自香港、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對於華語社會有較多在地觀察，亦曾涉足與觀察不同的社會運動，因此此文特別以「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為題。

這篇手記以10月30日小組在「北風社」舉辦的電影放映及映後談為藍本，加上我的一些補充。當天大家一起看傅榆執導的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2018），主持人Lala邀來嘉賓小魚和KK交流。KK對於兩岸三地公民社會有許多個人經驗和思考，她是第二屆陸生，於2012年來台，《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影片拍攝的時間段——2011年至2017年左右——的社會運動發展，正正與KK認識的台灣社運重合。她提出了自己對於陸生去政治化的觀察、作為318運動參與者的經驗以及對「第三種中國想像」的批評。導演傅榆一直在線上參與我們的討論，跟我們講了很多拍攝、剪接、放映前後的構想和經歷。小魚是台灣資深的社運參與者，亦一度參與318運動的決策小組，她分享了自己對台灣社運的困境的觀察，深化我們在紀錄片裡看到的對318運動的反思，由於本文以兩岸三地串聯為題，故小魚的部分請見完整版側記。這篇手記是為映後的其中一種延續方式，給所有對於境外生的政治參與與兩岸三地公民社會感興趣的讀者批評和指教。

## 「第三種中國想像」： 從《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說起

吳介民在《第三種中國想像》中強調台灣是主權受威脅的國家，而且跨海峽的資本聯盟已經形成，由於越來越難以擺脫「中國因素」，不如反守為攻；台灣經營其價值高地，取得華語世界的「文化領導權」，這個領導權的內涵就是民主、人權、文明性、在地多元文化等「普世價值」。在這個前提之下，他認為兩岸應尋求民間進步力量的連結。他又認為，台灣應以「華語世界」來思考與中國的關係，而不是族群性，並以台灣社會為出發點，讓中國進入全球公民社會。從表面上看來，「第三種中國想像」似乎突破了統一或獨立的絕對路徑，強

調在保有台灣國家主權的前提下，把「中國」分成「中共」、「中國官僚資本」和「中國社會」三個層次，讓兩地公民有善意的交流和協作，這就提供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積極反對分離主義及台灣民族主義者全面反中（包括中國人民）以外的空間。<sup>1</sup>當然，在吳介民的討論裡，「民主」主要指向以主權國家為前提的現代民主政體。<sup>2</sup>

傅榆受到吳介民的設想啟發，最初的拍攝企畫試圖捕捉和促進「第三種中國想像」的實踐。由此出發，《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特別選了兩個運動人物——一位積極擁抱台灣民主制度和參與社會運動的陸生蔡博藝和獨派青年、後來太陽花學運領袖之一的陳為廷。傅榆亦不只拍攝她設想的「第三種中國想像」，同時付諸實踐，在318運動前帶陳為廷前往中國與香港進行串聯；導演在中國跟拍了蔡博藝的新書分享會部分片段，同時拍到陳為廷入境中國的過程，陳為廷意圖挑戰禁忌，穿著六四T恤到天安門廣場，以及小部分陳為廷跟中國朋友吃飯聊天的場面；在香港的部分比較清楚和明確，就是2013年的學民思潮與陳為廷的串聯，從片中兩方互動的熱絡程度大概可以感覺出來他們可能在之前早就認識了，飯後他們一起大合唱Beyond的〈海闊天空〉。或許基於保護被拍攝者、行程時間等因素，除了特定人群的連帶，以上片段並未讓觀眾知道他們串聯的政治議程和深度，陳為廷對於這些兩岸三地串聯的思考，他們對於這兩地社會的調查和理解等等。

影片的預設卻遮蔽了蔡博藝的非公民身分的運動實踐，以致於只單向地呈現蔡博藝比主流台灣人更積極參與台灣運動、似乎比台灣人更愛台灣的形象。當蔡博藝因為陸生身分，在校園選舉中的參選資格備受質疑，導演對此的態度卻猶豫不決，可見她與蔡博藝之間未能全然互信。正如映後座談裡Lala提到，蔡博藝的運動傷害就明顯來自她的非公民身分，例如她在318運動現場看到有人罵「支那賤畜」時眼泛淚光，在大學參選資格備受質疑。「非公民」要按照國族主義的議程，才能夠被台灣公民社會所看見。影片僅僅在蔡博藝參與運動時被告知遭返風險時，凸顯境外生在法制上的特殊性。我認為「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預設本來就強調台灣作為主權國家和民主化的領導位置，跟「非公民」的政治議程並不相容，或至少說「非公民」

不是其設想納入的問題意識之一，以致於影片無法深化展現「非公民」的部分，這呈現在選材的取舍。比方說，傅導演說她跟拍了蔡博藝參與境外生運動的一段，為什麼沒有呈現？境外生運動對「不分本外」、「共同生活」的政治理念，與蔡博藝參與的其他運動的訴求是不是有著一些差異？為什麼她參與的不同運動的不同政治，好像被呈現為「台灣人都不知道的本土社會運動」或蔡博藝融入台灣，例如她努力地學大家講台語，而沒有挖出蔡博藝是怎樣思考這些不同的運動的政治思考？

總體來說，《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是一部拍得細緻的紀錄片，把運動的大敘事底下由政治、家庭經驗交錯的幽微的個體心路歷程攤開來。不過上述對串聯的思考與「非公民」的盲點是我們觀影以後感到疑惑的地方。當然一部紀錄片沒有必要回應所有問題，但這部電影是一個引子，讓我們通向這些問題。

## 陸生政治冷感的特殊化

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最後的部分，導演明明白白地推倒最初「第三種中國想像」的設想。根據電影，這個失敗來自兩方面：第一個就是影片結尾提到的，傅導演單方面把過多的期待和重擔投放在二人身上，而且我們實在不太確定影片拍攝前導演跟兩位人物有多少對於「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討論；第二是中國政權逐漸收緊言論與行動空間，傅導演拍攝著陳為廷在318運動後不能入境香港便是一個暗示。不過是不是僅止於此？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不用跳到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這樣的宏大敘事，而先從這樣一個現象提問：表面看來成就了兩岸交流條件的陸生政策本身，真的有促進兩地交流嗎？也許我們無法總體地斷言答案是或沒有，這個過程中的影響力尚待更多觀察。不過像蔡博藝積極參與政治的心態，和部分陸生退守到國族主義的現象，應當如何解釋？

KK補充了《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以外的去政治化的陸生的心理構造。她認為，一方面，大部分境外生都有過客心態，只專注唸書或來台灣玩就滿足。另一方面更深層的構造是，在中國大陸的時代環境的養成中，「政治」對大部分人來說就像「黑洞」，是一種未知的感覺，因為不知道那是什麼卻又有著「黑暗」與「危險」的印象，所以保持距離，這是陸生對政治感到顧忌的一個關鍵心態。本來大部分陸生和境外生在台灣的經驗都是美好的，很少人在現實生活裡被人面對面指著罵或明顯歧視。當這次COVID-19疫情出現，主要在媒體和網路出現的對境外生的敵意，與本來的日常生活間

出現了很大的斷裂。對於很多陸生而言，他們本來對於政治沒有充分理解，要解釋這個斷裂，找到自洽的說法，就是用一些最安全、接近中國政府的說法，例如台獨勢力，這樣既可以解釋這些惡意，又不會跟自己日常生活經驗矛盾。她認為這種抽離的說法，或去政治化的傾向，同樣見於很多不參與社會運動的台灣人，並不是特有於陸生的現象。

KK也指出，她自己在台灣仍然遇到不少陸生關注和介入台灣的運動，絕不只蔡博藝一人。反媒體壟斷運動、苑裡反風車、大埔農地徵收等，都是KK認識台灣的節點。她特別分享了許多她在318的參與。當時她是站在反對自由貿易的位置去思考與參與這場運動，這不只是兩岸議題，也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的浪潮下的問題，她也帶了「反對自由貿易，超克反共反中」的牌子去運動現場。其中一個最深刻的片段是她在3月24日衝行政院：在行政院後門的院子裡，前排有個男生喊「中國的狗出去」之類的話；她在等待警察清場的時候，有一個很緊張的感覺，不是怕警察，而是她自己會不會被辨識出不是台灣人，被轟出去。當KK看到紀錄片裡蔡博藝看反中新聞，眼泛淚光的時候，KK覺得她的感受不是委屈，那是一種厭煩的感受——為什麼我要處理這樣東西？為什麼我要感覺這些東西？不過這些被排除的感受以及境外生的參與，通常在國族認同的議程裡不被看見。

從KK的發言裡，我們知道所謂「陸生」來台的動力、遭遇台灣民族主義的反應、政治參與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的。在此我們並不是要以蔡博藝等例子來強調陸生的政治參與，更準確來說是陸生參與社運和去政治化兩種現象都同時存在。更重要的是，政策上「陸生」被特殊化，對於政治參與的想像，「陸生」更加被特殊化，似乎在中、港、台的格局裡，「民主」都有「族群性格」，我們都只以地域和族群來一刀切劃分民主和極權。

## 一廂情願的「兩岸三地公民社會」： 死局、另途、困境？

KK認為「第三種中國想像」本來就有很大的盲點——這個想像不能處理中港台三地內部的被預設的位階，這個想像中台灣有最高的位置，台灣就是一個比較文明和民主的地方，預設了台灣人比較容易接受民主，很多大陸人被「洗腦」。這個公民運動的基準是以台灣為中心的，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位置都不明確，也沒辦法解決大陸人被歧視的問題。

Lala補充道，這種兩岸三地的位置除了是一個概念上的位階，也有實際的制度在其中操作。因此台灣的台灣人、港生和陸生的實際權益被分成三個等級，在疫情期間首先被排除的是第三等的陸生，

然後是第二等公民港澳生。因此境外生權益小組不分國籍，嘗試克服這些台灣政府設置的位階。這個「等差性納入」<sup>3</sup>的治理不僅僅展示了公民與非公民的對立，而是「非公民」本身都被國家劃成不同的位階，將更不符合國族或資本主義議程的「非公民」劃成剩餘人口。

這意味著「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陷入死局嗎？

KK認為，大家還是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微觀層面思考跨界的可能性。大家不必然要把陸生來台視為促進兩岸三地公民社會串聯，不必先接上一個大敘事。她認為，當一個人跨越了一道邊界，來到另一個地方，看到與自己本來的生活環境不一樣的東西，這種新的遭遇已經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展開不同的可能性。最後這個人離開台灣，不論他對台灣評價好不好，至少他真的張開眼睛觀察這個社會，由此得出他的判斷和結論。對她來說，最悲觀的事情是，不管是境外生、陸生、台灣大眾，很多人看到跟自己不一樣的東西會有「逆向幻覺」——對存在的事物視而不見，完全退回到自己本來安全穩定的位置。換言之，我們不必浪漫化兩岸的學生交流，甚至這些交流不止於地理疆界，日常生活裡就有著各種被劃下來的界線。

傅導演回應大家的討論，她認為「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的另一可能路徑是達致三地相互同情和理解。她詳述了她和陳為廷往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旅程的經驗：當時他們在中國大陸待了八天，但電影只用了很少片段。當時中國有《南方週末》事件、香港有反國教事件、台灣有反媒體壟斷運動，他們隱隱約約覺得是可以串聯的點，因為好像共同對抗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後來她發現《南方週末》很具體地知道他們的稿件被什麼力量換掉，而台灣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好像在面對一個抽象的「中資」，這個資本可能會壟斷台灣人的媒體。因此，他們跟中國大陸朋友討論的時候就有很大的落差，各說各話。後來他們也拜訪了另一位媒體人，當他們講到「第三種中國想像」，那位媒體人就講到每個社會有自己各自的問題，需要自己解決，傅導演反思到跨海峽公民社會想像不能把期待放在別人身上，忽視掉自己應該要處理的問題。不過傅導演引述那位媒體朋友的說法，他並不完全否定「第三種中國想像」的「跨海峽公民社會」，唯一能做的是對彼此有互相同情和理解的心態。

不過，在兩岸民族主義敵對的大趨勢裡，彼此互相同情和理解又談何容易呢？如何可以跨出第一步？

Lala指出，當我們前往或想像另一個地方的時候，我們背負著原居地的歷史，而且這些歷史也往往不只有兩岸或中港之間的糾纏，而是要把「東亞」和「殖民宗主國」等跨國視野帶進來，才

能知道兩地人民難以溝通或可以連結的因素。她舉例說，例如中國想像台灣，中國民族主義本來就由中日甲午戰爭至二戰的記憶所強化，這樣的視角如何思考台灣與日本殖民時期非常糾纏的關係？例如香港去想像中國，除了當代「中國崛起」的事實，也是帶著殖民宗主國帶來的經濟地位，以自己資本主義秩序的「優越」來想像中國的社會主義的「落後」。事實上，正如社會學學者汪宏倫提出，當我們整理民族主義的歷史，那不只是國家內部建立的政治社群，民族主義需要民族他者和敵我之辨，所以同時是地緣歷史和共時區域內不同國家之間的糾紛，這些國族的框架會相互扞格。他引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來說明「國族之框」的問題，並指出戰爭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有密切關係，甚至不少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合法性也陪隨著戰爭的歷程和記憶，「國族之框」基本上可以說是「戰爭之框」的制度化結果。<sup>4</sup>表面上境外生和台灣朋友都有共通的空間可以溝通（至少在網路上），不過當境外生坦誠說出自己被差別待遇時受傷的感受，會被好些網民批評為「情感勒索」，為什麼彼此的感知無法互通？借用巴特勒的理論語言，當兩個戰爭之框衝突，生命也區分成「可悼的」（grievable）和「不可悼的」（ungrievable），只有符合己方戰爭之框的生命是「可悼的」。當我們要鬆動某些框架，必先指認框架的內容，因此我們要梳理各種戰爭之框（國族主義生成的歷史）如何阻止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感知和體驗交流。

除了歷史因素，技術與媒介亦不斷鞏固各地疆界。例如按照互聯網使用習慣來說，平常喜歡用臉書（現在還有mewe）的港台朋友與使用微信和微博的中國民眾基本上是處於「平行時空」來接收資訊。例如有陸生向北京政府抗議取消陸生赴台，但臉書上批評境外生只針對台灣政府的台灣民眾可能對此沒有認知。由於網路上同溫層問題和論述上的方便（或偷懶），某些僵化的再現反覆被流通，因此很多人也直接把中國民眾視同「小粉紅」。另一方面，陸生群體裡也不乏抱團取暖的現象。很多時候這兩邊的交流都是一次論戰的大爆發，一方面當然激發了不同論點和討論，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因而感到受傷，更加退守自己的同溫層。

尤其是國族和地理疆界逐漸地變成「自然而然」的存在，其中的歷史、政治、經濟、技術的構成不被檢視。我並不否認有些國家有較強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不過單一沿用「強國 vs. 弱國」的框架，忽視了疆界的多重性，未有問題化內部／外部的關係（例如「在地」也往往是由不同的難以區分外部與內部的力量構成），讓我們錯過很多細部的權力關係。如同戰爭之框的問題，疆界的物化問題是跨地



共構的，因此反思也應該是兩岸三地共同進行的。

## 「台港共同體」： 僅僅限於國族和政黨政治嗎？

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看似失去聲量之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最新的共同體想像，用以對抗「中國霸權」。有別於一直以來台港兩地的各種交流，太陽花和雨傘運動後是兩地地域認同的現象。

活動當日Lala表示，目前台港串聯的隱憂是國族主義和互相利用的心態。民進黨以「香港」催生「亡國感」，香港人也願意自己被用來換取蔡英文的選票。當有境外生批評民進黨的時候，很快就被質疑為「假香港人」，因為「真香港人」對民進黨的立場宣示或幫助「感恩」。延伸Lala的觀點，我期待超越國族主義的「台港共同體」裡「台灣」和「香港」只意味著有更多條件論述及行動的場域，並不指向特定的族群；而擺脫互相利用的進一步就是互相看見，例如兩地的「中國因素」是否有著不同的脈絡和政治經濟處境？除了國族議題以外，階級、性別、生態等不同議題呢？

2020年初我在台灣大選裡民進黨在台北的造勢大會現場，看著有人在揮舞著「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旗幟，也看到臉書上一堆香港朋友表態支持民進黨，分享小英的消息，對台灣的民主制度表示羨慕。然而，當有人質疑民進黨以香港的運動吸納選票，就惹來大量攻訐，例如強調台灣幫忙香港人不是必要的責任，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對於香港難民的發言便是一例。而台灣這一邊，根據林宗弘和陳志柔在台灣大選前的社會意向調查，支持反修例運動占68%，而對運動取態與投票意向亦有

相當密切相連性，非常支持運動的民眾中，有87%表示支持蔡英文，支持運動的民眾則有60%支持蔡英文。<sup>5</sup>換言之，至少可以說相當大程度上「台港共同體」是香港抗爭者與民進黨的連結。選舉不久之後就是COVID-19爆發，這時候作為「防疫模範生」的台灣，又繼續成為許多香港人羨慕的對象。化約來說，台灣政府的「民主」、「反中」、「封關」都被視為防疫成功的要點，中國政府的疫情爆發是由於「極權」、「資訊不透明」，而大多認為由於主權和政制問題，香港無法自主落實封關，導致疫情爆發。<sup>6</sup>

儘管台港關係看起來依然緊密，疫情曝露了這兩年來由媒體論述和選舉工程搭建的「台港共同體」似乎搖搖欲墜。至少在不同層面的台港交流中，只有特定的香港民主運動議題被彰顯。境外生權益小組早前收到一則投稿，一名剛入籍成台灣國民的香港境外生家長已跟丈夫搬到台灣，在這邊有車有房，他們年初投票給民進黨，後來因為港澳境外生被禁止入境，決定先在香港陪伴兒子，多次致電政府部門請求延緩各項繳稅不果。<sup>7</sup>我當然樂見民進黨政府能夠協助保障港人的人身安全，不過也不希望其他重要議題被掩蓋。

不過隨著來台定居、工作、讀書的香港人愈來愈多，這些遷移都需要更深的扎根，對移居地更多的理解，這到底會不會稍為改變香港凝望台灣的玫瑰色濾鏡，又讓思考香港的不同距離變得可能？還是流亡心態永遠寄望著「香港」，在地政治是相對次要的？同時對於台灣和香港的行動和串聯可能嗎？「台港共同體」自然可以是複數的、對應不同議題和不同形式的串聯，目前仍然在不斷發展當中，需要更長時間來觀察。

### 註腳

1.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左岸文化，頁27-63。
2.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左岸文化，頁74-75。
3. 「等差性納入」（differential inclusion）源自Yén Lê Espiritu討論美國對於不同族裔的治理。Yén Lê Espiritu, Lisa Lowe and Lisa Yoneyama. 2017. "Trans-pacific Entanglements," in *Flashpoints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 edited by Cathy Schlund-Vial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4. 汪宏倫（2014）〈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台北：聯經，頁159-225。
5. 林宗弘、陳志柔（2020）〈蔡英文的817萬票，亡國感、年輕人、菁英藍幫了多少〉，見「端傳媒」，2020年1月15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15-opinion-hk-china-age-taiwanelection/>
6. 例如港星杜汶澤（同時是具有政治觀點影響力的粉專）曾表示台灣防疫成功是因為民主政制。見〈杜汶澤盛讚：台灣抗疫有成 歸功於投對票！〉，見《自由時報》，2020年2月23日，<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077549>
7. 原投稿貼文請見「境外生權益小組」臉書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tis-movement/photos/a.1805129959775384/2828475457440824/>

完整版側記請見





# 真人圖書館

TT、鈴鐺、丁仔、  
康偉、隆秀

## TT的場合 (一)

我是交大的境外生，在台灣已經有七年的時間。我是八月底入境的，現在正在台灣的防疫旅館隔離十四天中。

我在今年一月底回到北京過年。我可能一年也只是去北京一次。一月底先是看到暫緩陸生入境十四天，當時都是以為是台灣想我們自行在家隔離一下，二月初就可以回去了，結果二月，台灣在沒有宣佈限期下暫緩陸生回台。我當時還是比較樂觀，覺得可能也是一、兩個月，但同時也覺得回不了台灣了很糟糕。

我已經是讀博士班N年級了，在台灣也很長時間了，所以不能回台灣對我影響很大。不能回台灣讓整個生活都中斷了，我所有生活的內容和物件，基本上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在台北。我除了直系親屬以外，沒有任何的連帶是還在北京。但現在，突然無法回到你所有生活基底，就像是你在聽一首熟悉的歌，然後被按暫停鍵後切換了一首你沒聽過的歌那樣。就好像換了bgm那樣，日常的每天都不一樣了。

每天醒來的時候，我就會發現我看不到我的家、我喜歡的床單、窗外台北的天氣。我台灣的家窗外有一條高架橋，但在北京都看不到了。然後我的機車、我喜歡的餐廳、咖啡館、我喜歡散步的河堤，都從生活中消失了。有時候我醒來就下午了、或者就看到夕陽了，就只是看到北京灰濛濛的樣子。這個感覺就好像有一隻從天上掉下來的手，像夾娃娃機的夾子那樣把我抓起來，丟到北京，但那裡已經沒有我熟悉的東西了。有點像是坐牢的感覺：有一個強制的力量，把你丟到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不能離開的地方。這是一種中斷的感覺。

這種中斷的感覺是因為我對台北很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對北京的不熟悉。我快十年沒有在北京生活了，北京很多東西也改變了。過去的朋友都上班很忙，或者出國了。新建的好多地鐵線和路我都沒見過，家人現在住的房子也不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基本上我就沒有熟悉的東西了。

很多台灣人會覺得：境外生卡在老家沒事啊，你家不是就是北京嗎？可是，台灣不是很多人都有移動的經驗嗎？譬如南部人在台北工作，只有節日才會回到南部，很偶然要回到南部的時候，難道不會也有待不住、好難受的感覺嗎？那對境外生來說，也是同理，只是我們的移動要穿越一個國界，移動到另外一邊，待在所謂的自己家鄉那個國家。那個被迫移動和逗留在你不熟悉的地方，使人感覺很不好，對一般民眾而言並不是那麼難理解的事，不過好像跨越了國界以後，事情突然變得難以想像了。

## (二)

剛剛不能回台灣的時候，陸生是有努力過的，但當時狀況不好，國際疫情比較嚴重，所以那些行動很快就平息了。二月開始吵「小明」和陸配相關的議題，我因為要搞行動，被迫要追看網路上的仇恨言論。當時我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但緩一下，就可以察覺到它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特別當那些言論和自己身分相關。

後來我很刻意地不讓自己看相關新聞和討論，但還是無法做正經事，然後就進入了癱瘓期。我在北京什麼都不能做，每天就是躺在床上看電視二十小時，因此變胖了好多……這些都讓我覺得很自卑。這些感覺加乘到本來的難過裡面去，我慢慢發現我無法思考。我本來是人文學科的學生，是很擅長閱讀的，但我當時開始有閱讀障礙，無法讀完一個段落的文字。連帶著的思考也是，只要我一想到我要開始思考了，我就發現我不想去想任何東西。然後我就只能看電視，這些都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一切要到了五、六月才好一些。當時疫情稍微好一點了，教育部和指揮中心有點鬆動，境外生可以有一些行動，我的心情才變好。但二月的仇恨言論比較多針對「小明」和陸配，六、七月的仇恨言論就是針對境外生。當境外生變成議題，有了更多曝光度，但也是前所未有的攻擊。

這給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撕裂，就是我身處其中的社會——台灣——的撕裂。撕裂帶來了情感的創傷，日常會無法行動、思考、集中，也不想理別人，只想把自己好好地保護、包裹起來。對我而言，創傷也是由很具體的事件造成的，當二月境外生還沒變成「議題」的時候，我曾經以為和我想法、理想很相近的朋友，不會旗幟鮮明地反對境外生、「小明」返台。當時我有一種同溫層破滅的感覺。其實我的同溫層已經相對安全了，所以我也會反過來想，如果連我的同溫層都破滅了，那其他境外生的同溫層——就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會一起吃飯、生活、玩樂的那種同學——應該有更多破滅的問題吧。

這個破滅帶給我的另一種感覺是：過去我在台灣的感覺都是我幻想出來的。以前我和其他人走在台灣的路上、補班、補課，走一樣的路，吃一樣的東西，做一樣的事情，在日常生活裡不會覺得自己和其他人有什麼差別。雖然台灣社會的反中構造一直是明確的，但同溫層還是讓我對這個社會有一些安全感和期待。但這個事件，讓我覺得過去都是我一廂情願。只要有危機發生，我就會被很簡單地拿走、被割掉，而這是沒有成本的。我會被排除在這個土地外，這個感覺才是最糟糕的。但我卻投入了那麼多生活和情感在這裡，我整个人生都是在台北。而且，我覺得我對台灣社會的關心和理解可能比很多台灣人都要多。但是，對台灣人來說，我的這些不曾存在過。我發現自己哪裡都不屬於，那個才是創傷的核心吧。

我現在在防疫旅館，其實很害怕回到台灣，面對外面的世界。但是在想像如何和外部建立連結前，可能是先要更好地分析和陳述自己的狀況，然後在此之上，才可以想到怎麼面對這裡的人吧。

## 鈴鐺の場合

### (一)

剛確定可以返台之後我猶豫了，光隔離費就快要一萬人民幣，對我來說太貴了，本來已經想著再休學半年不回了，考慮了兩天之後決定回，半年之後的情況太難預料，不知那時候還能不能回。其實我在台灣沒有待很久，一共一年半，由於疫情不能返台，就休學了一學期，在國內待了半年多。半年前，在剛剛意識到半年內甚至更長時間不能返台時，我特別想念台灣，過了半年那種思念就開始慢慢淡去了，奇怪的是，在我決定回去之後，我對台灣的想念又開始排山倒海地湧來。

我最想念的是台灣的同學和老師，她們是我在台一年半最美好的記憶。即使是我人在中國的這半年，她們也提供了我很大的支持，疫情初期特別缺口罩，到處都買不到，不只我家，包括親戚也都到處借，我還有親戚在超市工作，疫情期間不得不上班，也沒有口罩。當時台灣口罩也寄不出來。我所上的馬來西亞同學，從馬來西亞給我寄了一大包口罩，我分給親戚們一部分，簡直對我有救命之恩。那時間我整個人是緊繃的，我本來就有焦慮症狀，那幾天更是，一天沒有多長時間是沒有在刷手機刷疫情相關的各種消息的，一直在刷啊刷，肉體的感知彷彿已經麻木了、消失了。可能也是為了讓自己可以不用那麼焦慮吧，所以會一直刷手機，結果越刷越焦慮。

在管制最嚴格的那段時間，我們小區每兩天、每一戶，只能有一個人出去採購生活用品，我家是我爸出門，他每次出門，我們全家都高度緊張，爸出門前給他一次性手套，提醒不要亂摸外面的東西，不要隨便跟別人講話，買完趕緊回來別逗留，回來之後消毒衣服，消毒買回來的東西。家裡有剛兩歲的小朋友，我甚至想過，我寧願自己死掉也不能讓小孩子感染。我的台灣同學從台灣給我寄了一大包零食，莫大的安慰。搞得我姐不停追問我，同學是不是在追我。是啊，不是說兩岸還在戰備敵對狀態嗎，「敵人」為啥對你那麼好。我說我姐對「愛」的認識太貧乏，不能想像我跟同學相處了一年多，我們關心相同的議題，我們的敵人不是對方。

### (二)

2018年的時候，對於要不要去台灣唸書，我猶豫了好久，我所讀的學校被中國的朋友戲稱為「野雞學校」，學校沒什麼名氣，那個學歷沒什麼競爭力，而如果說要體驗不同的文化，台灣也沒有真的很大的文化差異。但我來了之後覺得很慶幸有生之年能在台灣生活幾年。我很喜歡台灣的藍天和綠地，喜歡人們溫和有耐心。

一年多的肉身相處，我有時也會覺得，台灣人也挺辛苦的，可能來自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好像不知道自己是谁，台灣也有自己的掙扎和撕裂。有一次我去參觀鄭南榕紀念館，有不少香港和台灣學生，我們就聊起國族身分的問題，有一個台灣同學跟我說：我們知道自己不是中國人，但對於我們是誰台灣內部還沒想好。這句話很觸動我，這個問題我也很有共鳴，作為一個性與性別少數，對於自己的性與性別身分的認同我也是花了很多年去摸索。很長時間以來，我只知道我不是什麼，但對於我是什麼，想要什麼、喜歡什麼，我也不知道，要去找、去確認。那種不找不到地方安放自己的不確定的狀態，會讓我很沒有安全感。那個同學的話，就是觸動了我生命經驗中的東西吧，就是那種不安。

我2018年入學，在台灣一年半期間，正好經歷了公投和大選，我也看見台灣社會為了這個議題，在家庭或社會有很大的撕裂。公投的時候，有因為和家庭意見不同的孩子離家出走的，甚至因為同性婚姻和同志教育的公投失利，有學生跳樓自殺。當時讓我覺得很悲傷，台灣社會因此承受很大傷痛，當台灣人還挺不容易的。另外，中國也是對台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是很複雜的，有一些東西我可能還搞不懂。有時候我也會想，作為陸生，我是否也要為此承擔一些什麼，至今也沒有答案。

在這次境外生抗爭過程中，很多陸生團結起來爭取公平權益，我也參與了一些事情，因此認識了一些朋友，從ta們身上我看到一種很珍貴的東西，我之前有想過，但沒想到是可能的——那是超越國族身分的連結和愛的可能，給我很大觸動，想了很多事情。很多時候我們只會對切身的事情有感覺，政策影響不到自己的時候就不會想爭取，甚至影響到自己了，看到有別人在爭取，自己也想搭便車。像境外生政策，不同階段影響的人群也不一樣，首先是陸生，再來是港澳生，再來就是外籍生。有些群體為了自己的權益跟其他群體切割，一方面我能理解，但是相比之下，我看到另外一些朋友卻會為了不關自己的事奔走呼籲，ta們讓我看到一種超越身分的連結的可能。

最後希望我們都能早日在台灣相見，希望我自己能早日喝到好喝的珍奶 

## 丁仔の場合

### (一)

我是丁仔，是一個香港人。目前在新竹一家大學唸人文社科類的碩士班。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受到了台灣文學、電影、社會運動方面的影響。當然我沒有辦法說我很了解台灣——很奇怪的是，比起去別的地方留學，我應該已經足夠了解台灣了才對。結果真的來到這邊唸書，才發現原來我對於台灣如何從「從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幾乎是一無所知。可能上了研究所，最大的體會就是比較誠實地說：我還有有些事情是尚未充分掌握的。當一些社會爭議發生，大家吵得天昏地暗時，如果多一些人也認識到自己的限制，在言語上可能就會多給對方留一些餘地吧。因為要相信自己不是全能的、全知的、什麼都是對的。

我大學畢業之後零零散散地工作了一整年。當「返工狗」很累，非常希望離開香港。我是很想繼續唸書的。要升學的話，我覺得在香港已經待了好幾年了，是時候去別的地方，看看人家在關心些什麼問題。這對於我去反過來思考香港，也許會帶來不一樣的啟發。現在回想，當時香港社會氣氛也有影響。那時候雨傘運動已過了兩、三年，而反修例運動還沒有開始，雖然很多團體很用心地在做倡議、做社區組織，裡面也有不少我認識的人，但整體社會氣氛還是有點死氣沉沉的，好像進入了某種低潮期。我還沒有下定決心要走這一條路，一直很懷疑自己適不適合。

另一方面也因為我在香港的生活受到了很多限制。我爸爸媽媽在香港有一套十坪的房子，要住一家四口，每個人可以分配到的空間很小。我在大學期間一直住校，畢業後正式搬回家，很多地方都不習慣。空間條件很影響到同住人之間的關係。我弟弟有一個小房間，我爸爸每天工作時間很長，只有晚上在客廳待著。比較大的衝突來源是我和我媽媽，我們用同一個房間，每天晚上一起睡在一張很小的雙人床上，同時我也要在那個房間工作。那一年我跟媽媽的關係挺緊張的。她對於我想要讀書這件事情的想法很反覆。有時候她會表現得很支持我，有時候又會抱怨我無法工作養家，而我媽媽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想讓我和弟弟趕快賺錢，在香港換一家大房子，然後我們一家人可以永遠住在一起。而我們要在香港換房子的話，至少要補個一千萬台幣，在我和弟弟看來是非常吃力的。更不用說我還沒有跟家裡出櫃，說想要跟女朋友生活在一起。所以，跟女朋友一起來台灣唸書，大概是實現這種共同生活的最佳辦法了。

這樣說起來，我算是帶了一種「破釜沉舟」的決心，來到了台灣升學。

### (二)

一月底，我跟很多境外生一樣回家過年了。當時聽說武漢開始爆發疫情，沒想到我回香港以後，疫情正式爆發了，一時幾乎到了人人都在搶口罩的地步。那時候看到新聞說很多工人花很長時間排隊買口罩，有些工人同一個口罩戴了又洗，洗了又戴，因為沒有口罩就不能上班，沒有收入，心裡特別難過。香港政府就像它往常那樣，沒有什麼作為，所以香港社會有一種很強烈的不安感和憤怒感。

到了二月初，我認識的香港同學都改了機票回台灣，我原先的機票是2月11日，我的朋友們就特別緊張，怕我不能入境。最後我提早在7日晚上回到台灣。從那一天開始，港澳學生仍可返台，但需要隔離十四天。到了10日，港澳學生也不能入境了。女友比我早幾天回台，只需要減少外出就行。不過在我隔離期間，她也一直在家陪我。隔離最後幾天，我自己是挺受不了的，完全失去了時間感，但檢疫還是順利完成了。而我的陸生朋友們，過年後就一個都見不到了。

在家隔離時，還是有點緊張的。我們住在新竹一個比較有年代感的社區裡，區裡很多老人彼此認識，我經常看見住在同一層的阿嬤跟她的朋友坐在樓下的7-11聊天。她們家知道我們是香港來的學生，對我們很友善。另一位鄰居阿嬤看上去就比較cool，不太理我們。有一次我們在電梯裡碰見她，她忍不住問：「你們看上去好像一對哦！」當時出於求生本能吧，我就笑著指向女友說：「對呀，她頭髮剪比較短，看上去比較像男生啦。」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在否認，但從此之後，她見到我們就會主動打招呼了XD。不過在社區裡，我還是不太敢出櫃的，不敢牽女友的手，怕被警衛或鄰居看到。二月隔離時，我們也特別乖，擔心社區裡面會傳出奇怪的消息。不想成為所謂的「防疫漏洞」，更不想因為我們亂走，讓「香港學生」甚至「境外生」再度被貼上標籤，出現像「港生趴趴走，傳染全台灣」之類的新聞標題。你知道，媒體有時候就是這樣運作的。

香港人在台灣唸書，從樣子來看跟其他人沒有什麼差別。但「我是外國人、我是外在者」的身分自覺，就像是螢火蟲尾巴上的小燈泡一樣，有時候突然會亮起來。我有一位香港的朋友在台南租房子，突如其來就被房東趕走，原因只是她「就是不想租給外國人」。我也會看到學校發來的郵件，說現在有哪些工讀機會或獎學金，最後列明：「陸生除外」。雖然這次疫情我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但我一直覺得，無論我們來自哪裡，是學生還是工人，在面對公權力或天災人禍時，我們都是很脆弱的，脆弱不分出身、國籍。既然如此，不如我們就來承認脆弱，互相擁抱彼此吧。有了更多「脆弱與共」的小夥伴，心靈上我們或者可以強大起來，然後在行動上也可以繼續努力看看吧！這也是我希望支持境外生運動的原因。

## 康偉の場合

### (一)

我是康偉，目前我在馬來西亞一個公民團體工作，活躍在馬來西亞的社運圈子中。我是馬來西亞華語中學的學生，2011年參加了BERSIH（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的集會，被驅離了，遭遇了警察暴力。去台灣唸書時，我也想要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之後遇到了高教工會、世新大學的夥伴，組成「世新勞權小組」。當時比較關心世新大學的校內議題，還有台灣本土的議題，譬如反對漲學費。

後來我慢慢覺得境外生也遇到一些問題，比較深的感受是關於健保的。境外生來台首六個月沒有辦法納入全民健保。問題是我在九月開學，新年又要回家過年，所以我的納保被延期了。到了冬天，我在台灣就很不適應，馬來西亞長年是夏天，所以我生病了一整個月。雖然有商業保險，但看病需要先墊付，而我的生活費只是僅僅夠用。加上當時境外生是不能打工的，我沒有額外收入。這讓我深刻感受到，全民健保很重要，沒有它我生病也沒有辦法涵蓋。然後我發現陸生也沒有健保，而且是永遠都無法被納入。

2014年我就和一些陸生有接觸，2016年馬來西亞的社會運動告一段落，我才覺得可以好好做其他事情。我希望從自身出發，做邊緣的、少人做的議題，所以想到了境外生。首先是搞了讀書會。一開始我比較多在談馬來西亞的議題。為什麼呢？第一，我是馬來西亞人，容易接觸到馬來西亞圈子，可以把馬來西亞學生的資訊告訴台灣人。馬來西亞學生有分僑生和外籍生，兩者需要的學費、社會福利、法條和保障都不一樣。譬如僑生和港澳生看齊，外籍生和陸生比較相似。只要是不同的身分別，同樣的國籍都有很多差異。

其實當時有一個很奇怪的斷裂感。我人不在馬來西亞，想做馬來西亞的事情，但又做不到。同樣地，當下發生的事情我並沒有管道解決。譬如同學遇到勞資糾紛，我們就要借助其他本地團體去諮詢相關法律。這樣一來，使我持續有一種不安感或撕裂感。我們好像一直都有藉口，到哪裡都可以跟自己說「抗爭是不重要的」。例如我們是馬來西亞華人，是二等公民；來到台灣後，我們又繼續是外國人或二等公民。無論如何，我組了「萊佛士讀書會」，打算先從做論述、寫聲明稿開始建立。

後來發現事情和想像中不同。讀書會沒有辦法做論述，也不能集結起不同群體的學生。於是在2016年9月，我就想到組織「境外生權益小組」。這個組織是很特別的，不同身分別的學生，一般都有自己身分別的組織，譬如陸生有陸聯會，喜歡待在自己的圈子。想要突破是很難的。這未必是語言問題，難的是如何超越不同的身分、國家和文化。這些差異會讓我們有衝突，對事情的判斷也不同，必須經過很多磨合才可能成功。後來當蔡英文拍板說，陸生將比照僑生與外籍學生納入健保，保費全額自付，大家才集合起來，開始一起寫聲明，搞行動。

### (二)

要發起不分國籍的社會運動，除了組織不易，無論境外生在台灣做什麼行動，都會引起很大的輿論反應和反彈。於是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遊說其他團體支持我們的訴求，在此我很感謝衛促會、南洋姊妹會、TIWA等團體的支持。再來，有一些集會與政治相關條例是專門針對境外人士的，我們開始害怕居留權會受到影響。那段時間的確有警察、教官來找我們，叫我們不要太衝動。但是有些台灣鄉民就會問我們：「為什麼你們在家鄉不抗議，跑來台灣抗議？」我們在家鄉也有過抗議經驗，所以才來到台灣繼續做下去。

對於境外生抗爭的反彈，某程度上反映了台灣人理解問題的一些慣性。他們首先會認為問題是外來者帶來的，排除外人就可以解決問題，而沒有看到社會安全網有其破洞，因此當突發狀況出現，社會就無法承載和面對。譬如不把境外生納入健保系統，當疫情發生時，就會造成很大傷害。台灣一直在用排除和撕裂的邏輯，想要犧牲一小群人去保護一大群人。我回國後發現，馬來西亞和台灣一樣，冷戰的結構繼續在延續、發酵著。台灣以前覺得我們馬來西亞是外人，可能是共匪，很危險；現在則把外人（例如移工）當病毒，很危險，邏輯都是一樣的。這是保守和反動的，不會讓我們的社會更加進步。

我也觀察到馬來西亞是如何接收台灣資訊，以及如何看待兩岸三地的問題。馬來西亞華人一直在討論香港、台灣、中國的問題，覺得自己要選邊站。比較難過的是，我有一些朋友知道我是社運圈的，當他們聽到我搞境外生的議題，搞健保，他們就會說：「陸生不應該被納保，原因是中國沒有民主。」我覺得這是兩件事情——在權利原則的基礎上，我不認為因為他們生在所謂極權國家，他們就應該享有更少權益。在選邊站之前，我不認為大家都已經掌握足夠的資訊。一般去過台灣讀書的馬來西亞學生，比較傾向全盤接受台灣政府的說法，譬如自己的防疫政策是沒有問題的。我無法否認台灣比起我們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真的做得很好。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台灣無論是行政效率或是防疫結果，其前提是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讓他們去承擔後果，這是不合理的。

在我剛回馬來西亞時，一下飛機就看到一堆五星紅旗，可能是中國旅客太多的關係。在日常生活裡面，我也會看到很多受到中國大陸影響的資訊。去過台灣讀書的馬來西亞學生，看到這些資訊就會很憤怒，覺得是中國在統戰、侵略馬來西亞。但我覺得刊登廣告的人都是有錢人，媒體是被資本所操控的，所以這些時候我都不想選邊站。除了中港、中馬等關係之外，其實很多問題背後都有資本的原因，不能只是用國族框架去理解，要不然就會卡在冷戰意識形態。我不覺得中國很好或很醜陋，只是那種攻擊陸生、大陸人的方式，不會帶來好的結果，畢竟歧視、邊緣化少數者本身就不是促進民主化的做法。

## 隆秀の場合

### (一)

在台灣，統獨問題的反應是很扭曲的，在北京的台灣學生群體也有同樣狀況，面對統獨的扭曲現況，我在台灣就覺得很沉重，去北京之後才發現還是得面對這件事情。怎麼認識、怎麼尋找認同，成為了我的問題。

當代台灣對中國的想像源於冷戰之後的斷裂，1949年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戰敗撤退來台，宣傳者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回號。至1988年冷戰結束後開放台灣外省人回台探親政策，兩岸的敵對狀況才開始獲得緩解。在此期間，台灣對中國大陸有兩種印象，一種是台灣本省人對中國人／中國國民黨軍隊政府來台的印象，另一種是民間來台外省人對中國大陸的鄉愁情懷。後者的本來屬於左翼的家國鄉愁，被1988年解嚴、轉型後的國民黨政府當成回號，宣傳「兩岸一家親」，而1992年的辜汪會談卻以商業經貿合作（而非政治化）作為主要政策。在民間，對中國原鄉的鄉愁，在兩三代外省人身上延續著。

我生於九〇年代，在1997年香港回歸那年，我和我的爺爺奶奶一起回到爺爺的家鄉江西玉山探親，那是江西省的東部，接壤浙江省，一個小時的火車車程就會到浙江金華。當時我對江西的印象就是農村，還有城鎮的熱鬧。而我們在廣州轉機時，廣州給我的印象則是有熱鬧的酒樓。在兒童的眼中，兩岸是沒有很大分野的。儘管如此，在解嚴後的台灣，小學老師還是會強調：「要努力學習，不然長大後會被對岸的大陸學生比下去。」而在北京，這些說法也流傳在台灣學生圈子裡。無形中，它形成了我的壓力與競爭意識。

除了上一代人的鄉愁情懷外，台灣在媒體宣傳上，一直把中國大陸描述為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大躍進、文革後貧窮的農村形象。台灣對中國農村貧窮的想像與認知，和中國大陸的城市知識分子不謀而合。他們掌握了對農村支配的話語，認為「農村人」就是「髒亂差、沒素質、沒文化」。而在台灣，「農村人」則被取代為「中國人」。中國內部農村／城市的對立結構被冷戰話語所偷換挪用，兩岸間的對抗意識仍在持續。另一種台灣對大陸的想像，則是2008年後主辦奧運、城市先進發展的現代化形象。在科技、經貿發展迅速的中國面前，新自由主義底下的台灣則面對著經濟衰落。台灣平民會用某種「阿Q心態」來嘲諷中國，將中國人描述為「強國人」，又或者將北京描述為「帝都」。

在北京的台灣學生也混雜了以上情緒與想像，而學生內部的組織狀況也延續著島內對藍綠二元政治的認知，形成兩種不同的台灣學生會組織。雖然兩者都強調要維護台灣學生權益和福利，卻有著強調經貿發展，與強調台灣學生認同的分野。相同的是，兩者都抱持著加強兩岸交流的主張，卻不會積極介入當前的政治狀況。對於異議聲音，兩邊也多以打壓態度處理。我剛入學時就有台灣學生會組織來約談新生，叫新生遠離參與太陽花學運的學生。此外也有台灣學生因為支持太陽花運動而被學校約談、遭到處分。在某種程度上，我跟兩邊都保持著距離，既沒有直接的衝突，也沒有親密的團結意識。和大多數台灣學生一樣，我渴望在現實的中國社會中找到適當位置，但我們是從特殊管道來到大陸唸書的，處於優勢的學習位置，和本地學生有著幾近相同的獎學金福利條件。而我們要進入社會工作仍有一定困難，學校也盡力在為台灣學生拓展就職管道。

### (二)

台灣學生對中國大陸的認識，常常有著謠傳或以訛傳訛，好比大陸學生都想出去，不想再回中國，像這些說法幾乎都沒有依據。在台灣受教育的時期，我們並未完整地認識中國大陸當代社會發展狀況。進入九〇年代，在台灣本土化和教育改革的趨勢底下，我們沒有父母輩的中國認同，或者說這種冷戰式的中國認同，已經轉化為後冷戰式的本土認同，所以我們的「中國認同」變得很模糊。一方面是不了解，一方面是教育環境多以考試就學為指標，我們是以背發展口號為方式去認識中國，大部分人缺乏對中國大陸的接觸經驗。直到2011年開放陸客自由行、陸生赴台就學，以及傾向兩岸交流的政策出合後，才出現了更多希望認識中國的聲音，而有關赴陸留學或就業的實用資訊仍然少之又少。統獨議題最容易在選舉時被拿出來炒作，而對於中國在實際層面的認知仍然是缺乏的。

直到赴陸唸書以前，我並沒有太明確地感受到「國家認同」這個部分的差異。當我和大陸學生和老師相處時，我才發現關於「中國」國家認同的部分，在我身上是缺乏的，在我的老師或同學言談間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或自我批評，也是我後天從知識上學習的。在校園中對於體制的批評、或對於校園制度改革的不滿都是有的，好比北京大學青年報和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對於校園工人的態度的爭論。但在北京的我所感受到的，是每天都正在經歷時空巨變的社會狀況，對於上述聲音和態度，到底是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去說話，我也是通過後天學習才慢慢掌握能力去判斷。北京每天都在與時俱進，而位於五道口的北大和清華學區周邊被稱作「宇宙中心」，去政治化的經濟發展是比較明顯的。

在蔡英文當選後的冬天，有一次代課老師在五百人的電影分析課堂結尾大罵蔡英文「親美叛國」，讓我感到很震驚。這種對台灣政治的批評態度在大陸是很常見的，但是在台灣的大學課堂，一定不會用這種方式批評執政黨。而台灣的大學課堂仍延續著「大陸學生會把台灣學生比下去」、「大陸人都蹲茅坑」一類的意識形態。這兩者之於我形成了一種撕裂——作為一個台灣學生，我無法將這兩者做出有效關聯，因為它們是衝突的。這使我在台灣學生，或者和我相遇的大陸學生面前，或多或少都會避免討論政治或認同。一來我不想引起

衝突，三來身分認同雖然重要，但於我而言那還未經歷充分討論，仍是模糊和缺乏的，這成為我在北京尋找認同的焦慮與壓力。

有好幾次我都感到非常沮喪，跟導師談到這樣的話題時，其鼓勵和答案是「so what！我就是我，我只做自己」。雖然這是一種很個人式的認同，但這也是我在面對敵意或不了解的眼光時，可以做出反應的方式。好比我被大陸同學要求唱中華民國國歌的時候會讓我覺得很敏感、很不舒服，但我其實可以反應說：我不認同你的要求。導師也提到過有關身分認同的自信問題。我們原本相信的東西，說不定也會有改變的一天，有一天我們可能會什麼都不相信。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內部的「中國認同」本來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充滿歧異性和多元性的，也充滿著不同政治立場與色彩。可是，不論是台灣的公開平台或媒體路徑，去認識這樣多元的中國的能力仍然尚待改善。在台灣形塑自我認同的過程中，如何可以轉化成一種更為包容以及不敵對的態度，是我所渴望看到的未來改變與可能性。

### (三)

另一方面，大陸學生對台灣學生的想像，以八〇年代以後港台流行文化為主。我們是經歷過千禧年的一代，而2000年前後正正是台灣作為華語流行文化，發展最為蓬勃的時期，直到2011年後台灣文化人赴陸發展，才逐漸改變了華語流行文化的發展趨勢。

我剛到北京大學唸書的時候，可以在學校校園的廣播裡聽到許多九〇年代至千禧年間的流行音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剛進入北大分配的宿舍時，我的室友一直在播周杰倫的音樂。我當時還不知道周杰倫在北京的影響力那麼大，只是因為自己沒怎麼在聽周杰倫，而覺得很厭煩。後來我才理解，那可能是室友對台灣流行文化的一種認同，以及對我表達友善、想要與我找到連結的方式，很可惜在我對大陸的「台灣印象」仍不清楚之下，被我錯位理解了。但在往後的人生中，當我遇到喜歡周杰倫的大陸人，讓我都會感到有一種同世代人的親切感，這裡經歷了一個從不理解到理解的重要過程。

我在北京經歷過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則是班級聚會。當中有曾經赴台的陸生向我講述他們在台灣受到的歧視待遇。有一位從人民大學申請到逢甲大學交換的同學，當時和其他本地台灣學生一起同住宿舍。但有一次台灣學生的東西被偷了，結果宿管人員馬上就懷疑是陸生偷的，要求搜該陸生同學的行李。對我的同學而言，這是非常羞辱的事情。然而，當時的我在北京也遇到了類似被排斥和沒有朋友的孤單狀況，當我聽到他們講述這樣子的負面經驗，我都感到很困惑、很難受——即使是正面經驗也一樣，這是因為我正在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我個人的狀況是非常混亂的。儘管我在北京沒有遇到歧視性的待遇，但當我聽到大陸同學這麼說時，我雖然比較同情和理解他們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卻沒有辦法提出一個更好的處理方式或是建議，使我感到手足無措。與此同時，我也沒有辦法很好地、很完整地向他們講述我所遇到的困難與難題，尤其是在我面對台灣和大陸經驗之間的差異時。每當我和大陸人溝通出現摩擦或困難，對我來說都是比較挫折的部分，也造成了我在北京的壓抑。

除了校園中的遭遇，我在北京比較正面的經驗，則延續著我在台灣參與工人NGO的運動經驗。原本我在台灣參加工人遊行或是在街頭衝撞的經驗，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裡遭遇到很大的挫折，讓我對運動被選舉政治吸納的狀況感到很憤怒。來到北京，我也感受到北京作為首都的政治中心有著怎樣的壓力環境。從參與學校社團、到參加兩岸工人戲劇工作坊的演出，一直轉變著我從台灣帶來的抗爭經驗。在我服務北京的工人時，我除了認識到當代中國工人經驗中的變化與斷裂之外，也看到很多可以積極實踐的空間，包括如何以藝術創作的形式為工人議題發聲，這和我的台灣經驗很不一樣。在整個過程中，我的「台灣身分」不再是那麼的重要。關注工人議題讓我更容易融入到人群之中去，也使我更有參與感。與此同時，我卻也發現我對於工人歷史，了解十分薄弱，使我更渴望去了解其就職條件與狀況。然而在學院的人與社會是有所分隔的，我們很難接觸到全面的工人，或者說所知有限。大部分學生關心的是自己的就業未來，但卻不熱衷於社會議題或運動。除了維權的參與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這是我想要追問下去的。



批又叉實業坊 > 看板 境外生

作者 tism

看板 international-students

標題 [心情] 很久不見，最近大家都好嗎？

時間 Fri August 14 14:28:03 2020

這半年來一直待在台灣，但很久都沒有見到大家了，疫情之下，不知道最近大家是否安好？生活總有酸甜苦辣，在境外讀書或工作，更是如此。大家有沒有什麼心事或感受想要分享一下？不妨都在這裡說說看，讓我們來圍爐取暖一下，彼此扶持著繼續走下去……><

※ 發信站: 批又叉實業坊(pxx.cc), 來自: 59.115.157.66

※ 文章網址: <https://www.pxx.cc/bbs/InternationalStudents/M.0000000000XX.068.html>

- 推 jinjin: 我來台之前，就已經做好陸生是兩岸「棄子」的心理準備，結果沒想到竟然被排擠到 08/14 23:23
- jinjin: 如此。懷著憧憬來台感受不一樣的生活，現在卻讓我感受到了CCP對待我的心情。原 08/14 23:23
- jinjin: 生國籍是中國難道就是一種錯誤嗎？環境的不同會影響很多人的。新移民在香港被排 08/14 23:23
- jinjin: 擠兩面不是人，陸生陸配小明在台灣被排擠兩面不是人。我們是不是無路可逃了？ 08/14 23:23
- 推 yuyu008: 時代的每一粒微塵落在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我這次是深深感受到了。 08/14 23:23
- 推 tinggg: 在台灣度過的一個學期，真的已經深深依戀這個地方，喜歡這裡獨有的溫情與包容， 08/14 23:24
- tinggg: 喜歡那些充滿善意的老師與同學。這個地方帶給我極大的歸屬感，似乎沒有人過多地 08/14 23:24
- tinggg: 強調我的「外人」身分。直到這次疫情，才意識到台灣社會對境外生群體存在那麼多 08/14 23:24
- tinggg: 片面甚至錯誤的想像。疫情完全切割了我對台灣社會的印象，一半是充滿人情味的美 08/14 23:24
- tinggg: 好島嶼，一半是網路上無窮無盡的戾氣與謾罵。我一度覺得非常非常失望，但是每次 08/14 23:24
- tinggg: 在IG或Line和台灣的同學聊天，他們都給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勵，又讓我急切地盼望盡 08/14 23:24
- tinggg: 快回去見到他們，重新回到原來的生活軌道上。 08/14 23:24
- 推 tylsweet: 離鄉求學、住校，一開始有嚴重的適應困難，覺得和周遭格格不入，很渴望逃回熟 08/14 23:28
- tylsweet: 悉的地方，但令我自己也驚訝的是，開始和當地的人事物建立較深刻情感連結之後， 08/14 23:28
- tylsweet: 原來陌生的城市也開始有了家的感覺。 08/14 23:28
- 推 christt04: 「境外生」和「台灣人」之間的關係本來有那麼多種可能，我們可以是台灣人的同 08/14 23:34
- christt04: 學，好友，伴侶，但是當疫情劃清我們之間的界限，我們卻被迫變成病毒帶原者、 08/14 23:34
- christt04: 國安問題、生化武器，真的感到很迷惘，很希望這種局面早日結束。 08/14 23:34
- 推 dedede429: 我家鄉城市的疫情並不算嚴重，所以這段時間我沒有過多的恐慌情緒。偶爾會有 08/15 00:13
- dedede429: 些無聊，但還好，透過讀書、觀影、寫寫畫畫之類的都可以消遣（or「充實自身」 08/15 00:13
- dedede429: :D）。至於遲遲無法入台的問題，說一點沒有失望是不可能的。恕我無法理解， 08/15 00:13
- dedede429: 保障受教權與何種「政治考量」有所衝突。我們所求的，只是基本的、普世的、 08/15 00:13
- dedede429: 人權所包含的受教育權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 08/15 00:13
- 推 mkta620: 作為被疫情阻擋，現在仍無法返台的學生，心裡感覺是苦澀的。長期無法見面使得 08/15 00:48
- mkta620: 跟同學關係疏離，難得還有好友幫忙收拾宿舍東西、通話聊天；網路滿足不了修課， 08/15 00:48
- mkta620: 實驗室進程只能在線上跟老師報備，實驗停擺的日子，只能努力準備未來的出路。 08/15 00:48
- 推 yy31456: 修課已經完成，108-2沒有修課壓力，但是錯過了太多覺得很好本想選的課程。時常 08/15 01:04
- yy31456: 透過網路關注事情進展，看到惡語相加的評論，時常感覺氛圍不對，越來越奇怪了。 08/15 01:04
- yy31456: 感謝很多人站出來說話。希望有更多人參與撕開歧視政策與論述的偽善面孔。 08/15 01:04
- 推 Oralen76: 工作難找，又無法回到台灣深造（好啦其實是我窮）。雖然家人能夠理解，但還是 08/15 01:36
- Oralen76: 要處理一些學校的事務感到壓力。希望能彼此交流，交換意見。也許在未來能夠互 08/15 01:36
- Oralen76: 相幫助呢。 08/15 01:36
- 推 wawawhay: 沒想到繼續就學會是這麼難的一件事。 08/15 03:50
- 推 coconut888: 我是境外新生，曾遇到過沒有事先通知，從而導致機票被取消，計畫被打亂和經 08/15 07:01
- coconut888: 濟損失相關的情況，不過因為疫情太過特殊，所以也可以部分理解消息的不及時， 08/15 07:01
- coconut888: 在這些事中，我也學到要更冷靜和理性地看到問題，接納現狀，並且嘗試去解決它。 08/15 07:01

推 danielm712: 我是今年第一年的香港新生，前幾日剛入境，正進行14日隔離。抵台的事宜由於 08/15 09:43  
→ danielm712: 學校的悉心的安排和協助，並無大問題（不是客氣話，因為規定入境日期的航班， 08/15 09:43  
→ danielm712: 只有晚上，學校的職工在機場和防疫旅館留守到凌晨兩點，等待我們抵達）。是 08/15 09:43  
→ danielm712: 次入境的申請繁瑣，本身預定的入台日期一再拖延，倒是讓人心中頗為不安，甚 08/15 09:43  
→ danielm712: 至做好準備要下學期才能入學。說實話，能夠成功入境對我而言，已是好事，相 08/15 09:43  
→ danielm712: 信對不少香港學生來說，也是如此。 08/15 09:43  
推 eerwa6451: 目前正在台灣跨地求學，確實在政策制度上有體會到自己處於一種被區隔的社會 08/15 11:27  
→ eerwa6451: 地位，但無力改變；在日常生活中則時常體會到跨地帶來的個人自由與來自環境、 08/15 11:27  
→ eerwa6451: 他人帶來的溫暖與觸動。 08/15 11:27  
推 bsecxz: 來自不同地方的境外人士會對台灣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因為台灣人對他們的態度是不 08/15 18:36  
→ bsecxz: 同的。 08/15 18:36  
推 p08wl: 作為跨境學生，身分認同不斷搖擺，有點像坐海盜船吧，兩岸夾心餅沒有一個中間 08/15 21:18  
→ p08wl: 值，總是驚心刺激地隨著船體在兩邊擺動，開始很身軟但久了以後好像還蠻習慣甚至 08/15 21:18  
→ p08wl: 覺得好刺激XD（可能猛一點還可以360°懸空aka無明確身分認同XDDD） 08/15 21:18  
推 xx145hi5: 我是陸生，浪子不泊岸。 08/16 00:56  
推 221jenlim: 是異鄉客，也是局中人；不要再幻想能置身事外，我們早已被裹挾其中。 08/16 02:31  
推 nealwht: 覺得自己是這個年代的「亞細亞的孤兒」。 08/16 02:44  
推 wwwww331: 長年在英國修學，不能完全投入當地的文化。卻又同時不希望只局限在自己的 08/16 06:56  
→ wwwww331: comfort zone。現在居住台灣，感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文化（和人相處的距離和 08/16 06:56  
→ wwwww331: 表達）。但是卻有種回不去香港的感覺。不知道卡在中間，又要去哪裡。 08/16 06:56  
推 qwqqqq: 很感動，這次返台真的是最需要努力的一場戰。學到了很多人的經驗，感謝每個人 08/16 09:39  
→ qwqqqq: 的付出。 08/16 09:39  
推 lilyyi203: 我一向對「邊緣」與「中心」的關係很有興趣，也曾希望以身作橋，連結不同的群 08/16 12:47  
→ lilyyi203: 體。現在看來，幾乎所有的橋樑都有倒塌的危險。如何在這個時代繼續和不同的人 08/16 12:47  
→ lilyyi203: 連結，「愛鄰人」，仍是我很關心的課題。 08/16 12:47

**(三)**

專輯策畫 吃著鐳射變異鴨肉羹的阿草

**同樣是學生，  
待遇大不同：  
境外生制度  
差異回顧**

冷戰時期，台灣進行嚴厲的國境管制。除了台灣人不能隨意離境，就連透過僑教政策「歸國」求學的留學生也被當成「潛在的匪諜」。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只要稍有不慎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冤枉的陳欽生、「匪諜嫌疑」遭人告密而解散的神州詩社，都是留學生受到白色恐怖迫害的例子。

時過境遷，台灣在經歷了首次政黨輪替後，也逐步邁向了民主化進程。前總統陳水扁主導的「讓世界看見台灣」，推動了高教國際化，從世界各地吸引說著不同語言的留學生群體到台灣一同學習、成長、生活。但是，在制度方面卻給予不同群體的留學生差別待遇，同時也與本地學生進行區隔。

項目	港澳生	僑生	外籍生	陸生
求學	大學法			
	香港澳門居民來台就學辦法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
學費	與台灣籍學生掛鉤		國立大學收費不得低於同級私立學校收費基準	
遷移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居留)	入出國及移民法(居留)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停留)
打工	可打工，每週二十小時工作上限(就業服務法第50條)			不得打工
健保	可納保，依全民健保法(第9條)			無法參加健保
師生比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大專院校境外生超過學生數10%才列入計算； 109學年8月1日開始，改為大專院校境外生超過學生數3%則列入計算)			

境外學生相關法規與規定(更新至2020年)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見，不僅境外生與本地學生的制度不同、待遇有別，同樣是境外生，不同群體如港澳生、僑生、外籍生、陸生也有著制度差異。例如，陸生和外籍生的大學學費經常高於港澳生、僑生。又例如，直到2020年8月，大部分學校的境外生人數才被列入生師比計算，以避免學校廣招境外生卻不增聘師資。此外，境外生權益小組也協助在台灣受到勞動壓榨的境外生個案。他們有的是因為境外生身分而被辭退，卻沒有獲得資遣費賠償。有的則是沒有獲得基本薪資的保障。過去兩年，政府大力推廣「新南向專班」，更是帶頭違法。專班的印尼學生懷著半工半讀的期盼來台灣唸書，卻被學校送去黑工廠變成血汗勞工。

在本輯內，我們將從馬來西亞僑生被資遣的故事、陸生在兩岸間的尷尬處境、境外生與本地學生的學費脫鉤政策、疫情下的流離失所以及健保納保本外平權運動的經驗來說明境外生在制度差異下的具體處境。我們想說的是，境外生面對的問題不是歧視問題，而是身兼跨境移動者、台灣社會的生活者，同時又是高等教育的參與者這些重疊身分之下的多重擠壓結果。差別背後的脈絡和政治經濟值得本外學生共同思考。

# 打工，時數限制的境外生 與被資遣的境外生

在境外生中，陸生被嚴格限制不得打工（有一段時間甚至連無償實習都受限制），其他境外生都可以在台工作，但每週有二十小時的工作時間限制。這一政策的制定可能是為了避免有人借學生簽證來台工作，可能是為了避免境外生打工影響本地人工作機會，有可能是因為政府覺得二十小時的打工時間已經足夠境外生生活。無論何種理由，在馬來西亞僑生J君的遭遇中，資方正是以二十小時的工作時間限制為理由解僱了他。我們不知道這是藉口還是公司主管真的介意這項工時限制，但毫無疑問的是，本外學生在資方面前都是弱勢，維護勞動權益的道路仍然困難。

## 作者：馬來西亞籍僑生J君

106年1月11日2:25pm, 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 我就被公司主管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要求離職及踢出群組, 給出的理由是經過公司開會討論, 境外生所被限制工作時數, 每週只能工作二十小時不予超時, 以此為依據就毫無理由地終止勞工契約關係(解僱), 迫我離職。隔天我馬上到公司, 應要求寫了離職單, 而辦公室同事也一如往常地冷言冷語, 「你來填離職單囉」。

這點讓人覺得非常不受到尊重, 本人利用網路上的資源查詢《勞基法》, 並且搜尋到一個境外生權益小組, 就立即私訊他們尋求幫忙。並且, 我據理力爭應有的權益, 向公司追討遣散費, 沒想到這又是一個荊棘滿鋪的路, 各種陷害毫無間斷。原本認為關係都還不錯的主管們, 各種嘴臉, 原來全部都原形畢露。最後公司財政經理又是各種刁難, 要不是境外生權益小組幫忙與不斷update, 我很有可能就這樣中途放棄。

106年1月16日中午, 在離台以前, 我主動前往公司與主管對峙, 希望得到正面的回應, 並且根據《勞基法》追討資遣費, 沒想到一切都是我太單純, 加上時間有點趕, 晚上就要到桃園機場了, 壓力下迷迷糊糊就被騙了寫下一張停薪留職單! 而且日期是公司填上去的1月9日。我心裡是非常不能接受, 明明就是在1月16號寫的, 日期卻被填上1月9日, 過後公司財政經理以這個為理由, 不斷一直一直一直強調公司沒有要開除你, 說什麼公司讓你停薪留職。但證據就擺在眼前, 明明要迫離職是先於停薪留職, 公司自行篡改日期, 你還一直狡辯睜眼說瞎話, 也非常讓人費解。套用一句網路用語「你敢相信!」

3月返台以後, 我當然就到公司繼續追討, 順便找之前同事聊天。沒有想到當時主管卻告訴我朋友不要跟我太近, 說我企圖顛覆公司。「顛覆」這樣的措辭遣字也未免太嚴重了一點吧。兩個禮拜中我跟高教工會的同仁, 就打電話詢問, 繼續追討資遣費。而公司那邊不斷在打太極推來推去, 完全沒有想要對這件事負責的意思, 完全就是不想理會的態度, 最後在我們不斷追問下, 公司就說會把事情轉交給

總公司人資部, 留下電話又等了一禮拜, 完全沒有回應。還是自己向公司詢問到總公司會計的電話, 也是打了好幾次才順利接上。結果還是要等總公司了解這事件後, 才給予回應, 過後也是打了好幾通才等待回應, 這其中浪費了我超多電話錢。

終於, 總公司會計要賠償我資遣費, 並在發薪日當天一併進我戶口, 但是, 我卻收到公司用Line通知說:「你可以回來上班! 公司並沒有要開除你呀!」什麼跟什麼? 他們真的把我當笨蛋傻子, 又要挖洞給我跳。因為若我回到公司, 公司也會給各種理由刁難我, 讓我什麼都得不到。我又再次跟他們解釋人資部那邊的回應, 又再打電話跟人資部確認。結果他們弄出新制資遣費來糊弄我, 經過溝通後, 我跟他說明境外生不在新制的範圍內, 他們才又重新計算資遣費應該給多少。各種搪塞的藉口, 搞得我超級累。

終於在5月8日, 總公司人資部那邊通知我, 可以去領資遣費了。本應由公司通知我去領, 然而最後卻是我自己打電話去總公司後, 才知道這消息。狂! 當天傍晚到了公司, 當然也不會那麼順利, 公司於金額方面卻不斷壓縮, 並且一直冷嘲熱諷, 公司會計那種嘴臉, 說什麼公司已經給過你了, 你還想要要求更多。還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公司需要計算。由於事情已經拖了太久, 已經心力交瘁, 不想再耗下去, 雖然成功要到資遣費, 但是距離目標金額還差三千到四千塊左右, 算了! 這就當作買時間吧, 再這樣耗下去, 真的很累。

最後, 我想對所有在台灣工作的人士, 不管是境外生還是本地生說: 在打工時候, 遭遇不公平的對待, 真的不要害怕, 應該更加積極據理力爭。自己的權益自己爭取, 不要當白白的犧牲品。在現在這時代, 表面上的歧視越來越少了, 但是內在歧視卻難以消磨, 外籍勞工受到歧視, 更是沒有間斷過, 中華民國應該是一個民主法制社會, 遇上任何不公對待, 我們都應該爭取。

# 陸生作為不合時宜的景觀： 從「三限六不」說起

陸生在境外生中是被額外特殊化的群體，不能加入健保，明明長期在台生活卻只有「停留」身分，最廣為人知的就是「三限六不」原則。許多人都批評這樣的政策是歧視，是差別待遇，是台灣反中仇恨的展現。但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陸生被如此「公開」地特殊化？陸生與其他境外生所處位置的差異究竟是什麼？

作者：境外生權益小組 阿草

「三限六不」原則說明

所謂「三限」是指：

- (1) 限校：限制高等學校的採認，僅認可學術聲望卓著、辦學品質績優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
- (2) 限量：限制來台陸生總量，由每年招生的大專生、研究生總額擬定百分比，初期會審慎辦理；願意招收大陸學生的學校，每科系招陸生名額也有上限。
- (3) 限域：限制醫事、國安及高科技等領域的學歷採認。

所謂「六不」是指：

- (1) 不加分優待：陸生來台就讀或考試均不給予加分優待。
- (2) 不影響台灣學生就學權益：陸生來台就讀的管道採外加名額。
- (3) 不編列獎助學金：政府不編列預算作為陸生獎助學金，但各大學或社會團體提供的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 (4) 不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陸生必須符合來台就學目的，不得於校外打工或兼職。
- (5) 不會有就業問題：陸生停止修業或畢業後不得續留台灣。
- (6) 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陸生若未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且無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依法無法報考我國「公務人員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考試」。若陸生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定居設籍且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則依相關法律規定准予報考，然縱然經考試及格，仍有任用上的限制。

(資料來源：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之前在廣州生活的時候，我曾遇到有環衛工人因為沒有穿反光背心而被扣分罰款。一方面驚訝於嚴格的規定，另一方面我也好奇，為何不直接將制服製作成鮮豔可反光的樣式。在大夏天費力穿兩套甚至三套衣服，對於戶外工作的人來說恐怕有點過分。

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心中萌生一個猜想：環衛工在身為打掃街道的工人之前，先是城市內的一道移動景觀。因為是景觀，自然要講究與周圍景物的搭配，講究景觀的行為舉止合宜。於是，工人們脫下鮮豔的紅橘色制服，改穿起了深藍偏綠與灌木叢相配的制服。從廣州街頭放眼望去，環衛工和類似暗色的垃圾桶就隨街巷而隱身了——美觀，文明。

最近，我逐漸感覺到陸生，也不過是這兩岸風貌裡的一道風景。不用說陸生能扮演什麼角色來影響兩岸政治，恐怕陸生連棋子都未必算得上。十年前的時候，這景觀映襯著兩岸資本流動的繁榮與政商往來的密切，所以越突出越醒目越來得合適，那是盛世之下的妝點。十年後，隨著恐慌與封鎖

成為兩岸的主調，陸生這道不合時宜的景觀也被不停地要求淡化、隱形，那是黑歷史、是遺緒。

同時，這是一類特殊的景觀，是人為製造的、矯揉的、有時效性的風景。百貨商場經常會在於聖誕或情人節或春節前的特定時間，擺放出大型裝飾物來吸引人潮。這種裝飾物的特徵是要華麗、要便宜、要吸引眼球卻不能「喧賓奪主」影響到店內商品的光芒。陸生也是類似的，2011年開放陸生來台，說是「開放」，但究竟是誰在開放？其實兩岸共同製作。

與其說透過陸生的處境可窺探兩岸動態，不如說兩岸的國家機器將陸生當作為展示其內外政策的舞台。舉早期最有名的「三限六不」政策來說，其中許多規定都是無意義的，純粹為了展現「台灣本地人優先」才刻意寫出來、展現政治誠意的假條文。例如其中的陸生「不得在台就業」的規定就無任何實意，因為台灣各項外籍人士聘僱辦法中本來就已經排除了中國大陸籍，不加之此限制陸生也無法在台工作。限制學生總量也是類似的多餘條款，教育部本來就對於大學招收本地生、僑生、外籍生制定了相應的名額控管，陸生並沒有例外，卻也不必額外強調這種非例外。

這種並不會有實際影響的條文可以被算作「宣示性條文」，還有一些則近似「掩耳盜鈴」。雖然有部分的實際影響，但宣示意味仍然大過本身的影響。例如「陸生不得領取政府獎學金或補助」（原本條文應該是政府不編列預算作為陸生獎助學金，不過後來擴大解釋為政府預算支持的獎學金或補助陸生皆不得申領），實質上造成了許多陸生無法領取科技部計畫經費，或者在一些獎助項目中被單獨排斥（連語言學習獎勵金都不得領），這引起許多困擾。但是這個條文卻並沒有阻絕政府公共教育開支惠及陸生。台灣大專院校不分公私立都領有大量政府補助，陸生在校園內使用這些補助經費所建設的校舍、軟硬體設備，被公共經費所聘請的老師授課。相較於這些公共的補助，獎學金只是九牛一毛。此政策對外宣示了「陸生不佔用台灣公共資源」，但實際上卻無法把陸生真正剝離開教育領域的公共資源。

結果，陸生來台了。台灣民眾也在陸生政策中獲取了安心感，這是一場「本地優先」的show。行政的魄力以這種最安全的方式獲得了展現，暗地裡還順道打擊了陸生所扮演的「假想敵」。對於民進黨來說，不用花大錢購買軍武，不用辦軍事演習就可以最廉價的方式耀武揚威。而對國民黨，陸生就如同今日的美豬，示好用的罷了。

當然，這舞台上台灣藍綠兩黨抬出了費盡心思的作品，北京政府也不遑多讓。陸生開放至今，有一個招生層面的嚴重限制是大陸教育部所加的，即報考省份限制，早期只有沿海六省戶籍的學生可以報考，到後來變成了八省（直轄市）。為什麼只限制部分省份學生可以報考？為什麼是這幾個省份？沒有人出來說明過。我想，這至少意味著北京政府也不希望在台唸書的大陸學生過多，只要維持在低度的樣板狀態即可。每年陸生放榜後，大陸的新聞大多是台灣院校沒招滿學生、陸生為何去台灣意願低落等等。與之相反，大陸

政府卻非常鼓勵台生至大陸唸書，每年大張旗鼓宣傳台灣學生的報考人數，台灣學生在大陸的故事。兩相結合，北京積極地透過兩岸學生的流動來建構中國大陸優於台灣的比較形象。

陸生入台過了幾年，兩岸資本流動依舊，但政治衝突開始浮現。此時，台灣視角下的大陸學生被披上了「狼性」外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下台灣焦慮的投射。輿論依照著對於中國崛起的恐懼畫出了中國學生刻苦認真、積極侵佔資源的形象。另一面，陸生在台限制政策遲遲沒有改善，中國大陸的輿論則藉用陸生被差別對待的經歷塑造「敵意的台灣迫害陸生」敘事。陸生既是積極的侵略者，同時又是軟弱的受害者。再沒有什麼其他角色可以如此矛盾、如此混亂了。但陸生可以，因為陸生不是角色，只是被打造的景觀，換一個面看就完全不同了。

再後來，陸生真正成為了彼此的「假想敵」。承繼受害者敘事，大陸官方媒體開始釋放台灣間諜誘騙陸生成為下線的新聞；發展「狼性」標籤，台灣社會逐漸將陸生=中國人=中國政府=政府間諜這套邏輯推演得越來越熟練。這時，陸生這道景觀已經不再有當初的神秘和未知，它被看透了，也被打造得更加赤裸、更加完全。展覽期限將至，光影黯淡，表面蒙灰，景觀的退場也早在意料之中。

我想說的是，「陸生來台」從未發生過。並沒有一個先存的、本質的作為學生的陸生來到了台灣。而是兩岸的國家、國族在十年間創造著名為「陸生」的虛像或者說景觀。它凸顯的是政策，顯示的是民心，卻不能擁有自己的聲音和位置。

我在敘述一齣陸生的悲劇嗎？可能是這樣。

但悲劇不只是陸生。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和學生，曾經與現在也時刻被作為景觀而製造。彼時是彰顯台灣作為次帝國的野心，如今則換上了幾分反共聯盟的多元主義色彩。你聽，新聞裡都這麼說：來自「新南向」國家的遊客和學生增加，取代了陸客和陸生。這樣的敘事不令人膽寒嗎？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人們不過是一種景觀的替代，是「景觀的景觀」。除了他們，還有更多的新住民、境外生、非典型的跨境者甚至長居海外的台灣人在這道「非我族類」的景觀之中，被打造得越來越精緻、豐富。景觀也是不穩定的，其中許多人在疫情之前還是可被容納的景觀，在疫情之中卻變成了待驅逐、拒絕的可怖景觀。哀，不必再重述了。

如何破除虛像或景觀，最徹底的方法應該是超克兩岸的分斷體制，是走向東亞和亞洲區域的民主化，是瓦解國族政治甚至資本主義。但這些說起來都像天方夜譚，又如何談去實現。堤壩已經建成，一時難以瓦解。我只希望在那些景觀背後活著的人們不要再隱忍下去了。景觀的虛假需要由真實生活著的人來揭露。作為不合時宜的景觀，每一次誇張的暴動，爭取本不存在的權利，發出不該具有的聲音，對於那堤壩而言都會是震撼。用合理的方式對待不合理的存在來彰顯其不合理，這也是一場戰鬥。



# 境外生學雜費脫鉤的困境 與抵抗之道

境外生並非孤立的群體，而是學生的一員，是台灣高等教育的一環。當整個高教都面臨商業化、私有化的危機時，境外生比本地學生更先遭遇學費調漲的問題。除了歧視或差別待遇之外，本篇文章希望帶你了解境外生的遭遇與資本運作之間的關聯，以及抗爭中本外學生團結的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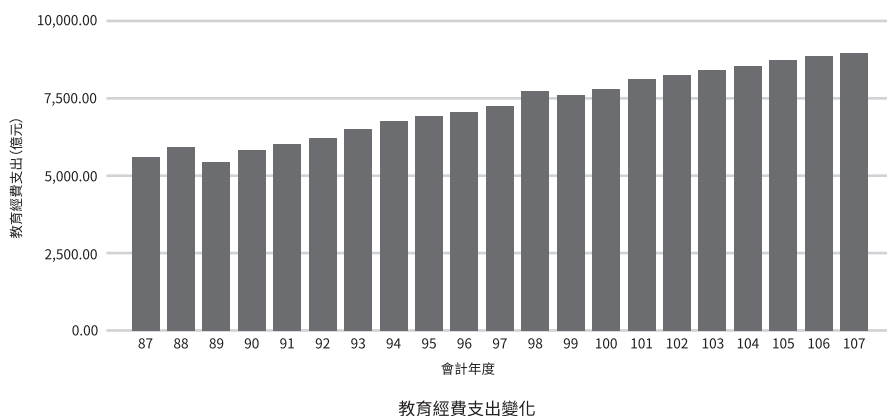
作者：反教育商品化聯盟成員 謝毅弘

近年來，政府一面削減高教常態型經費支出，一面立法引導大學向境外生收取高學費自籌財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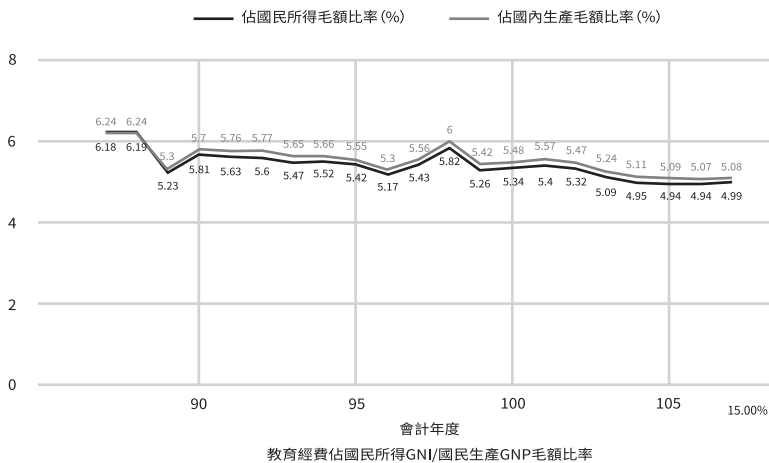
在正式學位生學雜費的收取上，依據《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規定，外國學生的學雜費收費基準不得低於同級私立學校，而陸生的學雜費收費基準則由就讀學校自行訂定。結果，就讀公立大學的外國學生、陸生必須負擔兩倍於本地生的學雜費，就讀私立大學的陸生學雜費則由學校自主規定。由於可以從外國學生、陸生身上得到更多收入，使得公、私立學校都無所不用其極地招收外國學生、陸生來台唸書。

我們要指出，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大學只能自籌財源的教育商品化現象之下。不分外國學生、陸生、僑生、港澳生、台灣學生，所面對的教育環境其實都是向下沉淪的，大家面對的都是同一個高生師比、教學品質低落、授課教授被當成廉價勞動力的高教環境。如果沒有看清政府帶頭將市場經濟邏輯向高教體系擴張而造成的壓迫，反而把矛頭指向是境外生／本地學生的差別，那麼就無法看清問題的真相，永遠無法解決台灣高教面臨的迫切問題。

## 一、大背景：教育經費緊縮，高教走向競爭型經費



從教育部統計處所公開的「重要教育統計資訊」中的「教育經費支出變化」和「教育經費佔國民所得GNI／國民生產GDP毛額比率」圖表可以看到，全台灣的中央／地方政府在加上私校所投入的教育經費，雖然名目上從1995年的4,496.9億元新台幣，成長到2018年的9,033.1億新台幣；然而實質上教育經費投入的成長是追不上物價成長與經濟成長，在這二十餘年間，教育經費佔國民所得毛額(GNI)比率從6.18%下降到4.99%，整整下降了1.19%。



- (一) 學雜費收入；
- (二) 推廣教育收入；
- (三) 產學合作收入；
- (四)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
-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 (六) 受贈收入；
-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
- (八) 其他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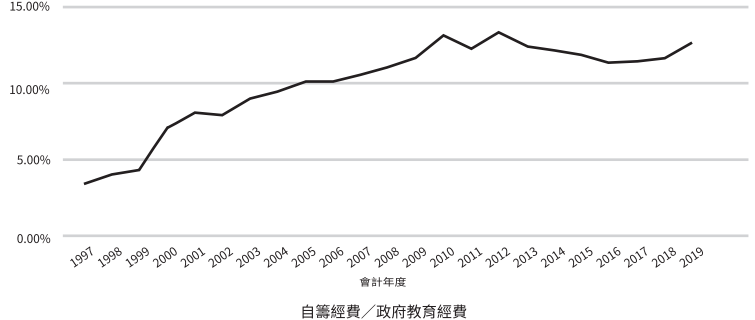
近年以來的大學競爭型經費政策，無疑是台灣高教在經費減少的困境下的沉重一擊。俗稱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大學獎勵計畫」以及「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在過去十年間已經花費了1,529億元。然而所帶來的成效，就連教育部自己在2016年提出的「高等教育競爭型經費延續計畫」中，也檢討競爭型經費造成預算集中在少數學校導致分配不均、使得大學重研究輕教學輔導等等，對學生不利的重大弊病。更可笑的是，教育部一直宣稱要讓「頂尖大學」提升「國際排名」而投入競爭型經費，但是從教育部的報告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台灣「頂尖大學」的國際排名不是倒退、就是沒有顯著的成長。

2018年開始的「高教深耕計畫」則延續著競爭型經費政策，問題甚至更為嚴重。根據2020年經費分配表，原本「頂尖大學計畫」中的超過十所頂尖大學削減為四所全球型學校(即俗稱的台清交成)，光是這四所學校就拿走七十一所一般大學高教深耕經費總額的49.2%。同時，技專院校雖然數量較一般大學更多，但高教深耕經費的分配上，技專院校總體只有一般大學經費的41.4%，更顯示出競爭型經費政策造成高教經費嚴重偏重在少數頂尖大學的研究項目上。

## 二、大學經費自籌下的境外生招生政策

1996年，為了因應民主轉型與教改運動，教育部公佈《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增設專科部實施辦法》，將大量專科體系學校改制為科技大學，使大學數量從1996年的38所大幅擴張到2011年的116所。然而這樣的大學擴張政策存在著嚴重的瑕疵，讓大量私立專科學校改制為大學的結果是——造成近七成的學生都只能就讀於收費較高的私校，卻只有三成的高教經費挹注在私校學生身上，造成多數大學生沉重的求學負擔。甚至，「這些升格的技術學院與大學便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斷其後籌設新的、優質公立大學的可能」。

除了私校所形成的龐大利益團體，帶動了高教的商品化現象之外。1996年，教育部開始在少數公立學校試辦「國立大學校務基金」。1999年，《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經總統公佈，至2001年起全國的國立大專院校全面實施校務基金新制。《國立大學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3條第1項第2款，明定校務基金有八大自籌性經費來源：



\*附註：自籌經費包括國立大專院校校務基金自籌、國立大學附設醫院作業基金自籌與教學及研究相關之支出、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統計(109年版)》「表A3-1 教育經費佔國民所得GNI/國內生產GDP毛額比率」。

自籌性經費收取與運用不受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由各校自訂相關規定辦理，僅受教育部監督。

自從1996年開放大學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以來，教育部統計處數據顯示，高中以上學校自籌經費便逐年攀升，從1997年度的135.55億元成長到2019年度的763.06億元，相當於每年政府教育經費的12.66%左右。顯示出教育經費中有越來越高的比例出自於自籌性經費，而且其中大多是高教體系的自籌經費(少部分為公立高中的校務基金)。

在公私立大專校院紛紛走向營利的資本邏輯的背景之下，大學學雜費成為了大學最主要的財源。1993年，大學學費調漲，公立學校漲幅16%，私立學校也高達8%-12.6%，到了2004年更有53所大學一起聯合調漲學雜費。然而大規模地調漲學雜費也引來學生反高學費、反教育商品化的抗爭，使得教育部在抗爭壓力下將本地大學生學雜費調漲程序增加「資訊公開」與「審議機制」，導致近年來調漲學雜費大學數量相較過去少。

然而，「政策制定，總是隱藏著階級屬性，在大學學費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所有的議程，都被設定在『如何向人民收取高額學費』……政府必須在人民群體中建構出不同的身分差異，激化群體內部的矛盾，製造出無數個偽議題，以達掩蓋階級矛盾的效果，其目的正是讓人民為各式各樣的假象所迷惑，醉醺醺地來思考學費問題」(董泓志，2013)。透過政策，分化出各種社會大眾覺得學雜費「漲了也沒差」的群體，作為學校在目前學雜費政策較為緊縮時可以調漲獲利的財源，而境外生正是身處於這一批被政策分化的群體之一。

2006年，教育部修正《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時，首次以「為免外國學生佔用我國內教育資源」為理由，將外國學生的學雜費收取與本地學生脫鉤；而《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在2011年訂定之初就規定了「由就讀學校依教學成本訂定，且不得低於本部每年公告之國內同級私立學校之學雜費收費基準」。這種本外學雜費收費不同的差異，以前是沒有的。但是在學校追求自籌性經費、政府不斷縮減教育預算等「資本因素」的驅使下，校園中的「他者」就會被開徵更高額的學費。

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反教盟)在2016年反漲學雜費時，發現淡江大學不止針對本國學生對教育部提出申請漲學費。更早在2015年漲學費申請被教育部駁回後，使用對外國學生大幅漲學雜費的方式來提升學校的獲利。淡江大學對於境外生、陸生的學雜費漲幅在20%以上，代表著境外生每學期必須繳比本國學生多一萬至一萬五新台幣的學雜費。就有淡江的陸生很憂心地向我們表示：「很擔心這次學校漲學費沒通過，又要拿陸生開刀。」

淡江的財務長在學雜費調漲說明會上更表示：「調漲境外生學雜費預計為學校增加1,400萬元收入。」展現了學校已經將外國學生視為向教育調漲學雜費之外的另一個重要財源。在比較台灣34所私立綜合大學、私立醫學大學的學雜費收取標準後，發現2016年對外國學生收取超額學雜費的學校除了淡江之外，還有東海、東吳、輔仁、世新、中原、逢甲、靜宜等七所私立大學。其中東海、東吳、輔仁、中原、逢甲、淡江都對外國學生收取超過國內生20%的學雜費，而世新則是5%，靜宜則是1.1~2.5%。

以上所論及的都還是正式學位的境外生學雜費收取辦法，而不具有正式學位資格的大陸短期研修生，依照陸委會主管的《大陸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學生來台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點》，不只招生人數不受限制，依法還可以收取1.5倍的學分費。104學年度在台灣一共11萬的非本國學生中，就有34,114名是大陸短期研修生，研修生的學雜費收入已成為大學的重要財源。雖然近幾年大陸研修生人數有大幅下降，但非學位境外生人數比例仍佔境外生總人數的一半以上，究其原因，是來自於華語文中心學生與外國短期研習生的人數增加。

### 三、不分本外，對抗高教商品化的沉淪

在這種高等教育成為一種商品，以政府的力量在向中國大陸、東南亞的境外生兜售的情況下，境外生學雜費收取不平等的情形，形同加劇了目前高教商品化的困境。境外生權益小組的黃康偉認為：「目前台灣政府積極發展『新南向』，但目的卻不是讓台灣和其他各國有更多交流的機會，而是開發更多的國際專班，向境外生收取高額的學費。況且，目前的外籍生和陸生在專上辦法第十六條的規定裡頭，還是必須比本地生付出近於多一倍的學費，這是把高教轉型市場化的機制，假借國際化套用上去，把一個個境外生當成搖錢樹。」

然而台灣的教育商品化、市場化問題，會受到影響的，自然不只是境外生而已。在前面所提及的台灣高教所遭遇的經費減少、競爭型經費主導發展方向、大學壓縮教學資源的情況之下。台灣的高教形同將要演變成向學生收取高學費、經營營利事業獲利的學店。不分境外生、台灣學生，所面對的教育環境其實都是向下沉淪的。

在「提升個人競爭力」的迷思之下，高等教育普遍被個人化看待。多數學生對於教育商品化、市場化的態度都是事不關己，更遑論對於境外生學雜費收取不平等的事情有所反應。「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學，越來越扮演兩種角色，一是勞動力訓練，二是替資本進行研發。」(徐文路, 2012)從台灣的就業環境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部分穩定的正職工作都將「大學學歷」作為最基本的條件。

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之下，大多數學生上大學的目的早就已經不是追求學術或者提升自我競爭力，而是為求在社會上取得一份足以溫飽的工作機會。英國教育社會學學者Phillip Brown就指出，受教育已經成為一項「防禦性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受教育不會增加薪資，但不受教育會減少薪資。

學生在大學中學會技能、獲得知識大多並不是屬於自己的，而是透過資方佔有了勞工的勞動成果並且賺取勞動剩餘價值的方式，最終是由公司、企業所實際擁有的。不可避免地，不論西方人文主義曾經對於大學「建立批判和反思的堡壘，促進社會良性發展和知識進步」有什麼理想性的想像，大學終究不會脫離「勞動力訓練」的範疇。

然而在公共資源投入越來越少，大學為了追求增加自籌性經費而選擇各種壓低成本、增加收入的行為時，學生所接受到的教學品質只會越來越低落。學生本在環境的壓力下繳交學費接受教育，期待能夠獲得足夠的知識與技能培訓，畢業後能夠獲得一份足以生存的工作。但是大學越來越不專注於教學工作上，只會讓大學生為受高等教育而投入的各種資源越來越「不值得」。「儘管『不划算』，大學卻變成『不能不念』」(林柏儀, 2012)，持續市場化、商品化的高等教育，對於學生而言就將更不會是一種人生的「投資」，而是一種剝削。

面對這樣的剝削，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大學只能自籌財源的教育商品化現象之下，不分本外學生，面對的都是同一個高生師比、教學品質低落、授課教師被當成廉價勞動力的高教環境。必須要看清市場經濟邏輯向高教體系擴張而造成的壓迫，在這個基礎上團結抵抗，才能真正解決本外學雜費收取不平等的問題。

#### 參考書目

- 董泓志(2013)〈面對學費政策的階級屬性，教育部分化人民的五種論述〉，見「苦勞網」，2013年4月25日，[www.cooloud.org.tw/node/73890](http://www.cooloud.org.tw/node/73890)
- 徐文路(2012)〈國家／資本／大學／研發的四角關係：歷史的與邏輯的批判分析〉，發表於「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見「苦勞網」，2012年2月13日，[www.cooloud.org.tw/node/66567](http://www.cooloud.org.tw/node/66567)
- 林柏儀(2012)〈反學費的左翼主張〉，發表於「第一屆左翼教育論壇」，見「苦勞網」，2012年2月13日，[www.cooloud.org.tw/node/66566](http://www.cooloud.org.tw/node/66566)

之前的幾篇文章都與境外生面對的差別待遇制度有關，而接下來的文章將會描述境外生在疫情這個特殊時期遭遇的差別對待政策。我們中的許多人被不合理地拒之門外，無法入境，被迫與自己熟悉的生活、親人、朋友、課業所切割，形同流離失所。2020年的經驗讓許多境外生感到心痛，感到對台灣社會的疏遠，但同時這場經歷也讓許多境外生在爭取返台入境的過程中團結在了一起。

作者：境外生權益小組 阿草

對於境外生來說，台灣並非只是一個求學、上課的地方，因為長期的生活與人際聯繫，台灣早已變成許多人的生活重心所在，甚至可以說是「家」或第二個故鄉。疫情來臨之前，儘管有著制度上的差別對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境外生們（尤其是說中文的境外生）像所有本地學生一樣在校上課、做研究、打工、與朋友相聚，出沒於台灣的大街小巷，並沒有什麼障礙。我們熟悉這裡的生活，我們也認同此處的美好與缺憾，所以願意繼續在此求學。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發生打亂了這一切。境外生中許多人遺憾地、有時是憤怒地發現，政府並沒有將境外生視作社會的一員，以為透過線上教學即可滿足境外生的需求。陸生、港澳生分別從1月底、2月初開始被禁止入境，此後未持有居留證的境外生也被禁止入境。無法回到熟悉的生活，疫情本身帶來的恐懼，再加上政策中對境外生身分的否定和無視，讓我們中許多人都感到煎熬與痛苦。

## 一、安心就學不安心

2月3日，因應陸生暫緩來台，教育部啟動了「安心就學」措施，此後也適用於港澳學生和其他無法來台的境外生。教育部宣稱這樣的措施能夠保障境外生的受教權。然而，我們查閱相關政策文件後卻發現，所謂的「安心就學」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教育部的付出接近於零。

大部分「安心就學」措施是對於學生修業規定的放寬，例如修課學分取消下限、報到註冊可以遠程辦理、放寬休學退學規定等。這些措施將學生上課效果下降、無法來台當作既成事實，只是配合邊境關閉的政策合法化了現況。唯一與學生受教相關的措施只有遠距授課此一項，而且規定非常模糊：「學校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請以彈性措施，如同步或非同步之遠距教學協助學生修讀課程。」教育部沒有承諾提供人力、經費補助遠距教學，也沒有要求學校必須為境外生提供配套的遠距教學，措辭中所用的「請」也體現這只是建議性質的條款。各大學實際執行遠距教學情況如何，無人可以監督。

結果，教育部沒有提供遠距教學的配套措施，各

學校執行情況就變得亂七八糟，有的學生甚至形容為「安心就學全靠教師個人為學生用愛發電」。有資源、有人力的頂尖國立大學，可以自己購買遠距教學平台，提供教學助理為境外生們進行課堂記錄。而對於缺乏資源，平常教學助理人力就捉襟見肘的大學，已經因為校園防疫要增聘人手、添置設備了，哪裡還有辦法為境外生提供有品質的遠距教學呢？

於是，能否上課全看老師態度。如果老師不願意，即使是重要的必修課也只能默默錯過，嚴重的情況甚至導致學生延期畢業。老師發了善心，願意讓學生遠距教學，還得看系所和學校提供的支持是否到位。同步的遠距授課需要良好的網路品質、合適的連線平台，此外，相關拍攝、支撐裝置都需要用心準備。沒有相應的支持，遠距教學往往就只能依靠同學的善意，其結果往往不能如意。小多曾投稿陸生返台推動小組，分享自己的遠距授課經驗：「用同學的手機連視訊上課，這是什麼概念，透過手機鏡頭能看清什麼PPT上只有最上面的大字看得清楚，其他都是糊的，網路也卡頓，我上課提問插話都沒人聽得到。除了老師用麥克風以外，坐得遠的同學講話或分組討論根本聽不到……」

更麻煩的是，有時為了提供境外生遠距授課，老師的授課進度會因調適設備等原因而被拖慢。這影響了班上所有學生的受教品質，也容易讓境外生成為眾矢之的。或者，有的課程乾脆不提供同步遠距授課，只有課堂PPT和錄音或錄影供境外生學習，這就將境外生排除出所有課程的討論。對於不少強調小組討論、小組報告的課程來說，無異於災難。

疫情中，大部分國家都實行遠距授課來避免群聚感染的風險。然而這些國家與台灣的差別在於，它們是所有老師與學生都進行遠距授課，老師和學校都會調整授課模式、確保連線品質來讓學生盡可能獲得與實體授課一致的內容以及互動討論。台灣則不是這樣，絕大多數課程與學生都維持實體上課模式，只有佔比極少數的境外生被迫用遠距授課參與課程。於是，境外生免不了被特殊化對待，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持，無法與其他上課同學同步，連遇到問題大多時都不敢提出。

即使是幸運地在一所資源充足也負責任的大學就讀、獲得了老師和同學善意的幫助，也不代表境外生可以透過遠距教學安心上課。因為除了講座類型的課程外，不少系所都有實作、實驗以及實習課程。這些課程是無法用網路連線來補救的。一位本打算108學年度第2學期在林口長庚實習的同學就曾對境外生權益小組說：「因為臨床實習無法網路授課，四個月無法入境讓我的大學生涯完全停滯，我接下來的升學計畫也被打亂。」除了課程之外，實驗室的任務、讀書會、社團等其他更多樣的學習方式也被迫中斷。

教育部對外宣稱的「安心就學」方案實質上只是卸責方案，教育部將維持境外生受教的任務交給各大學，各大學再交給系所，系所又交給老師。層層關係中缺乏資源支持，只有無強制性的建議。境外生的受教

權於是在此被犧牲了。

## 二、被切斷的生活

除了與學習相關的問題外，境外生在作為學生之前，首先還是一個完整的生活在台灣社會中的人。與本地學生，與這個社會中其他所有人一樣，我們也需要勞動、交友、戀愛、買菜、通勤、娛樂、放空等等的生活其他部分活動。此外，人與生活的環境的互動構成地方，熟悉的地方感也是我們生活的依靠，有時我們稱之為「家」。被切斷於日常的生活、被排拒於熟悉的地方之外，境外生的這層痛苦往往不便直接公開表達，畢竟，這是通常被認為是「私領域」的話題，而且每個人的經驗又是那麼「特殊」，似乎難以被共感。所以，境外生權益小組曾舉辦真人圖書館活動以及協助一人一故事劇場活動，邀請有被切斷經驗的同學分享自己的經驗。

TT是一位來自北京，在台灣長期就學的博士生，她以「中斷」、「坐牢」等詞語來描述自己的經驗：

每天醒來的時候，我就會發現我看不到我的家、我喜歡的床單、窗外台北那個天氣。我台灣的家窗外有一條高架橋，但在北京，每天醒來現在都看不到了。然後我的機車、我喜歡的餐廳、咖啡館、我喜歡散步的河堤，都從生活中消失了。我有時候我在北京醒來就下午了，或者就看到夕陽了，就只是看到北京灰濛濛的樣子。這個感覺就好像有一隻從天上掉下來的手，像夾娃娃機的夾子那樣把我抓起來，丟到北京，但那裡已經沒有我熟悉的東西了。這有點像是坐牢的感覺：有一個強制的手，把你丟到一個空的、什麼都沒有的、不能離開的地方，原本熟悉的東西都不在了。這是一種中斷的感覺。

這種中斷的感覺是因為我對台北很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對北京的不熟悉。我快十年沒有在北京生活了，北京很多東西也改變了。過去的朋友都上班了，很忙，或者出國了。新建的好多地鐵線和路我都沒見過，家人現在住的房子也不是我以前住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就沒有熟悉的東西了。

陸生返台推動小組則發起了一封名為〈聲援陸生：台灣還有人情味〉的連署信，除了受教、就學的權益外，還提到了：

我們不僅是陸生，更是台灣人的學生、同學、朋友、伴侶，是課堂上那個喜歡提問的學生，是實驗室裡爆肝到深夜的同學，是分組報告時不算雷的隊友，是某個豆花攤的常客，是中秋節被邀請烤肉時會感動的那一個……我們懷著期待來到台灣，選擇在台灣度過寶貴的求學時光，如今卻被一直拒絕在外。身為學生，我們不想放棄在校園接受教育的權利，更希望不要這樣被切斷我們和台灣的連接！

事實上，生活的連帶，被切割中斷的感覺也並非

是境外生特殊的經驗，而是跨境移動者（不論是國境、市場或其他實體及抽象的邊境）普遍需要面對、處理的。它牽涉經驗、情感、知識以及身體。從南部上來台北唸書，離開熟悉的家進入大學校園，為了生計外出打工，遠渡重洋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們相信移動的經驗普遍存在於每個人身上，境外生所遭遇的不合理的切斷也可以被台灣民眾所同理。但事與願違，不少這樣的分享在社群媒體上被攻擊，被咒罵為情感勒索、賣弄消費。針對陸生的攻擊尤其嚴重，因為不少人將肺炎疫情的源頭指向中國政府，認為中國人皆應為此負責。或者說，疫情讓仇中排外的國族主義情緒被合法地得以宣洩。關於這些攻擊、謾罵的討論，你可以往後翻到小誌中〈兩種「被黑者」的對話：創傷、謾罵與社會分析〉進行閱讀。

### 三、平行交錯的返台抗爭

為了繼續學習，為了能夠入學，為了維持在台灣的生活，為了親人愛人與朋友，境外生們從疫情穩定的5月底就為返台入境開始了抗爭。這是一場平行交錯的抗爭，交錯是因為我們共同的目標都是讓境外生能早日回台，平行則是指不同身分的境外生（主要是陸生、港生、印尼學生）組建了自己的團體或發展各自的行動來試圖達成訴求，相互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連結。無法回台的境外生們多利用網路或透過記者、在本地的台灣辦事處表達訴求，境外生權益小組因為部分成員身在台灣，所以實際到教育部發起抗議，並嘗試針對檢疫費用、政治凌駕學權等問題提出較基進的訴求。下表為境外生們所發起的主要抗爭行動：

發起方	標題	類型	成果	日期
陸生返台推動組	陸生畢業生的一封信	連署	超過1,100人連署 (包括逾800位陸生、56位教授)	5月27日
香港僑生返台關注小組	香港僑生的心聲	連署	582人連署 (包括298位香港學生、122位澳門學生、58位台生、63位外籍生)	6月4日
境外生權益小組	一起向教育部遞陳情書，讓我的境外生朋友回台！	抗議陳情	約10人到場(包括境外生與台灣本地學生)；教育部回應稱會在行政院跨部會協調會時繼續提出境外生返台規畫	6月5日
印尼學生	給印尼生入境！平等看待境外生權益	連署	482位印尼新生連署	7月18日
陸生返台推動組	聲援陸生：台灣還有人情味	連署	1283人連署(包括871位台灣人、344位陸生、其他境外生68位)	8月6日
境外生權益小組	天價檢疫費用，境外生難以負擔！政治凌駕學權，教育自主堪憂！	抗議陳情	近30人到場(包括境外生、台生、老師與NGO團體)；教育部回應承認陸生被排斥是因兩岸政治，將增加大學檢疫宿舍，減輕學生負擔	8月7日

返台抗爭的論述，主要是基於境外生經驗的受影響陳述以及對於入境管制的科學質疑。受影響陳述包括上文所說的遠距授課問題、生活被切斷的痛苦、對於入境管制的質疑則主要是利用公開數據、媒體報導中的資料探討境外生來源地疫情狀況與台灣的防疫量能（尤其是居家檢疫）。

境外生權益小組6月5日於教育部門前抗議時就提出，若校內檢疫宿舍可配合7月暑假開放，境外生分五批入境，每校每批平均僅需安置36人，結合台灣各

大專院校宿舍容量，每所學校皆能達成要求，在9月開學前讓境外生全數入境。香港僑生返台關注小組與陸生返台推動組則在進行連署的同時兼做問卷調查，以數據呈現境外生返台意願、所受的影響以及配合政府檢疫的決心。例如，香港僑生返台關注小組特別強調「高達99%(295位)的香港僑生能夠保證絕對遵守台灣的防疫守則」，「55.4%(165位)的同學認為維持14日居家／集中檢疫、30.4%(90位)的同學願意提升至21日的居家／集中檢疫，14.2%(42位)的同學願意提升至28日的居家／集中檢疫」，為了返台甚至不惜提高隔離天數，讀來讓人心酸。

而印尼學生的連署，發起者和參與者幾乎全部都是新生，因為持有居留證的在學生可以正常入境台灣。雖然少了兩岸政治的風波，但他們的處境也有苦處，因為印尼在東亞整體疫情趨緩的暑假期間仍然維持著每日一千人以上的新增病例數，屬於高風險國家。而且，新生相比於在學生，所受的學習、生活影響相對難以呈現，他們尚未進入台灣生活，但在求學、報考的過程中也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只是這部分難以被看見。所以，印尼學生的連署策略性地講述印尼作為面積廣大的群島國的特殊性，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爪哇島，其他區域疫情穩定，希望教育部逐地區開放印尼新生入境。

學生之外，不少教授及大學團體也發聲支持境外生回台。中研院副研究員、交大社文所副教授王智明老師曾以「教育平權，全數回台」為題在教育部門前發言：

所謂「教育平權」是一個簡單明白的概念，學生既然繳了學費，成為我們的學生，學校就得要提供相應的教育，讓他學習與成長。這既是他作為學生的基本權利，也是學生與學校之間的契約關係。今天，學校收了學費，就有責任在能力範圍內，提供最好的教育。任何使得教學無法遂行的狀況，學校以及主管機關教育部，都有責任和義務予以排除……我們今天之所以站在這裡，不是為了別的，就是因為政治力的介入影響了境外生，尤其是陸生的受教權。如果在電視機和網路面前的朋友們曾經支持過「婚姻平權」和「多元家庭」，那麼「教育平權，全數返台」的訴求，也值得你們支持。「教育平權」與人權相關，亦是民主的表現。自稱民主自由的台灣民眾，若是不能為這些因政治因素而受傷和受害的朋友們站出來，不是枉費了我們對民主的期許，放棄了人權立國的價值。

王智明老師強調的是境外生返台受教的權利基礎，以及政治力強行將學生依國籍身分區別對待的荒謬性。政大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也曾到場聲援，舉出身邊有博士陸生寒假去越南做田野調查卻因國籍關係不能返台的案例，批評防疫政策只看國籍不看科學。

政治力最誇張的呈現是在8月5日，當天下午教育部發函所有大專院校，准許所有在學境外生均可返台，其中包括陸生。各大學也依照此公文通知全部在學境外生返台日期，購買機票，進行返台許可的申請。

然而，當不少陸生購買了機票準備入境材料時，教育部次長劉孟奇卻在晚間6點受訪到一半時改口稱此次開放不包括陸生，因為「跟兩岸相關的一些考量」。公然以兩岸政治因素排拒陸生入境，這是疫情以來的首次。教育部的政策「髮夾彎」迅速引起輿論批判，境外生權益小組於8月7日前往教育部抗議。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及私立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也發佈聲明，譴責教育部和陸委會的做法損害陸生受教權，有失公平。然而，面對教育界的抗議，教育部、陸委會及疫情指揮中心的回應卻是互踢皮球，甚至出現政府部門間互批失當、推卸責任的荒唐景象。最終，遲至8月24日在學陸生才和其他境外生新生一起被准許入境，影響人數超過五千人。

#### 四、可以入境了，然後呢？

每一次開放境外生入境都令人激動、開心，但政策上的開放並不是終點，也是許多問題的開始。我們發現，境外生入境過程中面對兩大問題：第一是檢疫宿舍量不足，學生被迫入住價格昂貴的防疫旅館；第二是境外生入境需要透過學校申請教育部的許可，行政手續繁雜，不少學生因學校和教育部的行政作業問題而無法及時入境。

防疫旅館高昂的價格成為不少境外生來台的經濟障礙。根據香港僑生返台關注小組在6月初所做的調查，若於校外進行隔離檢疫，65%的學生都希望每日費用控制在一千五百台幣以下，只有約15%學生可以接受兩千台幣以上每晚的房價。然而，現實狀況卻是防疫旅館趁著境外生返台大肆漲價。根據境外生權益小組在8月初所做調查，每晚房費普遍高於兩千台幣，十五天檢疫花費高達3至4.5萬元，幾乎相當於境外生一學期學雜費。參與調查的境外生中九成認為防疫旅館費用過於昂貴。9月，隨著更多境外生入境，防疫旅館價格在此基礎上更加上漲，部分學校的學生完成檢疫過程需要花費五萬元以上。

居家檢疫，本是政府防疫政策的一環，也是入境程序的一部分。境外生有義務配合此政策來降低整體社會中疫病傳播的風險，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境外生和其他入境者在此過程中也犧牲了個人的自由，犧牲了在此期間學習、工作的機會。因此，十五天的居家檢疫是基於社會公共利益對個人的要求，不應該被視為一種消費行為，也不應該將居家檢疫提供的公共責任推向商品市場。此外，居家檢疫中也存在明顯的差別對待，非中港澳學生，只要擁有台灣籍或居留證就可以在自己的住處進行檢疫，而大部分此批入境的境外生不論自己是否有住處都被要求在昂貴的防疫旅館隔離。

教育部在此過程中應負主要責任。它本應盡可能協調公共資源供境外生完成檢疫。但卻故意在6月中第一批境外生開放時，命令各校境外生必須於防疫旅館進行檢疫。到7月初，教育部才慢吞吞地發文給各大學說可以準備檢疫宿舍申請，但各大學要準備足夠的材料，向衛生局申請檢疫宿舍核准，過程非常繁瑣，

不是想辦就能立刻辦的。教育部不提供協助，還拖延各大學申請的時間。結果，這兩個月回台的境外生幾乎都無法入住檢疫宿舍，都要將錢塞進檢疫旅館的口袋裡。8月底，看到境外生返台人數不如預期，教育部在抗議之下才協調了集中檢疫所相對平價的床位（一晚一千五百元）來滿足學生需求。

防疫旅館的經濟門檻之外，部分境外生還因學校與教育部的行政作業問題而無法入境或被延遲。光是境外生權益小組就收到過政治大學、文化大學等境外生入境受阻的案例。

港生W同學是國立政治大學的新生。7月底，學校說他們大概可以在8月17至19日這個時段中選擇回台。於是，W同學買了一張17號的機票。但是因為申請入台證和入境批文進度過慢，8月17日他無法登機，只能花錢更改機票至26日。沒想到校方在向教育部呈報資料的過程中又延誤了，導致教育部以時間不足為由，單方駁回所有26日到台的批文申請。學校和教育部互相指責對方不按要求辦事，無人願意負責，受損的只有境外生。W同學默默地一次又一次被延誤回台，光是更改機票就花費3,400台幣，學習被延誤的損失更難以計算。

中國文化大學的情況則更嚴重。因為多次申報資料出錯，整間學校的境外生返台申請都於8月底被教育部暫停，時間長達一週。不少學生都是在訂好了機票和防疫旅館後才被告知無法申請入境。教育部說暫停申請是為了懲罰學校，但實際上卻都是境外生在默默承擔損失。

返台路漫漫，一波何止三折。如今，大部分境外生都成功入境回台，也有一些同學心灰意冷而放棄返台繼續學習。回望整個境外生返台（運動）的過程，我們看到，政府沒有在疫情這種特殊時期選擇與境外生一起共渡難關，而是採取了切割、封鎖的策略來將我們作為外人排斥於門外，確保「台灣人」的健康與安全。

我們感受到不安，認識到差別，「平等地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想像如泡泡一樣被戳破。政府的推卸責任、民間社會的惡意被赤裸裸地擺在面前。從此以後，我們無法再像從前一樣安心當個學生而已。恐慌、畏懼、失望、厭惡，種種情緒縈繞心頭。

然而，僅止於此嗎？

不。我們不安，但並未頹廢。我們失望，但並未絕望。我們意識到，自己是非公民，自己是這個社會中隨時有可能被剔除、切割的部分，我們所要對抗的是公民／非公民的界分與排除，我們不求政府的承認，但求民間社會可以突破國籍身分、性別、族群的疆界可以在面臨危機與壓迫時團結於一起。

風雨中，境外生、所有非公民、所有人民，團結起來吧。

# 抵抗的經驗：「本外平權」運動

這篇文章是2017年由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所撰寫的文章，記錄了我們推動境外生平等健保納保過程的論述與經驗。當時，總統蔡英文宣佈基於「人權」要將陸生納入全民健保（此前陸生因停留身分而無法加入健保，但其他境外生皆可加入）。這是境外生權益小組所支持的，但問題是，政府在納入陸生的同時宣稱要為了「公平」調漲全體境外生保費，上漲幅度高達每月五百元。我們認為，這種做法造成本地學生與境外生在健保費上的脫鉤，嚴重違背了健保作為社會保險「量能負擔」的原則，政府所謂的公平只是排外的粉飾。我們反對，我們抗爭，我們第一次站上街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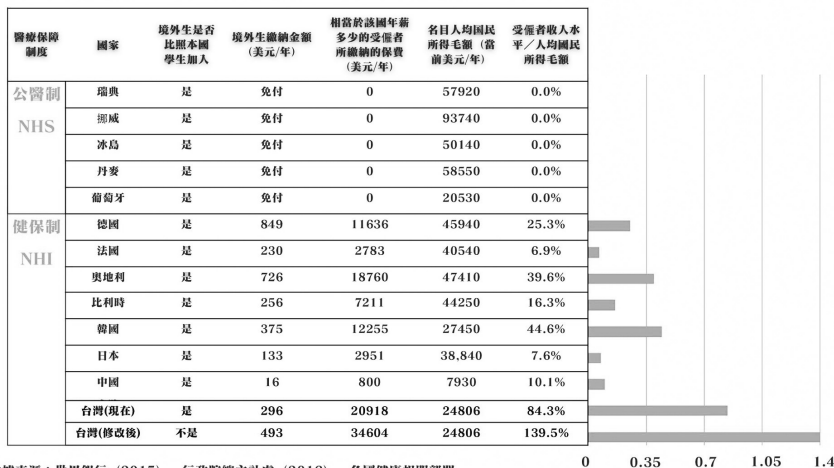
作者：馬來西亞籍境外生、世新社發發展研究所研究生、  
境外生權益小組成員 黃康偉

提到境外生，台灣社會不免會抓著頭問，這個詞到底指涉哪些群體。也許，社會大眾腦袋裡浮現的就是一群金發碧眼或是長得烏漆麻黑的外籍生，印象中，他們要不來自先進社會，到台灣遊學享受人生，又或是來自未開發社會，那裡被戰亂所波及、無水無電、迫切需要人道團體前去救援。

即便不是上述兩類，必然也是因為政治因素而「逃難」到台灣的華僑，就如每當我介紹自己來自馬來西亞時，台灣朋友總會問：「你們那裡是不是排華？」、「你怎麼會講國語？」和台灣大學城鄉所研究生蔡博藝感受到熱情洋溢的台灣不一樣，我在尚未來到台灣之前，只能從學長姐或是師長間口耳相傳，以及電視上喧鬧的影像認識台灣。我以為，我們同樣看5566成長，同樣喊著「56不能亡」，享受著同樣的流行文化，我們就都一樣了。

結果顯然不是的。每當我一開口交談，身邊的人開始辨識「敵我」，辨識「你從哪裡來」。當我們說出一個個國家機器強加在我們身上的身分時——可能是：僑生、外籍生、港澳生，又或是陸生<sup>1</sup>——又常常被認為「佔用社會資源」而遭到白眼。

國際健保大比較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2015）、行政院總主計處（2016）、各國健康相關部門

- 1 境外生健保出了什麼事
- 2 民進黨修改理由是什麼
- 3 我們為什麼反對調漲保費
- 4 接下來怎麼辦



## 我們帶來的是答案而非問題

同樣身為「外來者」的移工和外籍配偶也都面臨類似的處境，我們被認為是國家和人民潛在的威脅，無論是搶奪工作機會及社會福利，又或是被認為文化差異的行為怪異，帶來社會不安，我們都被認為是帶來問題的人。

以本次推動「陸生比照現行港澳僑外生保費加入全民健保」<sup>2</sup>為例子，從境外生權益小組做出的國際比較圖<sup>3</sup>來看，一般來說，無論任何國籍的居住者一般都會獲得身處的社會中一部分的公民權利(partial citizenship)，例如保障健康的公共醫療保障制度就是例子。無論是實行公共醫療制度(公醫制)，還是實行社會保險制度都按照這個原則比照辦理，加入者的權利也不會視國籍差別而差別待遇，並且費用也按照「量能負擔」作為實施原則。

以台灣現況來說，健保以「居住」作為納保的考量，境外人士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9條，居留滿183天，又或是以受僱者的形式加入健保。就業者以受僱者身分於受僱單位投保，自付額度按照薪資級距累加，現最低級距為21,009元，自付金額294元。無業者則以第六類第二目的地區人口身分於區公所投保，自付額度749元。由此可見，就連台灣也是按照這套原則行事，為何碰上陸生來台就無法比照辦理呢？

### 健保為社會保險，採用「量能付費」原則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 101-9-4)

## 1249元保費相當於

### 月薪87600元受雇者的保費個人負擔

(根據2017數據，月薪87600元為台灣人均國民所得毛額的1.4倍)



一個沒有收入的學生需要負擔相當於高所得者的保費用

- 1 境外生健保出了什麼事
- 2 民進黨修改理由是什麼
- 3 我們為什麼反對調漲保費
- 4 接下來怎麼辦

這正是台灣的弔詭之處！陸生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法》規定其為「停留」而非「居留」，永遠恍如「空中飛人」一樣生活在台灣，他們即使待在台灣境內滿183天，也無法符合加入全民健保的資格。而這套規則的始作俑者，正是國、民兩黨在通過陸生來台的法案時，不願意配套地給予與其他境外生同樣的對待。此次，總統蔡英文拍板的修法，雖然讓陸生納保帶來了曙光，卻不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法》的不合理之處，並且以「全額自付」<sup>4</sup>的形式強迫全體境外生加入全民健保。

種種法條上的不友善，加上上述的社會偏見，都促使廣大的境外生集結起來進行抗爭，不分本外，形成一場跨國跨境的社會運動。我們從小組出發，起名為「境外生權益小組」(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 簡稱TISM)<sup>5</sup>，就是希望不管是大陸學生、台灣學生，又或是其他來自各地，在台灣使用不同身分別，適用不同法規的群體，都積極組織起來，為了自身的社會權而奮戰。<sup>6</sup>

我們質疑國家對於人權論述的濫用，當權者所謂的「人」，只是一張張手握選票的選民。當權者可以為了討好選民，犧牲掉對其政權沒有影響力的「人」，忽略其在這個社會中實際存在著，也同時被政策法令影響著。移工是如此，外籍配偶是如此，境外生更是如此。作為一個非公民，我們企圖挑戰國家劃下的界限(boundary)，也企圖揭穿政客的假面，我們希望帶來的是豐富的思辨，一點一滴瓦解台灣社會將「外來者」問題化的偏見。

### 偷安還是抗爭選一個

當然，這場運動的形成並非一帆風順，我們必須面對的是陸生群體主流的「你們的健保很好，但我從未向你們乞討」<sup>7</sup>這類的說法，也得面對港澳僑外生認為，陸生才是將其他境外生拖下水，導致制度改惡的偏見。境外生的主流想法都認為，全民健保對外來者不友善，境外生只要拒絕不要被「強制納保」即可。<sup>8</sup>人在異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選擇到外地唸書，無論好壞，能避開就避開，無法避開就只能接受。台灣社會主流也認為境外生「不爽不要來」，既然喜歡台灣，到台灣唸書就得全盤接受，不喜歡大可以離開，「太平洋沒加蓋」，從而質疑境外生上街抗爭的合理性。

這些種種不利的因素，對於組織內部都是一次次思辨上的考驗。而且，參與抗爭的境外生都是冒著觸犯「來台目的不符」的罪名上街，<sup>9</sup>隨時都有被遣返的風險。我們的第一次上街，也被台灣媒體描繪成「破天荒」，<sup>10</sup>更有網絡紅人煽動民粹，以各種方式攻擊及嘲笑境外生。<sup>11</sup>這些挫折都讓境外生，尤其是長期遭到社會汙名化的陸生對於上街請願感到卻步。

但境外生權益小組很清楚，種種的害怕與阻擾，最終得益的將會是當權者。蔡英文政府的目標，就是將國族作為劃定的單位，提高非本國者加入全民健保的門檻，推動全民健保制度日趨商品化。只要境外生不加入，或是自願加入不公平的全民健保制度，都是在服膺於這個目標。最糟糕的是，其後果恐怕也在將來連動其他非本國者的條款比照改惡。<sup>12</sup>

## 團結才是力量 Bersatu adalah kekuatan

是故，境外生權益小組認為，只有釐清當權者才是分化及壓制我們的主要敵人，團結及拉攏更多團體及群眾的支持，才有可能在戰鬥上處於優勢。未來還有廢除歧視陸生的「三限六不」、平等的工作權益、學費及其他公共政策需要推動，社會對於「移人」的偏見也需要扭轉。

但這些問題和當前台灣的運動密不可分，境外生面臨的高學費問題，廣大的私立大學學生也在默默承受同樣的學費壓力；台灣公民團體如何面對自身法條上忽視人權的做法，多少移工在僱主的威迫下走上「逃逸外勞」的道路；我們又應該如何面對台灣主流社會天真地以為國家利益等同於個人利益，乃至階級利益的問題呢？

我認為，境外生權益運動不再是一條狹隘的單線(line)作業，它更像是一個集線器(hub)<sup>13</sup>，衝破的是議題，衝破的是國界，衝破的是枷鎖，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英特耐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Internasionale pasti jaya di dunia)。



2017年5月2日，境外生權益小組於立法院前抗議健保費用本外脫鉤。本文作者黃康偉(中)。

## 註腳

1. 境外生即港澳生、僑生、外籍生及陸生的統稱。
2. 全稱為「反對調漲全體境外生保費，訴求陸生比照現行港澳僑外生保費加入全民健保！」，詳見連署聲明稿，<https://sites.google.com/view/tism20170111nhiforall/home>
3. 詳見余雅琳(2017)〈境外生納保排擠資源？黃康偉：台灣年賺一億〉，見「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2017年5月8日，<https://www.civilmedia.tw/archives/63832>
4. 修法前已經在全民健保制度內的境外生不受影響，短期來看，影響的是陸生群體，但長期來看，港澳僑外生群體被波及最大，尤其是像我這樣來自東南亞的學生群體。
5. 詳見境外生權益小組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ismovement>
6. 相關討論如陳炯廷(2015)〈社會權問題延伸下的大學生住宿問題〉，見「苦勞網」，2015年6月4日，<http://www.coolcloud.org.tw/node/82660>
7. 張逸帆(2015)〈陸生：你們的健保很好，但我從未向你們乞討〉，見「ETtoday」，2015年11月29日，<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129/605100.htm>
8. 技術上，二代健保上路後，境外生需要居留滿183天，之中只可以離境一次，一次不可以超過三十天，這比起一代健保的連續居留滿四個月的門檻還要高。境外生只要設法無法滿足居留滿183天的條件，就可以不必強制加入全民健保。
9. 陸詩薇(2014)〈外籍生參與學運是否會被遣送出境之法律意見〉，見「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2014年3月26日，<https://www.jrf.org.tw/articles/1131>
10. 簡立欣(2017)〈健保全額自付 陸生破天荒上街抗議〉，見「中時新聞網」，2017年4月29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429000785-260302>
11. 〈中生上街抗議健保 被嘲：ROC不存在耶〉，見「蘋果新聞網」，2017年4月29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429/1108203/>
12. 江慧琄(2017)〈僑外生反保費跟漲 衛福部：非本國民應有區隔〉，見「蘋果新聞網」，2017年6月2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602/1131176/>
13. 靈感來自吉隆坡文運書店張永新，特此向前輩致敬，詳見〈吉隆坡文運書店張永新訪談(三)：我是群島人〉，見「諸眾之貌」，2016年11月29日，<http://multitude.asia/archives/823>



(四)

專輯策畫 Matthew

情慾

與身體

本輯打頭陣的是《T婆工廠》與《彩虹芭樂》的觀後感，從境外生的角度開拓一個連線的空間。談移工情慾，實際上展開的問題就是非公民的生活如何可能的問題。情慾不是突發的意外，而是鑲嵌在日常之中的平凡事。是一個身體、心靈與物質交流的場景裡，如何自處與相處的功課。

丁乃非的訪談是這一輯的亮點，這一個現任境外生與前境外生關於留學經驗的對話。其實在約談的時候還是猶豫的，境外生這個用詞其實是一個「台灣的發明」，有它生成的脈絡，狹義來說是指來台就學的域外學生的總稱，包含僑生、陸生及其他地方來的學生，是具有濃厚國族意識下的一個範疇。它可能是一個相對應於foreign student的中文翻譯，但兩者沒法完全疊合。二來在丁乃非的年代卻是以「留學生」為稱呼較為普遍，貿然這樣用「兩代境外生」不知是不是歷史的穿越。

但我轉念又想，境外生在這裡指的是一種觀察的視角，是一個有意的挪用。它不必成為身分，卻始終是個發問的位置。我隨即想到的即是丁乃非化用莊子的「眾罔兩」，難以察覺的影外微陰。「眾罔兩」不一定只存在於過去，正如境外生也許在當下是面目模糊的一群人，是「眾」，在不同的歷史節點可能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與內容。境外生擁有真實的身體與慾望，擾動常態的界線，就正好是整理公民／非公民複雜性的機會。

# 那又甜又酸的味道： 《T婆工廠》、《彩虹芭樂》觀影札記

據TIWA網站的記述：

2004年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協助飛盟電子一百多位菲律賓移工進行關廠抗爭，過程中遇見廠內許多同志伴侶，因而完成《T婆工廠》紀錄片。當年這些為愛共赴天涯的同志伴侶們，如今安在？

《彩虹芭樂》是《T婆工廠》後續。TIWA拍攝團隊追逐她們的移動的腳步，從菲律賓追蹤中東杜拜等地，繼續記錄她們的愛情故事、性別穿越與生命變化。

文化研究學者何春蕤曾經說過：「《彩虹芭樂》是《T婆工廠》的續集，講述了這些T婆戀情後來的發展；但是從勞動的角度看，《彩虹芭樂》應該算是《T婆工廠》的前傳。」可以說，她們是一個故事的兩個側面，勞動與愛，移工生命的不同階段。而紀錄片則呈現了常態的「非常」，以及非常的「常態」。

如果我們認為《T婆工廠》仍有一種外顯的公共性，呼喚那些關心勞動環境的人。那麼《彩虹芭樂》給我們的感覺則是更私密的一些個人故事，低度的政治意味。假若把她們放到文化研究的視角，工人（階級性）、女性（性別），菲律賓人（種族）的交匯，在抗爭的時候，這些肉身集結起來。抗爭事件追回超脫移工的日常，正如我們覺得離鄉背井可能也是非日常的（假設在母國是某種日常），因為要脫離家庭與原居地，但再細想這個「非日常的非日常」卻是辯證地回到最日常裡去，為了家人的生活必須找尋機會賺更多的錢，而這些移動也是為了安身立命。

## 情境與性

當移工出現在電視媒體，每每關於逾期居留、失聯等。近期則可能是被當成疫症傳入的破口。對於她們的形象要不是負面而貧乏的，要不就是不存在。而生活面向多略而不提。就算是工作為目的之移動，人依舊有彼此靠近的需求，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分工佈局所無法取消的，但是微弱如燭光的願望可以怎樣掙扎呢？把生活跟情感的面向勾出來，比起抗爭的場面，或許更深刻。她們不是數字跟人力資源，而是悲喜交集會呼吸的人。

《T婆工廠》的一個重點是談到「性」的部分，在員工宿舍裡如何「性」。在片中，TIWA的靜如追問「空間的限制」如何允許「身體的親密性」：有人以安靜抵抗，發展出她們的情慾，充滿遐想的空間。空間很小，但是情欲卻不受物理影響，有一個自足小天地。及後在眾移工離開狹小的房間，我們得以窺見內部的狀況，這是她們生活的場景。

事實上，許多的觀影座談都有觀眾提出類似的問

題，例如一種把《T婆工廠》與《彩虹芭樂》兩片的讀法塞進「情境式同性戀」的框架，意思就是，她們的關係僅僅是那個剝削的場景所擠壓出的共同感，而到後來回到本國或其他地方就回復每個人的「自然本性」了。這可能就是一種脫離了原來的情境就沒有愛的決定論。前者是甜蜜的，後者則把現實的殘酷揭開。後見之明就是那個真實。

移工們在台灣的時候，她們都在心裡糾結。片中人Bing一再解釋朋友與愛人的差別，這種「分離」恰好暗示兩者的連續性，是根本分不清楚的，但同時這種張力就是我們讀出愛的芭樂的甜酸。事實上，lesbian既與自己的性別認同有關，也與自己的慾望有關，「做性別」（doing gender）與性（sexuality）從來都分不開。「情境」的問題，從來不只是空間問題，或時間問題。想深一層，「情境」與「同性戀」均需予以問題化。她們面對的，難道不是一種更複雜的、更難以言明的情慾狀態嗎？

討論用「情境式」來特殊化「同性戀」有個隱而未見的前提，就是某個正軌的常態化、非「情境式」的。即使撇開同性戀來講，「長久在一起」關係的粉紅泡泡才是「好」的關係，或具有一種不言自明的共識。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對於飛盟移工，早在公司關廠需要換新僱主的時候，那種身不由己的、分離的痛。也就是說，她們更早就接受了關係不能長久的事實。從而拉開我們的視角，她們從一開始就是在一種開放式關係的實踐之中，而並非純粹的單偶的同性戀關係——縱然喜歡的對方是女性。這關乎到條件，飄泊流動的非公民-移工-女性的接合，並非基於自由選擇，似乎就是許多的偶然。這直指一個核心問題：有哪一種關係不是在某個情境裡發生的？

在一種較優勢幾無可疑的異性戀社會，才可能把長久地視自身為必然。未知從飄洋過海就開始了，不因關係的確立而變得安定。這種以「不可能」為起點的關係，既脆弱也強韌，充滿著機緣巧合（包括分離），但是這種機緣巧合，正是我們看到許多的姐妹情誼，也就是Ellen所講的「多於朋友的那些」。這甚至不是單純用

女同志的身分可以涵蓋的，一個漸進的光譜，一條彩虹，用最平實的方式活出了家庭關係以外的親密性。

## 觀看與被觀看

Tiwa骨幹的造訪，在移工生活的當下打開了記憶盒子。拍攝者的介入，拍攝本身也作為推動敘事的要件，也被拍攝，並不懸空與冷靜。這既是觀看也是拍攝。過去、現在，以當下凝視。《T婆工廠》的碎片滲透在《彩虹芭樂》裡。

Lhian觀看T婆中Pher的身影，讓她認識到台灣的工作狀況與Pher前度Gie，加上她分享與相處的部分，形成我們對於Pher愛情的虛無的看法與往日把女友放在生活的重心，有一個今昔的對比。另一邊廂，在重看影片時候的回憶時，鏡頭向著孤身一人的臉部特寫，《T婆工廠》裡的Ellen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看，甜蜜的情話在另一個脈絡詮釋，一種事過境遷的失落感。而在現實中已成入妻的Elsa回想在台灣時的自己，雖然是真的喜歡Ellen，但是也覺得礙於世人的目光以及宗教而有罪惡感。不過Elsa每次談到Ellen，眼眶會紅。

移工們的同性（戀）關係就像一個隨著地形與時間改變的陣地戰，何時該進，何時該退，如何去確認並理解彼此的心意，都是變動不居的。如果單看「目的」，可能都是不完滿的。疾病、工作機會、人生規畫都可能拆散這些關係。移動把這些資本堆砌出來的剝開「穩定」的面目，都原原本本給我們看。結尾提到杜拜的表面光鮮（這是許多T婆離開台灣之後的下一站），可以任移工自由選擇工種，但是鏡頭一晃照著五光十色的夜空，螢幕上出現的文字描述自殺的移工，許多繁華裡被默默抹消的生命。長年的工作，無法進行自我身體照護，如紀錄片開頭與結尾幾場喪禮所示，死亡也是移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的脆弱性也是這些情景所帶給我們的，情感的脆弱，身體的脆弱。跨國移動，國與國的階序，體現在人的勞動處境中，生活權的剝奪，公民與非公民的二分，使得共同生活變得苦難。快樂與哀愁不是一條直線的兩端，而是絞成一股的繩子。

片中教人深刻的，還有十幾分鐘的枕邊話。Pillow talk有一個深刻的問題是，對於T來說，是婆跟男人在一起，還是婆跟了另外一個T在一起，比較感覺受傷？是的，這些都是無解的問題。或者說，發問的行為意味著一整套價值觀。輸給體制比輸給某人好，家庭恰恰是這麼一個巨大的應許與召喚，就是一個公認最好、最適合女人的出路。這恰好回應了，Yam與Bing或是Ellen與Elsa這一對，無論是T還是婆，其中都有人步入異性戀婚姻，而Lan與Pillar更是踏在四角關係中，有了孩子但沒跟男人結婚，無法歸類的。Yam無法承受秘密的重量，而Bing說要讓她「move on」，Yam的生活仍得繼續下去。Bing的說法暗示了異性戀家庭一個「未來」的向度，而同性之間是沒有未來可言的。所謂異性戀關係獲得支持，是需要家庭跟社會的首肯的，而兩個人互相的親密性能不能夠被大多數所認同，也變成了關係能否走下去的一個關鍵點。

而對於在場的T，另外一個T其實就是另外一個跟自己太像的手無寸鐵之人，所以覺得不能接受自己的婆跟了另一個T，隱隱然有種弔詭的認可在內：她們也是來真的。從這群移工T的對話之間，我感覺成家其實跟愛情的性質不同，基本上進入婚家類似滿足一種外界對於女性們的期待，與愛情無涉。另一個值得深思之處是，我們看到更多的不是同性戀與婚家正面交鋒而是退讓，但是這種退讓又不全然是被動的，而是充分替對方設想、充分同理之下的一個決定。這固然與一般浪漫愛然後步入的婚姻想像不一樣，也與當前的主流追求同婚式的平等不同。既然她們的關係是以自我的退讓作為手段，她們不抗爭了嗎？初看之下，她們像是沒有去捍衛自己的感情，甚至順應了體制。為了成全對方的生活，採取了一種非對抗性的態度。表現的是跟內在的掙扎與對話。不足為外人道的是，她們用肉身實踐對於婚姻的深刻思考。

看這個紀錄片的時候，我深刻地感受到自身經驗的局限性，以及批判話語抵達不了的地方。

對於，進步／保守的分野變得無關重要，關係裡的忠誠與排他的一體兩面。

這應該是一種同情共感嗎？

這個跟境外生有什麼關係呢？移工好像離境外生很遠，但細想並非如此。踏上這片土地，許多境外生都有勞動經驗，可能是在外打工，或是當助教或研究助理等，並不鮮見。而境外生大家都知道她們的存在，每一個大學都有，但是她們在學習以外在做什麼，也是沒人在理會的。非公民的大傘下，裡面有許多差異。國界把人分類，需要這些勞動力，但不需要這些特定的人，把這些人是可置換的零件。《T婆工廠》跟《彩虹芭樂》邀請我們進入這些活生生的生活軌跡。也在提醒我們，移動本身作為一種既有差異又共享的生命經驗，我們雖然同處一個物理空間，但或許視而不見，這是一個打開眼睛的契機。當一些事情彷彿跟我們無關，就像工人與學生的割裂，意外地透過移動的視角重新聚焦起來，那個「無關」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權力的分化效果。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我們帶著不同的慾望或目的來到此處，同樣是一個我與非我的邏輯中進行，這並不是能獨自選擇想要的身分認同。

同理，接續上面的啟發，境外生與其說是一個身分，不如說是一個情境，如蟬脫殼的場景。蟬蛻的特性是生長必經的階段，曾經緊緊包裹的殼會成為一個對象，既有我的形狀，亦非當下的我。來到台灣成為境外生，是不會磨滅的經歷，但我們會畢業，終將抵達別的情境，帶著情境活著，也被過去所包覆。

以抗爭為主調的《T婆工廠》，有種樂觀的味道，佐以五味紛陳的《彩虹芭樂》。絕不「陽光同志」，但也不止於痛苦的掙扎，與現今同志再現有截然不同的味道，種族、性別與階級的軸線交疊、互相突出。沒有超脫，沒有揮慧劍斬情絲，未完待續，T婆們的生活仍得繼續。

影片中揮之不去的：「生命中有些東西來了，就開放地迎接它。」

# 兩代境外生：丁乃非訪談

## 前言

我認為這是個非同一般的訪談。為什麼要訪問丁乃非？她有什麼重要性呢？

在學校網站她的專長介紹是，性別研究、文化研究、小說閱讀／理論、女性主義之性別政治。一般而言，學術界會把她定位為性別研究或是文化研究學者。然而要重新鉤沉她如何來到現在的位置，我逐漸發現，那其實是一個三十多年前境外生的故事。

首先，這是一個前境外生與現任境外生的對話，我從香港來到台灣唸書，丁乃非也不是普通的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她移動的軌跡相當的迂迴，從非洲到台灣到美國，再回流台灣當教授。她的位置是多重的，以博士生的身分投身婦運，之後又從那出走，與何春蕤等人在學院的英文系裡建立性／別研究室，採取跟主流性別不一樣的基進立場，及後作為骨幹成員設立「亞際文化研究學程」，放眼全台及亞洲，這均可說是極為實驗性的。這一切一切的起點都是從境外經驗開始的。知識生產離不開眾多境外經驗的累積，才打造了別樹一格的學術生涯，如同她的寫作總是在漫長的閱讀與修改過程中成形。

第二，來自我對學術的好奇心，一來是身為她的學生，二來她極少接受訪談，因而滿身都是秘密。聽丁乃非講話，往往是痛苦加愉悅的雙重體驗，高密度且從不斷句的句子，就像不斷分岔的小徑，而她彷彿一隻優雅的鹿能夠直覺地穿過去，一不小心就落在後頭。這也是訪談最具挑戰性的地方，我要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她好玩的離題變成我們之間的學術交流，所以在訪問之前，先重溫了一遍她同代的運動者吳永毅的《左工二流誌》，進入三十多年前的脈絡。我也是在跟作為研究者的自己在搏鬥，這個訪談註定是困難的。因為我們倆都在不同的位置中移動，形成視角——學生／老師、男性／女性、不同代際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也許還有更多……

我其實不知道這個訪談會把我們帶到哪裡，但就這樣吧。

## 我的性別道路——從境外經驗看學術生涯

當我問有什麼啟發了她，她就緩緩攤開她的世界給我：黨外運動、左翼……一些很硬又充滿歷史質地的詞語，帶點刺激又神秘感。包括由王蘋（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當時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生）跟吳永毅（現於台南藝術大學任教，當時是同校碩士生）成立的留美

學生組織——「箴言社」。他們會邀請路經加州灣區的講者演講，比如在地的一些的女同性戀的組織，甚至是政府還會特別「關照」的。如此種種，她說這是一個重新認識台灣的過程，多元異質的經驗促使她開始思考何去何從的問題。

另一方面，她說她趕上了一個好時代。那時六〇年代全球性的學運年代之後，熾熱的思潮匯流進美國的學院，她所就讀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也不例外。在那裡，她在遇上亞美文學的泰斗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的課，讓她對於殖民與文學傳播的關係、文學如何被正典化並非是純文學而是跟政治相關的等等有了認識，也讓她讀到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與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後殖民理論家的作品。這些都大大擴闊她的眼界，同時炸開她的知識結構，甚至有一段時間交不出論文（誰能料想得到？！）。同系的老師都稱三好為瘋子，據她的同學吳永毅記述，三好將夫的事蹟包括幫助一個陌生醉酒的流浪漢從警局保釋、註冊上課，又憶起在家裡上課時，看見他收養的不同族裔的孤兒叫老教授「Daddy」，是一道學院裡難得的左翼風景。在那之後，把原本純粹的、文學的東西砍掉之後，她就開始觸及「文學與政治」的問題了。

何謂知識的轉化？我也有一個印象頗為深刻的地方，在上丁乃非的女性主義論述時，一個指定閱讀是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名著《簡愛》（*Jane Eyre*），中文系出身的我以為就是典型的經典必讀，想當然是一個勇敢追愛的故事，誰知急轉直下，丁乃非把《簡愛》讀成一個外遇與種族排除，與殖民觀點造成正典化效果的故事。相信這是她講的知識掉落一地的感覺吧。

她作為「境外生」的路徑較為迂迴曲折，先是在非洲，接著回台灣接受中學教育，再之後往美國高等教育及深造。而她的母語是英語跟法語，然後才學中文。然而我更為好奇，這種多語的環境對於身分就有擺盪的作用，她的感覺又是如何的？

回溯到大學部的時光，她說她想自己會比較像是「境外生」。

我研究所階段主要是與來自於台灣亞洲的人往來，女性主義與女同志的社團。我大學的感覺是作為境外生的感覺很強，因為我小的時候有過非洲的美國學校經驗，所以我講的英文聽起來很像美國人，可是我的情感經驗很像境外生。我在大學部時就有一個狀況跟美籍華人類似，自我認同為*fresh of the boat*（初來乍到）。

對於丁乃非而言，但若把自己「定義」為台灣／中華民國的「公民」，熟悉的語言英語會把自身從以華語為主的社會推出去；如果把自己貼在語言上比較親近的美國，身體感覺又把自己從那推出去。

「就像學生的身分也是暫時的一個transitional（過渡性）的身分」，她說。

既非此也非彼，「跨」有好幾層的意義，首先是一個國界的跨，跨也可以是你在當境外生的時候跨越自己的狀態，比如在台灣的時候你跟外界的關係相對穩定。境外生就像各種身分的外部，並非某種單一身分，反而是各種的力度同時在作用的一個點。你很難「只是」自己，因為你要成為自己必須透過跟其他人的互動來定義。

### 翻譯與越界：作為運動與知識的學徒

關於非公民的情慾，我提及了《T婆工廠》紀錄片的情慾閱讀其實複雜化我們對於非公民的「生活」想像，對於只有單一目的之再現的打開。所以我也單刀直入問了丁乃非境外生時代對情慾的理解。

弔詭地，她覺得回到台灣的時候，這個問題才比較聚焦。而我之所以問這個，是因為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的「／」，斜線本身把盛載經驗的身體與性接合起來，而這個符號是在特定歷史時刻召喚出來的。在解嚴只有數年的台灣，充滿著不同的可能性，前有野百合學運（1990年3月）的躁動與不安，而後不同的社會運動也冒出芽來。

直到九〇年代初，她回流與王蘋所組的讀書會「才歪」角度，每次散發著強烈的情慾氣息。當然現在我們可能很難想像正經八百的讀書會可以做些什麼，但是在解嚴後的台灣社會，集結本身就有種反體制的意味了，何況身體的碰觸也可能引起燎原之火。

對，我也在想為什麼，比如說後來在婦運裡面碰到的，還有才歪角度，整個是在團體裡頭，還有在運動裡，都是充滿了情慾energy的，那個時候是有空間發散的，有群體性的也有非群體性的部分，有時候也挺不明確的，挺亂的。那個能量，會化為一些現象。

這些現象，後來轉化在1991年創刊的文化運動刊物《島嶼邊緣》上「女人國·家（假）認同」專輯的妖言中那許多臉紅心跳的文字。在那個風起雲湧的社運年代，知識分子在面對國家巨變下的想要透過知識面對局勢，例如中國五四運動前後的學術思潮和九〇年代的女性主義，前者今天看起來近乎是用一種「抄襲」的方法進行知識的搬運，而後者是透過翻譯應對「國家－父權」的壓迫。兩者的共同之處，是類似在這樣一種現代性推著走的焦慮，借用既有的知識架構來解決自身的問題。然而那個「去歷史」地做運動的歷史時刻，本身也造成一些歷史效應。

關於翻譯作為一種運動策略，丁乃非坦言：

當時博士論文很大的問題就是脈絡化不足，那個時候的自己也不能夠駕馭那個脈絡化的知識。同樣的情況出現在那個時候我們讀的書以及某些即興的翻譯，我自己作為一個翻譯者與帶讀者是有一種作用的，亦即你在講的時候可以注入一種翻譯中權威位置卻又不明講的氣勢，從而帶引一些意義出來。

從何春蕤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到1997年台北公娼被取締，婦運中的情慾成分慢慢被發掘出來，後來更經歷所謂權權與性權的分化（卡維波語），在這些歷史時刻，她的問題意識找到落地生根的契機。

要是從紛繁複雜的著作拉出一條線的話，從她博班階段《金瓶梅》研究到後來的小說閱讀，主軸是思考婚姻家庭與性工作的關聯性，有時是家庭對於「性」含蓄的政治管束，有時則是從婚姻思考各種社會經濟的條件如何生產所謂「良婦」位置，同時貶抑那些「不聽話」的女性。從女性主義到反思女性主義，她也不斷深化同一個母題，吸納了冷戰知識生產等觀點，把台灣的女性主義拉到一個全球的權力佈署與國族打造的高度上看，所謂進步話語的高度排他性並非只是本土現象。而是國際的大勢所趨。

既然知識形構的政治化是在美國發生的，重返台灣意味著什麼？

丁乃非說，過去三十年她雖然都主要待在台灣，但是對台灣也有一種境外的感覺。她大可以在美國申請教職，做到退休為止，然而在美國的文化研究訓練讓她有急切回來的心，家人都很不能理解她的決定，甚至起了一些衝突。作為學生，寫不完論文似乎是永恆的劫難。她也不例外，還未寫完論文就急著要回來：「我家人他們不能理解了，然後我就開始教書了，先申請上中山大學的外語系當講師（1989年），發現無法寫完論文，所以又停了工作，後來才申請上中央的英美文學系的。所以那個時候的確是對台灣有歸屬感，有一些朋友也回來了，就有一個莫名的共同感。」

在她年輕的時候，當擔任外交官的父輩說回家就是回台灣，背後卻是龐大的沉默。那個「家」本身的替代性質，是她至今仍然時常在思考的問題。兩岸問題漸漸進入視野，使得「回」的確切意義也被鬆動了。在研究所之前的她，其實沒有一個很強烈的「回」的概念，不太有最終目的地，就像一個不斷跨越的過程，「去」不同的地方。而「去」就沒有一種回歸的感覺，然後在研究所之後，有一個最後的地方，可能就是台灣。

## 境外生在亞際 (Inter-Asia) 如何可能？

時日過去，丁乃非除了作為一個知識的學徒，身為亞際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方向）的學程主任，更在教學現場遇到更多的境外生。

亞際文化研究是一個極具衝擊性的學術建制。抵抗「亞洲生產經驗，歐美理論化經驗」的固有格局，正如創始者陳光興教授所提倡的亞際互相參照，把亞洲不同地方的殖民經驗平行互動，歷史化的理解，達到促進連結之效。同時它跟境外生的生命密不可分，境外生分享著不同的異地經驗，來到台灣求學，亦可激活這片土地對亞洲其他地方的認識。簡言之，在亞際學程，境外生是作為知識社群的主體，而不是作為被動的接受者。當然，理想與現實總是存在著落差的，過半學生都是境外生的亞際，他們又遇到什麼實際的困難？當亞際這個強調開放性的理念被體制化為一個碩士學位會產生什麼問題？

丁乃非也同意：

*亞際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源去讓學生有空間去實踐，誘發以自己的方式去發問為主。亞際真的是在一個夾縫的空間。而在教學上客觀的效果是用台灣這邊政治經濟脈絡生成的問題，把婦運同運變成某種迫切了解的知識。去框那邊東南亞、南亞的地方。*

就我自己而言，本身作為境外生就感覺到一個知識的空間與時間差，意思是說知識的座標隨著遷移行為（求學）而重組，就實際行為而言便是我們暫時離開了原居地的脈絡，投入新的處境，然後時間差就是同一個社會思潮（比如，女性主義、同志運動）又會隨著地方改變而在進程上改變，這必須是一個重新適應的過程。不同的境外生來到台灣都要習慣這邊的文化風俗與人情世故，而亞際更進一步，要改造現有知識結構的傾斜之處。這種境外生處境同樣會呈現在一個思考後殖民為主的課，雖然我們讀的東西是解構某一個特定的歷史的敘事，但是學理論本身又有機會產生新的階序，把自身的問題擱置。

她沉默了一下：

*你完全說到了我覺得很反諷的一個東西，我們竟然有很弔詭的一個條件去生產一個框架，然後這個框架可以跟歐美知識體系銜接，但然後又是另外一個弔詭，我們這邊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源去讓學生有空間去實踐，也就是希望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去發問為主。*

這讓她想起自己在美國的經驗：在比較文學或文化研究有空間提出後殖民如何可能的問題，而不是在美國主流範式被問的問題，然後這個提出的問題如何用一種不是給定的問題來回答。當然亞際也被期待為一個發問的位置與空間，然而目前卻有點往一個困難的方向走，比如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台灣社會－政治－經濟的位階都被認為優於東南亞的國家，而台灣

這邊近年又有新南向的政策。因此亞際的學生對於學程的期待不一定能跟師長重新為知識劃界的想像相疊合，所以來此就學很可能帶著功利的目的（例如回到本國當講師，跟亞洲學生去美國讀書的邏輯是接近的），而這些目的之所以能夠成立又是因為現實的國際局勢限定的，說明亞際無法自外於這一切。

另外亞際的特點，正是充滿自由度的選課設計，除了導論以外沒有什麼是必修的，同時也意味著一切知識都漫無疆界。這樣的挑戰性非常大，學生來自不同背景，在進來之前很容易以為亞際只是某一類的亞洲研究（例如冷戰美國當初為了調控亞太國防安全而設立的區域研究），唸性別研究的也會以為是跟台灣其他支持主流同運連連的性別研究所一樣追求政策介入，或是兩性平等。因此要摸索自己的路向，殊不容易，所以不知如何入手，我笑說很多時候學生都無法如期畢業。

雖說學程本身要解構權威，但現實報告跟寫論文還是有所謂客觀的評分標準，老師說的話本身又鞏固了某種權威。哪些東西需要知道，很容易就變成不言自明的東西，但是在課內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展開討論，譬如說為什麼理解性別研究需要貼近邊緣的位置，哪一些是在台灣脈絡的「邊緣」，這些理論與運動的辯證又能怎麼去把握呢。

她笑道我覺得這些區域的人都是半超人的狀態，他們什麼都得懂。」

她的意思也許是，選擇要讀什麼，與一個人的意識到的問題，其實是互為表裡的。所謂學習不僅是知道多少個理論，而是知道為什麼理論對應或不能對應到問題。「了解」必然是多層次的。對於一個人而言，國家或城市，那也許只是他住的一個地方，一個人不一定對在地的問題有所了解。

我忍不住講出自己的看法：「就像我們讀法農，但不能不先了解精神分析。我們不能不了解他們從而了解我們在地的東西，所以困境很大，又不能排除他們。我們不能直接批那個西方，『他們』滲透在『我們』的裡面。」

丁乃非說：「這個世界從來都在變化，西方不只是西方，亞洲也不只是亞洲。在跨文化的頻繁交流之下，要進行學術工作，我們就需要像你說的在知識的境外／境內來來回回。」



# (五)

專輯策畫 Lala

## 運動

## 創傷

策畫語

境外生返台抗爭雖然目前已經暫時完結，然而，有些感受和看法的改變，並不會隨著運動的結束而消失。在運動路上，提出異議的聲音註定會遇到反對。或反過來說，沒有反對聲音的話，其實也不需要搞什麼運動了。但是，在面對一些反對的聲音時——特別是當這些反對的聲音以輾壓的氣勢和抗拒溝通的姿態撲面而至時——經歷過的人或多或少會遭遇運動創傷……而這個感覺以及感覺所衍生的經驗將會繼續伴隨他們。

《兩種「被黑者」的對話：創傷、謾罵與社會分析》是香港僑生Lala和陸生Sally之間的對談，Sally於1月28日因製作懶人包，以解釋陸生集中檢測管理及國族針對的問題而被網路攻擊，個人臉書被七千多條留言灌爆，Lala則是因為在8月6日於臉書發長文批評台灣以疫情為藉口而剝奪非公民學生受教權而被網路攻擊和割席，當中主要來自台港網民、台港時事評論員和其他香港僑生團體。面對這些經歷，兩人各自走了怎樣的路？

文章分四個部分。第一，是什麼樣的時機會讓她們衝出來發文，發文的時候有什麼考量。第二，她們是怎麼面對發酵出來的仇恨？第三，這個和她們的個人歷史有什麼關係？為何她們會成為眾人仇恨的目標？分析中又可以怎樣揭露台灣、香港、大陸的一些情感結構？第四，她們希望以後可以再做點什麼？

情緒雖然是以個人的軀殼去承受，但它背後是受著社會的力度所模塑——個人化的感受因此是具備公共性的。這篇文章是希望可以展示在「被黑」這件事上，在抗拒只是成為受害者的姿態以後，人們可以怎麼藉著與創傷的相遇，開啟對台灣、香港和大陸社會及個人經驗的剖析。創傷不一定只是需要被「治癒」的感受，也是發問的位置、未來的動力和相遇的契機。

# 兩種被黑者的對話： 創傷、謾罵與社會分析

日期 | 2020年11月1日

主持 | Karol

與談人 | Lala, Sally

## 走上被黑的路

### 時機

Lala | 為什麼我會想要和Sally對談呢？那是因為大家看到我和Sally都曾經被網民瘋狂轉發、抹黑、造謠，我自己之前也知道Sally因為製作懶人包也遇到類似的狀況。不如先說說看Sally是怎樣開始想到做懶人包的？

Sally | 1月26日台灣政府說要暫緩陸生回台，我本來以為這個事情和我沒有任何關係。因為我當時卡在浙江辦簽證，準備去新加坡交換，沒有打算回台，在台灣也沒留有任何東西。甚至，在個人生涯規畫上，我都沒有打算在台灣繼續升讀研究所。

雖然這件事與我的個人利益並無太大關聯，但我還是做了那個懶人包。當時初衷很簡單，就是覺得陸生不出來說點話，很可能自己應有的受教育的權利都會失去。製作的啟發是因為當時認識的一個在浙大唸書的台生提醒了我。他說他知道了在台陸生的狀況，覺得我們蠻可憐的，但目前看到的相關文章字數過多，這樣下去大部分民眾可能並沒有耐心看完，並且進一步關注陸生的狀況。他問我：「你們有沒有更加直接的東西？」所以我就想到我可以做一個懶人包，解釋一下事情。我是和孫宇凡在1月28日同一天發的文章。和孫宇凡控訴台灣政府的文章一樣，我的懶人包是發在個人的臉書頁面上。然後懶人包的留言區一日內就被灌爆了。

1月28日發懶人包時的心情是，覺得我們還是能回來開學的。當時我主要很不滿台灣對陸生的防疫工作：不論有沒有大陸旅遊史，只要是陸生，都要被統一集中監測管理，這是很離譜的，而我當時的判斷是台灣人並不了解公告中不科學的部分。公告當中最難讓人理解一條是，要求兩個陸生在一間房間隔離，中間用屏風隔開，這是非常明顯的防疫漏洞，是對陸生健康不負責的體現。我當時是在浙江，浙江是中國大陸防疫做得最好的幾個省之一。當時從外國回浙江的留學生的防疫工作就做得很嚴謹。譬如，他們是採取兩週旅館檢疫、一週居家檢疫，在旅館期間也會做幾次的核酸檢測、會發健康碼，而對內防疫也做得不錯，譬如限制醫護人員出市旅遊。這樣比較下來，台灣當時對陸生提出的集中監測方案就更顯得漏洞百出。而且政策只是針對陸生的戶籍所在地，不去針對旅

遊史、接觸史，只是針對陸生的身分，也讓我覺得有非常明顯的政治針對。

所以主要是兩點。一是覺得台灣的集中監測管理在防疫上很離譜，二是覺得對陸生有政治針對。不過當時對政治針對的部分還沒有感覺那麼明顯，到了2月港澳僑生都只是因為籍貫而被禁止入境以後，才更覺得是政治針對。

Lala | 我想我和你在衝出來說話的時候相似的地方是，都是因為有那麼一點希望在，是在絕望中的一點希望讓我爆發的。我在寫那篇被人攻擊的文章的時候，是因為8月出現了「髮夾彎」事件，而且在台灣最多人數的境外生中只剩下陸生無法返台。台灣政府曝露了，自己開了底牌說不讓陸生回來是有政治考量。之前在做境外生返台運動的時候，我其實心裡都覺得是有政治考量多於防疫考量，但當時台灣人都不願意承認。所以當政府自己說漏了嘴，我覺得就好像是一個契機，想要抓住這句話讓大家看到台灣政府多麼打臉。我是希望台灣人可以看清楚政府到底是怎樣用疫情作藉口對陸生進行政治針對。而陸生是夾在兩岸之間的棋子，遭受到非公民的待遇、受教權和生活權被兩岸角力所犧牲，也是兩面一同共構的，我以為這個時機是可以有效地揭露這個共構的結構。

### 考量

Sally | 我做的懶人包的文字其實都不是我寫的，是引用了讀台大人類學的許崇銘的文章中的一些內容。

Lala | 許崇銘也說，當時寫那個文章，是因為眼靠自己很多陸生同學無法回台，覺得政策有點問題。

Sally | 我覺得他的文章寫得很好，情感表達很私人，同時我看到有陸生和台生轉發他的貼文，有台灣朋友轉發他的貼文後，也提及了自己的一些感想，覺得防疫政策確實有問題，陸生的隔離待遇有不當之處。那就說明他的思考角度、方式以及措辭，會和我自己寫的相比更加能讓台灣人理解。會想到用他的文章來做懶人包而不是自己寫內容，是因為我知道台灣人不太能接受大陸人的表述，儘管表述是溫和的，但他們可以接受台灣人說基進的話，所以我就直接用他的文章做成懶人包。

這也是因為我本身認識一些關注社會議題的陸生朋友。他們讓我知道，帶著陸生的身分和台灣人溝通時，是需要一些方式的，而有一些方法是不合適的。譬如孫宇凡的那個方法是不適合和大多數台灣人交流的，台灣人會覺得太基進。

2月，陸生建了微信群，我就進群了，順便幫新冠肺炎在台陸生關注組做一些時間軸的圖，因為那裡沒有人會製圖。這也是因為我覺得製圖很重要，就像懶人包一樣，可以給予讀者很直觀的感覺。然後我也加入

了媒體組，主要是幫忙接一些採訪。

接採訪的時候我也很小心，因為我知道很多台灣媒體在撰稿時為了博取眼球，寫新聞稿時會極具政治目的性，因此可能會曲解我的表達，所以我非常慎選媒體。我知道孫宇凡拒絕了所有媒體採訪，我則是有篩選地接受媒體採訪。我覺得有媒體的幫助還是很重要的，他們會幫忙把議題放大一點。但台灣的媒體因為政治立場，未必能完全呈現我的話；大陸的媒體不會關注，他們覺得陸生只是很小的一群人。我最後決定只是接《紐約時報》中文網和《聯合報》的訪問，覺得他們會公正一點。我和《紐約時報》是2月8日做的採訪，但是他到3月30日才發稿，雖然並沒有完全確認過，但我感覺是因為記者判斷有些事情是需要等風頭過了，社會冷靜一點，才可以說出來。

Lala | 這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媒體工作者才會做的判斷，就是除了蹭新聞熱點以外，也會思考媒體介入議題時的時機和效應。

Karol | 《聯合報》專門跑教育類新聞的記者是我們比較信任的媒體工作者。余澤霖是第一批來台的陸生之一，也曾是爭取陸生納入台灣健保等政策的積極參與者。在境外生返台這件事情中，他有幫忙去找媒體和幫受訪者商量怎麼篩選媒體。

Lala | 我當時想要做的，就是用自己香港人的身分撬動一些力量，但和Sally不一樣的是，我比較衝動一點。而我當時的判斷的是：自己的香港人身分是可以成為不被曲解的一些anchor，這當然有點計算失當，雖然也有些人覺得我計算周全。但我當時認為有些台灣人是真心相信台港共同體，那他們就要看到那應該是兩地人民互挺，而不是香港人民與民進黨的勾結，然後犧牲掉譬如非公民的福祉。我對非公民的強調，也是來自於我對香港運動的理解。文章裡面，我引用了許多香港警察對香港示威者的壓迫手段，很多是以前用來對待非公民的。所以在我的眼中，「香港人」這個開放的概念是包括「非公民」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很努力召喚大家對CIC、新屋嶺等機構的存在反省。畢竟，政府是首先先學會對非公民冷酷無情，才學會對異議者冷酷無情，那弱弱之間無論是情義還是理念——因為大家都面對一樣的壓迫——還是要相挺嘛。所以我是希望台灣如果想要從香港的經驗學到什麼的話，就是要學會非公民所遭受的不公平有一天是會被政府複製到公民身上。就像昨天是對非法入境者、今天對香港示威者；就像台灣今天對陸生，明天或者就是對異議者？這其實也是很有別於台灣人對香港運動的分析，他們認為香港的示威者之所以被暴力鎮壓，是因為中國的介入，陸生、中國人等就是中共同路人。非公民所遭遇的不公與香港警察暴力的養成之間的關係，他們是看不到的。所以你說我是策略也好、理念也好、經驗也好，

我拉進我香港人的身分去敘述這個事件，是有考慮過的。

## 仇恨發酵——如何面對？

Sally | 我本來想要做這個懶人包，是為了促進台灣對陸生以至於大陸的理解，所以一開始懶人包的留言到達四、五千的時候，我是覺得ok的，雖然當時有許多朋友就建議我關掉臉書。但後來，我的懶人包被搬到「台灣傻事」的微博上。我是那時候才考慮要關掉留言和臉書的。

Karol | 這種微博是很明顯的「營銷號」，那種看起來貌似是一個人坐在家裡經營的帳號，實際上他有團隊在專業地經營，又以吸取流量為目的。這個營銷號的經營方式就是去煽動大陸人對台灣的仇恨情緒，而情緒越大、流量就越大，他們就越能建立起粉絲團。然後他們就可以開始帶風向，就會有收入了。而這個帳號就是會放很多台灣荒謬的事情上去，一個人對台灣社會的了解如果都只是從「台灣傻事」得來的話，就只會有「天啊，台灣真的很傻很荒謬」的厭惡感。

Sally | 當時那個微博下面大家開始攻擊我，譬如責怪陸生為什麼去台灣唸書，覺得我自作自受，覺得我做了很傻的選擇。被搬到「台灣傻事」對陸生來說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兩千三百萬人口和上億人口的網路攻擊並不是同個量級的，如果被肉搜的話，以後可能還會影響在大陸的生活。而且這種微博帶來的人流是不能促進溝通的。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已經很緊張、很複雜了，我想做的一直都是去讓兩岸關係和平一點的。但那些營銷號這樣做只是加重對立而已，把我的臉書貼文搬過去，以他們的框架去審視，就已經不是我本來要表達的意思了。

Karol | 明白，妳做懶人包本來是想要讓兩岸彼此有理解的機會，但他們這樣做，其實就是要藉著懶人包去加重對立。

Sally | 被搬到「台灣傻事」後，我的臉書就多了一批大陸人特別跑過來和台灣人吵架，我的留言區就變成了兩岸對立的戰場，我是因此才關掉留言。又因為關了留言，大家就開始到私訊罵我，所以我就關掉臉書了。

那段時間很多人都問我是否ok，大家都很怕我不ok，但其實我是很ok的。同時，台灣的朋友也打電話跟我說：「那些haters不懂你。」我身邊的朋友都是很穩健保守派的一批人。他們一般來說其實是最容易相信網路言論的人，但在這個事情上，他們沒有來罵我，而是會來關心我。所以我當時的感覺反而是發現自己來台灣這四年，至少改變了身邊的人，讓他們可以聽得進去跟主流輿論不同的聲音。所以我沒有因

為這個事情而不開心。

反而，我受到的傷害是來源於後來陸生那邊的無端指責。當時的狀況是，雖然我一方面覺得浙江的防疫做得比台灣要好，但我也轉發過大陸政府隱瞞疫情的問題，譬如某些醫護人員不接受媒體採訪的狀況。有認識的陸生就來私訊我，覺得我「把家醜外揚」、是「自以為是的救世主」。她跟我是有吃過飯聊過天的，見面也會相互打招呼，屬於關係還可以的有私交的同校同學，她其實是可以過來跟我溫和地溝通，我溝通能力也是很強的人，她大可以來問我為什麼發這個東西。但她沒有，就直接衝過來指責我，為此我會覺得難過和生氣。一來是覺得我做的東西是對的，二來是這種人的態度就是沒有想要來跟你當朋友。所以，後來我就直接把她刪掉了。不過話說回頭，不知道為什麼，我同校同屆有一部分陸生會在背後討論，說覺得我是台獨分子，我感受到的不信任，其實有些時候都是來自大陸方的。

Karol | 他們覺得妳是台獨分子，可能只因為你的朋友圈是很多樣的，譬如你有很多的台灣朋友。他們覺得你的台灣朋友裡面有一些是台獨的，所以覺得你也是台獨的。

Sally | 是的，但他們可能一般就只是待在陸生的舒適圈裡面。但我覺得我可以跟不同種類的人溝通交流，也許可以說是交朋友，但不代表我就是會變成和他們一樣，或者說我就和他們是徹底的一種人了。我是那種連坐個計程車，如果聊得開心的話，都可以和司機加微信的人。

Karol | 剛才提到的一些陸生的那種想法很奇怪，當朋友不一定要認同彼此的所有觀點或成為同一個人吧。就好像我認識了Sally，Sally很辣，這也沒有讓我變成一個辣妹。

Lala | 所以其實這件事以來，你的心理是很健康的。

Sally | 如果說好像懶人包事件那樣，來罵我的大多都是不認識我的台灣人，而且還是不認識的台灣人，對此我沒感覺。

這也跟我的一些個人經歷有關，我是一個很有自我療癒意識的人。小時候，我本來成績很優秀，得到老師的喜愛，養成了一些公主病的個性，所以同學不喜歡我。然後回家後爸爸會家暴我媽媽，我對自我和家庭的認知就很錯亂，所以很小就想要自殺。老師知道我想要自殺後，就覺得我有心理疾病，就不喜歡我了，覺得我是個怪小孩。到了中學以後，我的成績就是一落千丈，因為一些心理原因，我的注意力就是比較容易分散，成績怎麼樣都上不去。所以，可以說我是在童年的時期，就把一些人生的高潮和低潮經歷過一遍。因此，我很早就進入了自我療癒的過程，這讓我現在做很多事情時的心態都是穩健的。當然，我仍然有崩潰的時候，就是我覺得無法達到人生目標

的時候，譬如考試考不出來。

另外，我剛來台灣的時候，已經經歷過一波歧視了。當時我有被一個台灣同學拉幫結派的排擠，而我都不理解為什麼大家不跟我玩，覺得很痛苦。因為學校的關係，我的台灣同學大都是一些中低階層家庭的小孩，整個成長氛圍比較保守，他們一開始會因為我是大陸人而不敢跟我說話。但隨著時間過去，大家就是會慢慢理解我，看到我有意思的地方，慢慢都開始跟我做朋友。這些事都讓我覺得溝通是有希望的。當然我也是因為一開始被排斥，反而不局限於只是認識學校裡的人，有機會認識很多不一樣的在台灣生活的人。

可能也因此，當我經歷懶人包事件被人黑的時候，沒有什麼不好的感受，反而得到很多同學的理解。對於罵我的內容，我只是覺得很好笑——這些人不認識我，他們攻擊的「我」，只是一個他們心裡投射的符號、形象，而這些我都以前都已經經歷過了。

在這個符號裡面，這些台灣人只是把大陸政府等同於大陸人民。好像看到我，覺得我是陸生，就是代表大陸政府來迫害他們一樣。這個想法其實和他們討厭的謾罵的大陸小粉紅的想法是一樣的，就是看到所有香港人都覺得是要搞港獨，對香港的理解也是先貼上港獨的負面標籤再說，這不是真正的聆聽和理解。

Lala | 我的心理狀況比你糟糕很多。我當時是無法很穩健地hold住自己。一開始，文章發出來以後就是幾千個回應、兩千多的分享，我也是被搬到不同的營銷號所以引來很多haters，但我在那個時候都是ok的。因為如你所說，他們不認識我，我不用因此覺得難受。但後來，我的同溫層是有破掉的：來自香港和台灣朋友的沉默、來自自稱香港人的人的批評、香港學生在台關注小組公開割席、「假香港人」的標籤等。後來事情一直發酵，導致我寫的其他無關此事的女性主義文章也被認為是「中國人」寫的而被攻擊，覺得我寫這些都是別有用心。我從那個事情以後幾乎就不敢再去很多以前熟悉的地方了，這個創傷到現在都沒有完全好起來。

Sally | 想抱抱你。

## 分析創傷、分析攻擊、分析社會

Lala | 我先分享自己的創傷是怎麼組成的，我自己分析有至少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不被當作是香港人；第二部分是同溫層破滅；第三部分是造謠以及後續的攻擊；第四個部分是對所謂台港共同體的徹底失望。我先說一下自己的背景。我是香港出生、長大，母親是本地出生的香港人，但父親是從北京到香港的移民，所以從小其實是有一些作為新移民第二代的羞恥

感。對大陸的感覺是一方面不認同大陸政府的許多所作所為，但對於我爸爸以至於延伸到對在大陸生活過或生活中的人民會有一種天然的同理心，而帶著這個眼睛，其實從小到大會看到香港對大陸一直都有很多不理解。但這些歧視後來也是會內化的。譬如父親的廣東話被取笑，他會沒有自信，這些歧視是我吃進去的，變成羞恥感——我會很羞恥我的普通話或國語說得好，會很害怕讓人知道我爸爸講廣東話講不好，會很不敢告訴同學我家裡春節是會看中央廣播電台的春節聯歡晚會等。但因為我在英文中學讀書，然後又生活在一個很洋氣的社區，所以好多時候都可以避開會被歧視的時刻。我是到了大學因為開始反思到底自己是想要菁英化還是去挑戰一個菁英化的制度，才開始正視自己必須要對自己誠實一點，也是不要成為壓迫其他人的菁英。然後我才慢慢攢足底氣不羞恥、不害怕，不去想著如何「脫亞入歐」或「脫中入港」，並且開始相信，或許我這種混雜的模樣和家庭歷史，恰恰才是許多香港人共同的寫照。當然，也是因為大學後受到很多知識和運動的養成。

但是那篇文章寫完以後，我第一個難受的點是被香港學生在台關注小組說不認為我可以代表香港人。很多從小到大累積的不安感就浮上來了。我不得不說本土派的政治，特別是那種要和中國的一切一刀兩斷的政治，對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是很具備吸引力的——特別是這種政治中漫溢著的一種排外的文化的部分——因為好像只要我站對邊了，就不用再被懷疑自己的身世，也不用再感到羞恥，我也可以像皮諾丘(Pinocchio)那樣，從小木偶變成小男生了。所以某程度上，我可能也想要成為他們的模樣，輕易地和自己的某些對陸生同情的想法切割，但我做不到，也會很痛恨他們為什麼不可以聽聽我說的話。特別是香港經歷了2019年以後，其實是整個城市都在集體創傷，我們這個時候更加需要互相訴苦，互相團結，互相說服和磨合。但是，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有空間去聽——特別是我對香港政府如何首先劣待非公民，以至於學會了以對待非公民的手法對待持有異議聲音的人的這個分析——我覺得他們這種香港人都覺得自己最慘，所以別人的慘就不用聽了。但明明，我是覺得「非公民」是「香港」的一部分，這不該被看作是「別人的慘」啊。而且，重要的不是誰是香港人吧？更是香港人該怎麼對待別人。

然後這也是我對台灣的愛的方式。我把生活在台灣社會中的非公民——陸生、港生、澳生、馬來西亞生、移工、外配、陸配等，都看作是在台灣居住的人。我希望台灣好，希望台灣政府不要像香港政府一樣一直當一個仇恨和酷刑製造機。但是當我提出這些的時候，大家首先是否定我對香港和台灣的愛，先被誅心論審判、被認為不是香港人。這種感覺，非常接近失戀。

另一個創傷的核心就是同溫層破滅吧，我當時其實是很希望身邊一些小夥伴們不要只是流於在背後拍拍我，摸摸頭那樣。我是想要大家加入我的戰鬥，因

為我以為這也是我的一些朋友會關注和留意的事情。但其實這些並沒有發生，我就突然覺得平常那些革命情誼是不是其實都是喝酒的激情而已。我從十八歲開始搞社會運動，是對改革社會很有熱誠的人。我身邊的親密朋友，很多時候我也相信他們有這個熱誠的。但是當一轉頭發現好像自己一個衝出去，大家只是在旁邊拍拍我而已的時候，我覺得有落單的感覺。我當時希望的是身邊的朋友至少可以轉發文章、說兩句公道話、幫忙澄清一些抹黑，或者來了解事件跟我認真討論他們的同意或不同意。但我得到的其實只有摸頭和不作聲兩種，這是讓我覺得很孤單的。至於那些我以為是同路人但在這個關鍵時刻站到對立面的人，其實我反而沒有什麼難受，他們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囉。

造謠的部分，則是很多人會說我寫這篇文章是私心為女友、說我是大陸人、說我是新移民、說我沒有參與在2019年的運動當中、說我是藍絲。這些之所以讓我憤怒，是因為這些純粹是無中生有的說法，也否認了多年來在運動的努力，我都不知道這些人為何可以如此不知廉恥地造謠。而這其實後續還讓我有好長一段時間有什麼公共評論都被直接否定。甚至有一些人在公眾場合見到我，就覺得我是個很恐怖的「瘋女人」，然後事後了解後才來說什麼「想不到你原來那麼的友善」。我很難過，你們到底把我當什麼了？我感覺到溝通的困難、說話被曲解。別人恐懼起來，你的溫柔就是偽善，你的理性就是冰冷，你的憤怒就是瘋癲，我發現我是一隻沒有家、沒有歸屬、沒有人願意接近的妖怪。

對於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輿論反彈，我自己是認為這次觸碰到的議題，即非公民的權益、境外生的權益，本來就是邊緣的議題，當這些人的權益和台灣國民引以為榮的醫療系統及健保系統出現矛盾的時候，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地雷。而蔡英文當選的時候，其實是大量製造「亡國感」去為自己拉票，兩岸關係在現在經常會被認為是快要開戰的敵我關係。因此，為作為「敵人」的「陸生」說話，其實就是與台灣為敵。這裡是第二個地雷。第三個地雷是我破壞了蔡英文對「香港台灣共同體」的想像。這個共同體是蔡英文為了警惕台灣民眾不要接受一國兩制的時候說塑造的，就是所謂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及「台灣人支持香港人的抗爭」。本來這個塑造是單方面的，但香港人在反修例抗爭時為了得到台灣這個「國際戰線」的支援，就也很樂意為這樣的說法買單，乖乖為蔡英文造勢，這個共同體就變成一個兩面都同意的說法。然而，當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在為「敵國人」陸生說話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拆這個「台港共同體」的台——因為我破壞了「模範」香港人的形象。兩面自然都會憎恨我。這個事情我在發聲之前就早預料到，就是自己的發言必定會把自己弄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簡單來說我就是一次踩到了香港、台灣兩個地方的痛點，總共三個地雷。

但當時我還是要說出來，因為我對於「台港共同

體」有不一樣的想像。我希望香港人不要為了贏而放棄骨氣，任由自己成為蔡英文政府劇本裡的棋子，因為這樣對台灣的民眾和非公民也很不負責任。我在台灣生活影響很深的一幕，是蔡英文搞《勞基法》修惡的那段時光，當時讓我覺得民間的青年要重新動起來了，要再向左轉了，並且更加意識到藍綠兩黨專政其實對勞工來說都很爛。但我2019年去了一下香港，2020年回來就發現什麼都變了，蔡英文再次坐穩，好像沒有人記得過任何民進黨做過的爛政策那樣。我是很希望可以重新召喚香港與台灣社會運動的民間連結，譬如當年的樂生、士林王家等，大家仗義相挺並且把消息傳回香港，然後香港運動圈都在討論的那些運動；而不是像現在，所謂的台港連結結果是香港人支持台灣政府——這說到底依然是一個慕強的心態，沒有相信民間的力量，沒有相信民間本來可以借力打力，一次批判兩個有問題的政府或三個有問題的政府。

大陸政府其實也是對留台的陸生很不友善的，你看陸生政策過不了十年就被中斷了就知道，這些陸生其實是某程度上被大陸政府拋棄和懷疑的對象，也是民間社會運動可以拉攏的對象。但你越防備他們，越不相信他們可以對話和改變，其實就越讓他們受傷並且和台灣敵對。我是真的想要自己境外生的位置可以促進中港台民間的交流——但這不是國民黨說的那種為著商貿目的而要做的交流，我是希望人民不要互相敵對、有跨越兩岸三地的家庭和友情不要因此而搞得內部撕裂——這時候我總是會想起我對家庭的羞恥感，我都希望未來的人們不需要活在這些羞恥和撕裂中。而其實官方的互相敵對還是互相友好，對我來說雖然很重要但也不是重點，反正政府友好還是撕裂到最後都是為了自身代表的有錢人的利益著想。我覺得只要不要撕裂民間，不要把人民當成是棋子來擺弄就最好了。所以，我是真的覺得香港學生在這件事情上重複著蔡英文的劇本，很沒有骨氣，也覺得他們對不起那些為了香港可以有更多政治主體性而犧牲的運動者。看到台港共同體的虛假，是我第四個創傷。

Karol | 那Sally是怎麼理解自己為什麼會被攻擊？我理解你的攻擊是兩方面的，第一是來自大陸的「台灣傻事」，第二是來自台灣。其實這不是第一次有陸生在台灣的發言被搬到「台灣傻事」了。之前有個陸生被台灣同學以很歧視的方式罵，這個陸生和群組裡的朋友吐槽，結果有人把他的吐槽投稿到「台灣傻事」裡面去了。但其實這個同學並不要看到這樣的結果，他還私訊給「台灣傻事」希望把貼文撤下來。因為這種貼文一般在微博造成的效果都會很壞，而且當事人還可能會被肉搜。其實陸生有時候就算受到委屈，也不一定是想要用鄉民網路暴力的方式來折磨對方，而是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解決。

Sally | 我個人的感受是，其實大部分陸生就算在台

灣遇到問題，都是不想被搬到「台灣傻事」變成助燃兩岸的敵對情緒。有一陣子我會感覺陸生群體不但在台灣不被合理化，其實在大陸也是不被合理化的一群人。近幾年來，隨著兩岸關係逐步劍拔弩張，我會遇到很多陸生跟我說，他們擔心因為在台灣讀書而在返回大陸工作時受到影響。很多陸生回到大陸只是會把自己在台灣的經驗給卑微地藏起來。因為有一些大陸的工作崗位也是不太歡迎陸生的，有些大陸人會覺得我們不該去台灣，如果在台灣遇到什麼委屈都是活該。但關於這點，其實我自己在回大陸實習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明顯的感受。我想這可能也和個人的專業、工作甚至表達和個性有一定的關係。

Karol | 這也是我在面對大陸政府斷絕陸生赴台上學時的感受。明明疫情下陸生無法返台已經很慘了，還要暫停未來的陸生政策，就是對陸生在台的處境雪上加霜。而且這個政策還說得好像是「為陸生好」那樣，但很明顯就只是兩岸關係緊張，大陸要緊縮關係時的一個說法而已，根本沒有聽到陸生不同的聲音。但當時政策出台，其實微博上都是支持政府的居多，陸生的聲音是消失的，記得只有《南風窗》敢去呈現陸生的看法。

Sally | 至於台灣人為什麼攻擊我，我覺得這和台灣對大陸最近十年的一種新的反感有關。大陸人覺得港台人只是因為嫉妒大陸經濟發展把自己比下去，又恐懼被大陸的資金牽制，所以經濟和政治上就是親歐美的。我不認為這個說法很全面，它的邏輯被大部分大陸人接受，而且也是具有可取之處的，就是台灣對大陸的憎恨某程度上，可能是因為台灣無法在大陸發展的過程中賺到錢，台資目前在整個東亞市場其實是被壓制的狀態。譬如，蝦皮在東南亞就無法贏過淘寶，因為淘寶的資金流很大，但我也還是會看到蝦皮在大陸的招聘廣告。

台灣人一方面感到經濟上受到大陸的威脅，另一方面又缺乏渠道了解和理解大陸。而很多台灣媒體的一些報導，其實本質和「台灣傻事」沒什麼區別，只是在利用資訊差，在加重刻板印象，抹煞溝通的可能。我接觸到一個台灣的姐姐，她是那種愛台灣愛到非常深沉，希望台灣能實現獨立的人。她之前有去過大陸工作的經驗，我感受到她其實在大陸的一些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很多委屈。同時也深深感受到台灣前十年和最近十年生活水平的下降。她的生活，以及可以獲得的發展機會也不如以前。這個姊姊其實是很善良的一個人，她對我也很照顧，但她討論和分享對大陸政府和一些大陸人的批判的時候，會讓我覺得害怕。

我覺得真正的「理中客」不應當具有那麼強烈的攻擊性，對於異議的聲音，並不應該是一味的攻擊和謾罵，而是應該尋找求同存異的可能。感覺很多台灣鄉民的邏輯就是，他們會覺得自己沒有任何問題，問題都在別人那裡，會覺得大陸崛起的時候自己賺不

到錢，也不是自己和台灣政府的問題，而是大陸的問題。而明明在某個程度上，就是想要尋求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可是又因為缺乏關於大陸的更多更全面的資訊，導致又不願意合作、又比不上，最後只能找別的東西比較。譬如要和大陸攀比自由民主和人民素質，所以對於大陸的一切都說成不是極權就是髒亂差，看不到大陸的內部差異性和彈性。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計畫並不準備回大陸工作和生活的，因為我個人的一些原生家庭的經歷，我希望未來能「逃得遠遠的，越遠越好」。但我後來發現其實我的人生經歷還是太有限了。我在大學之前所經歷的都是一個封閉的學校體制，剩下的就是互聯網了，但那種接觸都是間接的。我是在今年回杭州實習的時候，才去重新理解中國大陸的社會。我現在並不排斥返回浙江工作，反而覺得那裡有特別多的機會。我是希望有一些台灣朋友在考慮進行職涯規畫的時候，也不要全去全然否決掉大陸這個選項。年輕人的職涯規畫，不應當是局限的，其實只要你願意走出去的話，世界都會是你發展的平台。

我相信很多台灣人如果真的有在大陸讀大學並且工作和生活，他就會了解到，大陸確實是有它的機會和魅力所在的，並且他們以為的一些問題，很有可能都是社會在變動過程中能去克服和適應的。

Lala | 但我覺得如果他們就是不想要抓住這些商業的機會呢？我認為和台灣溝通，有一些台灣人對大陸的憎恨或許真的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下的競爭帶來的攀比，還有大陸經濟發展下台灣人的生活沒有因此被提高等。但還有一層是，不是所有台灣人都想要那一種經濟發展，或者可以被經濟發展所收編的。我舉香港的例子好了，香港人或許如果願意北上尋求商機，或許真的可以和大陸共榮，這也是大陸對香港的政治和經濟設定：只要你乖乖跟著爸爸走，好好做區域融合、好好搞大灣區、好好做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還可以馬照跑、舞照跳的。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想要這樣的生活，譬如有很多年輕人只是想要在本土創業也好、種田也好，他們根本不想要那一種被設計好的路徑——哪怕「大灣區」路徑可以讓他們賺錢。但這些空間在香港是被瘋狂壓縮的，樓租不起、房買不起，創業難因為租金貴、另類生活也沒有其他空間。我覺得台灣年輕人也是這樣的，他們未必真的想要錢，你說經濟發展他們並沒有因此心動，但他們想要的生活空間和生活模式，大陸能給嗎？我覺得大陸政府根本不理解香港民眾的心態，就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以至於社會發展指手畫腳，不能都怪香港人越來越討厭大陸政府。當然我也同意的是，當香港人說什麼大陸政府都聽不到，也不知道可見的渠道在哪裡的時候，民怨就會激發，變成人民之間的互毆。

我當然是不樂見這種互相敵對的狀態，就是「中港富人一齊數錢，兩地窮人頻頻對罵」，但說真的，憋成這樣，能怎麼辦？我對這個現象的解藥就是中港窮人要一起瓜分富人的財富，以及讓發展的方向重新以人

的生活為本。可以有計畫經濟，但計畫經濟不代表被粗暴地設計。我覺得我和你最大的差異就是，你認為只要讓台灣的窮人也可以跟上大陸發展的列車，就不會頻頻對罵了。但一來我覺得資本主義下，有富人必定有窮人，因為富人財富就是必然建立在對窮人的宰割之上，二來我是覺得台灣和香港的窮人不是只是渴望過上富人的生活，而是希望有低限度的主體性和尊嚴。但這一點，我無法在大陸的那種對香港的規畫上看到，而因此我覺得你的解藥只能解到一點，就是讓台灣人共享大陸的經濟繁榮，但我在自己香港的經驗裡面，覺得這個解藥我們已經試過了，而我並沒有覺得奏效。

Sally | 但我覺得這不是只是香港年輕人遇到的問題，大陸年輕人也感覺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的空間被瘋狂壓縮，就是內捲嘛。

Karol | 現在在上海的壓力是非常大的。雖然上海是經濟發展最快，作為土著上海人的機會是很多的。但我就是不想要過上只有賺錢和只有經濟價值的生活。但在中國現在大家根本都不能有空間理解為什麼我不想要賺錢了。這也是我覺得台灣和大陸的差別。大陸很多人口都加入了快速增長的行業，體驗到了經濟上升的美好。但台灣是不是真的想要這個？我不可以只是說這是內捲就好像我們不能做得更好那樣。內捲之下，經濟、政治和空間規畫上也要有民主化吧。就好像你當然可以說，大家可以跟著政府的規畫走，如果想要其他生活空間的話就搬到指定的地點。

Sally | 但如果說現在移動也更加順暢呢？譬如人口的移動更加方便，不可以就真的搬到更有空間的地方嗎？譬如高鐵啊。

Karol | 但如果我就是想要生活在上海呢？或就是想要生活在台灣呢？就是想要生活在香港？然後我就不想要賺錢，為什麼不可以有這一部分的聲音被納入？

Lala | 我覺得搬去其他地方如果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我當然認為是應該被批准的，是好的。但現在的規畫是反過來的，是先掏空你本來所在地的存在意義，然後讓區域缺乏彈性，再騰籠換鳥，讓你搬走。如果中國在統一進程中對台灣唯一的吸引力只是在於與台灣分享發展紅利，然後台灣失去對自己經濟、政治和區域的把控。那對一個宜蘭的農夫來說，他可能只是想要耕種下去，這種統一對他來說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吸引力，他憑什麼覺得自己需要理解大陸和匯入大陸的發展？還沒開始說言論自由的問題，儘管我覺得大陸的言論自由狀況並沒有台灣人想得那麼糟糕，台灣民間有時候的確有誇大，而且我不認為在台灣就彷彿有了言論自由。可是這對很多台灣人來說，這

是會帶來恐懼的。

Sally | 這問題挺大的，你說的恐懼我也可以理解。但對於怎麼改變大陸的現狀，我認為那個方法是要首先對大陸的語境有所理解，才可以知道怎麼用內部的邏輯改變它。我可能還是認為有一些東西是現實的，或者是內部固定了的，譬如經濟和政體，這些東西我會先默認是最難改變的，所以我想要做的方法是尋求用內部的邏輯尋求改善。我對兩岸之間民眾的交流也是保持這個態度，希望台灣可以用大陸的內部的邏輯，能夠消除一些從小接受的固有認知，從一個「新生兒」的角度去重新認識大陸，然後去尋求溝通。反過來，大陸人民對台灣也是。我覺得現在大家是在還沒有徹底了解清楚對方在想什麼之前就先開始敵對了。我是在很實際的層面上覺得這樣不能解決問題，也是會產生敵對，就好像為什麼我會被攻擊那樣。

不過，始終我生氣的主要原因是來自大陸的謾罵。這會讓我發現大陸其實不夠了解台灣。我自己也是在台灣生活了一個整個大學時期，從各種渠道認識各種台灣人之後，才覺得自己比較了解台灣，儘管這裡還有因為年齡所產生的代溝的問題。所以我才現在才去做一個vlog，向大陸人介紹台灣。作為一個在台灣生活過的大陸人，我喜歡大陸，也喜歡台灣。希望大家都看到喜歡兩邊都是可能的，而這種喜歡不一定要上升到國族認同於是變成互相敵對的層次。就好像我喜歡台灣和大陸，都是建立在具體的生活經驗。就好像我未來可能去歐洲生活，也可能會喜歡歐洲那樣。人生的觀點許多都是碰巧組成的，出生在一個地方不一定就要固執於一個地方的政治，覺得自己必須要怎樣。我是想要鬆開大家的排斥，要接受自己是有無知的。

我到現在都覺得，我在這個龐大的世界面前，是很無知的。但我也相信，永遠認可自己的無知，才會給予自己去了解世界的可能。

## 關於未來——還有什麼動力走下去？

Lala | 我對未來是很悲觀的。這事情讓我覺得在台灣很孤獨，或許也是為什麼有些人說我性格有變。我是學會了不去希望那麼多，不去信任那麼多的台灣人，也希望自己因此不要失望那麼多吧。所以在這個事情之後，其實我有把自己的社交圈很刻意地縮小，讓身邊圍繞著一些友愛一點的小夥伴。這是我最大的改變。至於運動，我還是繼續低頭做，對未來悲觀這個事情不會阻擾我繼續做我認為對的事情吧。我一直都是那種有點自殘的人，很習慣悲觀地走下去的感覺。

Sally | 雖然這一次我收到了很多謾罵聲，但是我也

知道了誰是我的朋友，認識了很多新的朋友，發現很多人是可以溝通的。

我是很相信人是自由的。有一篇文章叫〈碰巧而已〉，裡面有一句是這樣的：「國家符號是個完全隨機的東西，並不是我的選擇。」我出生的時候並不知道自己是哪裡人，我覺得我是哪裡人都是後天灌輸的想法。那篇文章鼓勵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流動，去不同的地方、選擇過不一樣的生活。我也是希望自己變成這樣的人。所以我在台灣還是我在大陸，其實都是自己的選擇，多於說我覺得我是大陸人所以要回大陸，我回大陸也只是因為工作的一些機會。我覺得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其實大家都是要反省自己能否保有溝通的善意。就像我還是很樂意和那個台獨姐姐交流，我還是相信在那些政治以外，人的本質還是比較善良的，特別是聊到譬如出生成長的經歷時，大家都是很相似的。所以我很願意對著不同人先放下自己的立場。我不覺得暫時放下立場是違背良心，而是一種溝通的方式。我是希望無論台灣人和大陸人在兩邊溝通的時候都可以這樣。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正在做一個vlog，對大陸介紹台灣。在大陸做像我這種以促進兩岸社會交流為目的的vlog，也許並不會有人要關心和買帳，也不會有人願意幫忙，所以我必須什麼都得自己來。我可能想要帶出的讓大陸人意識到的觀點是：大陸社會如果真的覺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想要台灣回歸，那為什麼要用吵架的方式，吵架可以帶來回歸嗎？而且，你得至少先了解台灣才能叫人回歸吧。

另外也是想要藉著這個vlog介紹陸生，想要呈現這一群人出來。我的vlog主要面向的並不是台灣人，而是大陸人。我想要讓陸生不要只是一個符號，而是一些具體的人，以及這些人是怎樣平凡地生活。我有一些陸生朋友回到大陸以後，跟我說自己很想念台灣，很愛台灣，但是不能說出來，很痛苦，因為周圍沒人會理解他。我不想這樣，我不想當這種人，我想要光明正大被人看到我、聽到我的想法、看到陸生的存在和生活，我希望我能光明正大地呈現我的喜歡。可能這也跟我性格有關。我小時候很喜歡看一部小說，叫《龍族》，這本書對「95後」江浙這一代的二次元圈影響很大。我想要染紅頭髮某程度上也是因為這本書的女主角。這部小說寫出了很多我們這代大陸年輕人的孤獨感，是我們共情的點。

Lala | 我們這個年代的孤獨感的代表是《新世紀福音戰士》。

Sally | 我小時候有幾次想要企圖自殺，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想要到學校天台想要跳下去，是學校的教導主任把我抱下來的。但這本書救過我很多很多次。我後來發現，我在看這本小說的時候，雖然我投射自我的對象是那個孤獨廢柴的男主角，但我想成為的是那個女主角。她是一個cool girl，是一個會活



出自己的人，就算有一個高富帥男友也可以不屑一顧。我想要當一個這樣的人。做懶人包這件事、幫助境外生返台事件製圖這件事、到想要做vlog這個事情，很多人都以為我很理想主義，但其實我做很多事情的原因是很現實並且很私人的。

至於對社會和兩岸的未來，其實我是很樂觀的。大家都說兩岸關係很差，但我反而覺得在年輕人的私下交流裡面，兩岸的交流是可以很和諧的。譬如我學校遇到很多的學弟學妹，很多都是「00後」，其中一個台灣學妹和我分享說她在B站的遊戲視頻有幾十萬的播放量，交了很多大陸的朋友，用QQ和他們保持聯繫，還說有一天希望去大陸和他們見面。每次遇到這些事情，我其實都會覺得兩岸關係沒那麼差，私下聊天的時候會覺得兩岸關係還是有救的，大家是可以溝通的。而且我很相信一句話：政治化的成果是去政治化的。

Lala |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也會有這樣的立場，他認為我們以為的許多無關政治的「文化」，其實是之前政治鬥爭的成果或體現。所以他會認為文化上的運動是最重要的，反過來文化上的概念可以架空大政治，甚至滲透到政治實際的運作當中，帶來徹底的改變。

Sally | 總之，我相信兩岸之間大家是可以跨越政治的界線做交流的。政治有政治的操作，下面大家還是有足夠力度和平台去撐開交流的空間。最主要還是還有很多有心的人在做。

Lala | 我懂你的意思了，許多下而上的東西還是應該去做，或者可以去做，做了也是會有成果的。我很同意，我只是很不樂觀而已……雖然我是那種不樂觀還是會硬著頭皮去做的人。

Sally | 那我就真的很樂觀，雖然我的樂觀可能會崩塌。

Sally懶人包請見



Lala貼文請見



# 我身本無鄉： 境外生權益小組抗爭誌

## 出版與策畫

境外生權益小組

## 出版日期

2021年1月

## 編輯

Kuo Jia

## 文字校對

阿寶、阿草、Matthew、亞瑟

## 美術設計

Krystie

## 插圖

CC Kua

## 封面

泊異非公民  
(印刻部 版畫)

## 印刷

RETRO印刷JAM

## 印量

300本

## 製本

阿草、Lala、Kuo Jia、奕涵



I C C 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資助





境外生權益小組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vement